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邱坤玄 博士

中國大陸「國是訪問」外交之研究
(1993-2016)



研究生：賴聖雅

中華民國一〇七年一月

謝辭

記得碩一的第一堂群修課邱坤玄老師曾道：「碩士論文最好要質化、量化並重，你們可以試著從公開資料例如出訪紀錄、發表聲明找到研究數據……最好早點找到題目，之後選課就可以圍繞論文加強專業知識。」這席話，給了我靈感擬定論文題目，同時也暗下決心投拜邱公師門。感謝指導老師邱坤玄教授悉心的教誨，以及口試委員朱新民老師與張登及老師的指正和建議，使此論文更臻完善。

一路走來，感謝東亞所的各位。謝謝所上師長們，尤其是如父如兄的邱坤玄老師、寇健文老師、薛健吾老師，舉凡課業指導、玩水長見識、炸雞舒心懷都是我難以忘懷的時刻。謝謝張姐、曾予於我協助的學長姐與 104 級的大家，最常碰面與最暖心的你們是論文鬼打牆與崩潰時期的慰藉！

就讀東亞所是巧合。但若沒有這美麗的巧合，將無近三年的生涯際遇和此論文的付梓，我可能仍是找不到方向的浮雲，在漫漫長日中掙扎。謝謝我的家人們，全心支持的父母，義無反顧的觀，宛若親姊妹的孟和包。沒有您們，沒有今日的一切，謹紀念開始與結束。

此論文獻給安，所有努力皆為汝。

賴聖雅謹書

摘要

自 1993 年鄧小平健康狀況惡化、漸失實權的同時，中國大陸亦開始積極投入各項公共外交布局。學界主要認為中國大陸基於以下三個理由而注重公共外交：對冷戰後新國際結構的反應、對「中國威脅論」的回應，以及領導人政治生存的考量。而在官方的聲明裡，中國大陸政府宣告其欲藉公共外交政策達成的主要目標：降低他國對中國大陸威脅的感受，以及促進中國大陸與其他國家的雙邊共同利益。本研究分析中國大陸公共外交政策中之「國是訪問」策略，探討其成因、模式與相關影響。實證資料顯示，在驅動因素方面，中國大陸「國是訪問」的行為與領導人政治生存考量的關聯度較高；而在目標達成方面，中國大陸的「國是訪問」與各項官方所宣稱的欲達成目標並未顯著關聯，反而是與「使受訪國的國家利益更趨近中國大陸、更疏遠美國」的這個事實有穩定的關聯性。本文的發現對於理解中國大陸外交政策的運作邏輯有著重要的理論意涵。

關鍵字：中國大陸、公共外交、國是訪問、中美關係、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



目錄

第壹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1
第二節 文獻回顧與探討.....	3
第三節 研究途徑與方法.....	9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12
第五節 研究架構與章節安排.....	15

第貳章 「國是訪問」外交策略

第一節 國是訪問與公共外交.....	17
第二節 國是訪問外交之成因.....	26
第三節 小結.....	39

第參章 江澤民時期之國是訪問

第一節 訪問次數與對象.....	41
第二節 內涵與實踐.....	42
第三節 小結.....	57

第肆章 胡錦濤時期之國是訪問

第一節 訪問次數與對象.....	59
第二節 內涵與實踐.....	60
第三節 小結.....	76

第五章 習近平時期之國是訪問

第一節 訪問次數與對象.....	77
第二節 內涵與實踐.....	78
第三節 小結.....	89

第六章 國是訪問整體成效

第一節 降低他國威脅感受之程度.....	91
第二節 加強雙邊共同利益之交集.....	102
第三節 小結.....	106

第七章 結論

第一節 比較分析.....	107
第二節 研究發現.....	109
第三節 未來研究方向.....	110

參考文獻

圖目次

圖 2.1	中國大陸歷年「國是出訪」的次數，1993~2016	25
圖 2.2	中國大陸歷年「國是出訪」訪問的國家數，1993~2016	26
圖 2.3	歷年 Google 關鍵字搜尋「中國威脅」(China threat) 之頻率	32
圖 2.4	主要政治事件與中國大陸「國是訪問」行為的變動	35
圖 3.1	江澤民歷年「國是出訪」訪問的國家與地區，1993-2002	41
圖 3.2	美國對中國大陸民意，1991-2002	44
圖 3.3	日本對中國大陸民意，1992-2002	46
圖 3.4	投票模式與中國大陸相同的比率(歐洲地區國家)，1992-2002	51
圖 3.5	投票模式與中國大陸相同的比率(亞太地區國家)，1992-2002	53
圖 3.6	投票模式與中國大陸相同的比率(美洲地區國家)，1992-2002	55
圖 3.7	投票模式與中國大陸相同的比率(中東地區國家)，1992-2002	56
圖 3.8	投票模式與中國大陸相同的比率(非洲地區國家)，1992-2002	57
圖 4.1	胡錦濤歷年「國是出訪」訪問的國家與地區，2003-2012	59
圖 4.2	美國對中國大陸民意，2003~2012	62
圖 4.3	日本對中國大陸民意，2003~2012	65
圖 4.4	投票模式與中國大陸相同的比率(歐洲地區國家)，2003-2012	70
圖 4.5	投票模式與中國大陸相同的比率(亞太地區國家)，2003-2012	72
圖 4.6	投票模式與中國大陸相同的比率(美洲地區國家)，2003-2012	73
圖 4.7	投票模式與中國大陸相同的比率(中東地區國家)，2003-2012	74
圖 4.8	投票模式與中國大陸相同的比率(非洲地區國家)，2003-2012	75
圖 5.1	習近平歷年「國是出訪」訪問的國家與地區，2013-2016	77
圖 5.2	美國對中國大陸民意，2013-2016	79
圖 5.3	日本對中國大陸民意，2013-2016	82
圖 5.4	投票模式與中國大陸相同的比率(歐洲地區國家)，2013-2016	85

圖 5.5	投票模式與中國大陸相同的比率(亞太地區國家),2013-2016	86
圖 5.6	投票模式與中國大陸相同的比率(美洲地區國家),2013-2016	87
圖 5.7	投票模式與中國大陸相同的比率(中東地區國家),2013-2016	88
圖 5.8	投票模式與中國大陸相同的比率(非洲地區國家),2013-2016	89
圖 6.1	美國對中國大陸民意,1991-2016	93
圖 6.2	日本對中國大陸民意,1992-2016	95



表目次

表 2.1	後鄧時期中共領導人「國是訪問」出訪次數與訪問國家數目之比較 (1993~2016)	34
表 3.1	國是訪問對聯合國大會趨向中國大陸投票模式的影響	49
表 4.1	各國在中國大陸進行「國是訪問」之後對中國大陸觀感的變化	68
表 5.1	各國在中國大陸進行「國是訪問」之後對中國大陸觀感的變化	83
表 6.1	各國民意對中國大陸抱持正面態度的百分比	97
表 6.2	中國大陸的「國是訪問」和中國大陸與各國的雙邊實質合作次數	99
表 6.3	中國大陸的「國是訪問」和中國大陸與各國發生軍事化衝突的機率	101
表 6.4	中國大陸「國是訪問」和其他國家投票模式與中國大陸相同的比率	104
表 6.5	中國大陸的「國是訪問」和其他國家投票模式與美國不同的比率	105
表 7.1	後鄧時期中共「國是訪問」之出訪對象與次數之比較 (1993~2016)	108

附錄目次

附表一	後鄧時期中共領導人「國是訪問」之統計 1993-2015	126
附表二	中共菁英制度化前最高領導人出訪之統計 1949-1992	131
附表三	本文所使用到的變數之測量/編碼與資料來源	132



第壹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一、研究動機

冷戰結束後的國際局勢隨著中國的崛起而注入新的變動，國際體系的轉變亦影響著中國大陸大戰略的演變與發展，中國大陸的外交佈局因而隨之調整。雖然後鄧時期中國大陸外交的「大戰略」在不同領導人主政之下不時有微幅的變動，但總體來說，中國大陸對外政策之大方向仍然維持高度的一致性，即在與各國零星的小衝突中持續延續「和平與發展」的一貫目標。¹ 然而，在實際的外交策略上，鄧小平之後的三位最高領導人對中國大陸「形象經營」注重的程度則有遞增的現象，特別是近幾年，中國大陸外交政策最主要的轉變即為將重心投注在所謂的「公共外交」之運用上。²

挾中國崛起之勢而來的中國威脅論成為北京面對外部環境的挑戰，對長期飽受地緣政治不安全感之苦的中國大陸而言，消除區域鄰國恐懼以確保中國大陸經濟持續發展至關重要。³ 中國大陸外交政策的轉變與意圖，對國際關係之和平發展影響深遠，在中國大陸國力增長與他國相應而生的威脅感下，一般認為中國大陸的外交政策作為，主要是想要達成兩個重要目標：其一是使中國大陸成為國際

¹ Avery Goldstein, *Rising to the Challenge: China's Grand Strategy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14~48.

² Philip C. Saunders, *China's Global Activism: Strategy, Drivers, and Tools*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13~18.

³ 秦亞青，「中國特色外交思想和外交理論」，秦亞青主編，*國際體系與中國外交*（北京：世界知識出版，2009年），頁243~248；邱坤玄、張登及，「大國外交的戰略意涵與作為」，高長、陳德昇主編，*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三十年評價與反思*（台北：財團法人兩岸交流遠景基金會，2008年），頁91~105；David C. Kang, *China Rising: Peace, Power and Order in East Asi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Andrew J. Nathan and Andrew Scobell, *China's Search for Secur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5); Yunling Zhang and Tang Shiping "China's Regional Strategy," in David Shambaugh, ed., *Power Shift: China and Asia's New Dynamics*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社會中不可或缺的國家，或至少要成為具有吸引力的國家；⁴ 其二是建立中國大陸負責任的大國形象，以減少他國對中國崛起的憂慮。⁵ 中國大陸在後冷戰時期制定的時代主題乃「和平」與「發展」，除為了應對外部挑戰亦著眼於內部目標，在穩定的國際環境下繼續經濟發展以期達到建設社會主義小康社會，中國大陸外交政策遂轉變與調整，對公共外交之重視程度日益提升。許多研究指出，中國大陸作為世界秩序中「負責任的利益關係者」，表現在外交政策上是採取大致上穩定的與可預測的對外行為，特別是在 2001 年中國大陸成為世界貿易組織的會員國之後更是如此。⁶

後冷戰時期，尤其中國大陸國力躍增的二十一世紀，關於中國大陸外交政策意圖的討論日益熱絡，其究竟是一欲維持現狀的大國與國際體系間各行為者維持「關係平衡」，還是著眼於「普世改造」使一具野心的修正主義者，抑或是重回朝貢體系的關係？⁷ 可以確定的是，相較於傳統的作法，中國大陸逐漸以國是訪問、熊貓外交、孔子學院、夫人外交等等更加強調「軟實力」的公共外交作為，以更彈性且多樣的方式來改善與他國之間的關係。⁸

⁴ 蔡東杰，2007，「關於當前中國「大戰略」討論的辯證問題」，*全球政治評論*，第 17 期（2007 年），頁 1~18；Joshua Kurlantzick, *Charm offensive: How China's Soft Power Is Transforming the World*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7); Zheng Bijian, "China's 'Peaceful Rise' to Great-Power Status," *Foreign Affairs*, Vol. 84, No. 5 (September/October 2005), pp. 18~24.

⁵ Bates Gill, *Rising Star: China's New Security Diplomacy*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7); Evan S. Medeiros, *Reluctant Restraint: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Nonproliferation Policies and Practices 1980-2004*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⁶ Nicholas R. Lardy, *Integrating China into the Global Economy*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2); Alastair Iain Johnston, "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7, No. 4 (Spring 2003), pp. 5~56; David Shambaugh, "Return to the Middle Kingdom? China and Asia in the Early Twenty-First Century," in David Shambaugh, ed., *Power Shift: China and Asia's New Dynamics*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Yunling Zhang and Tang Shiping "China's Regional Strategy," in David Shambaugh, ed., *Power Shift: China and Asia's New Dynamics*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⁷ 黃瓊萩，「關係平衡 vs. 普世改造：中美國際干預風格與大戰略思維之比較」，*中國大陸研究*，第 58 卷第 4 期（2015），頁 71~92；Alastair I. Johnston, "Is China a Status-Quo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7, No. 4 (2003), pp. 5~56; Scott L. Kastner and Philip C. Saunders, "Is China a Status Quo or Revisionist State? Leadership Travel as an Empirical Indicator of Foreign Policy Prioriti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6, No. 4 (March 2012), pp. 163~177; Chih-yu Shih and Chiung-Chiu Huang, "China's Quest for Grand Strategy: Power, National Interest, or Relational Security?"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8, No. 1 (October 2014), pp. 1~26.

⁸ 張清敏、劉兵，「首腦出訪與中國外交」，*國際政治研究*，第 2 期（2008 年），頁 1~20；Philip C. Saunders, *China's Global Activism: Strategy, Drivers, and Tools*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2006); Evan S. Medeiros, *China's International Behavior: Activism, Opportunism, and Diversification* (Santa Monica, Calif.: RAND Corporation, 2009).

二、研究目的

在前述諸多中國大陸的公共外交工具中，又以「國是訪問」最為經常性且規律性地被使用。然而，文獻中對於中國大陸「國是訪問」的運用，多以描述性的分析或是政策性的時事評論為主，重點多在敘述為何中國大陸開始注重公共外交與「國是訪問」，或是描述中國大陸的最高領導人對某些國家的出訪，迄今本文尚未發現有學術文獻以一個具可否證性的方式來探討驅動中國「國是訪問」行為，或是去評估中國的「國是訪問」是否確實達成了公共外交所預期的效果。

綜上所述，本文並未預設中國官方所說的「中國形象營造」真的就是「國是訪問」外交之真實目的，僅藉由檢視各種相關指標來判斷中國「國是訪問」外交的原因、過程與影響，並從各種經驗證據的指向推論中國大陸外交行動的深層驅動原因。本研究的目的，即於在冷戰後中國大陸積極運用其「國是訪問」外交的趨勢之下，解答一連串有關中國大陸「國是訪問」外交策略應用的相關問題，分別羅列如下：

1. 「國是訪問」策略與中國大陸外交政策之關聯為何？
2. 冷戰後中國大陸最高領導人「國是訪問」的具體作為與趨勢為何？
3. 中國大陸「國是訪問」策略的成因以及成效如何？

第二節 文獻回顧與探討

一、軟實力與公共外交

軟實力的概念起於美國哈佛大學教授 Joseph S. Nye，在 1980 年代對「美國衰退論」的反駁，認為美國仍能在國際體系中維持領導角色，其立論觀點彰顯了

軟實力的概念。⁹ 此邏輯脈絡下，時序自 1990 年出版的 *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 呈現軟實力概念的輪廓，論及美國文化吸引力、意識形態、形塑國際制度與跨國公司等所蘊含的無形權力資源與意義，此讓國際間其他行為者所欲已求的吸納力（co-optive power）；¹⁰ 2003 年的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軟實力有了理論化的趨勢，強調彼時 911 事件後一年的國際態勢，相對於硬實力的軍事力量，軟實力的運用有著更關鍵地四兩撥千斤的重要功能；¹¹ 2004 年的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區分了軟實力與硬實力的差別外，明確的指出軟實力乃源於對他人的文化吸引力、國內外欽慕的政治價值以及具有正當性與道德高度的外交政策，最重要的是闡述了軟實力的操作，即公共外交的運作與功用。¹² 此 14 年間，關於軟實力的理論已臻完備，二十一世紀各國不再僅著重傳統的壓迫、征服等軍事力量，對軟實力的關注與應用亦日趨多元。國際間行為者在維持與加強自身經濟、軍事、政治權力的同時，亦著眼於自身文化、價值觀等無形資產的獨特與優點。¹³ 反映在外交政策上是為公共外交的政策推行，其重要的內涵是一國正確訊息的傳遞、正面形象的建立以及塑造長期穩定關係與有利的政策環境。¹⁴

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在英國稱為文化外交（cultural diplomacy），主要的特性是藉由即時訊息流動的溝通與宣傳，以增進對特定國家的認識。¹⁵ 後來在 1965 年時由美國學者 Edmund Gullion 在塔夫特大學法律與外交學院的一棟新建築落成時使用了“public diplomacy”一詞後定名至今，當時主要指涉三個方

⁹ Joseph S. Nye, “Arms Control after the Cold War,” *Foreign Affairs*, Vol. 6 No. 5 (Winter 1989), pp. 42~64.

¹⁰ Joseph S. Nye, *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0), pp. 188~195.

¹¹ Joseph S. Nye,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9.

¹² Joseph S. Nye,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4).

¹³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6) p. 92.

¹⁴ Joseph S. Nye,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4) p. 107.

¹⁵ 李翔宙，「中國推動公共外交政策之探析」，*全球政治評論*，第 35 期（2011 年），頁 53~80。

面的非正式外交活動：在他國人民心中建立本國良好形象、鼓勵非官方的團體與利益之間的彼此交流、促進資訊與理念的流通。隨著傳媒技術的發展，人們更有意願參與政治議題、非政府組織以及公共活動，尤其是在全球化與科技技術進步後資訊媒體蓬勃，各國紛紛重視對外之國家形象和輿論走勢，期望軟性號召力或感染力得以影響他國的認知。¹⁶

政府致力於國家正面形象的建立以及輿論轉換，以告知、影響，甚而引導國際聽眾的認知，相對於傳統的外交政策來說，是一個更為動態的建構過程，著眼於在全球事務中影響和吸引他者的「軟實力」（soft power）。¹⁷ 為達國內外環境的穩定，中國大陸在快速崛起的同時，也更加關注由文化、軟實力、國家形象塑造組成的公共外交。¹⁸

公共外交在各國與各政府間有不同的認知和解釋，中國大陸的公共外交以文化為主，中國大陸外交部部長表示「中國公共外交緊密圍繞黨和國家中心工作，以服務改革發展穩定大局為根本出發點本……將注重弘揚中華文明與借鑑吸納其他文明有機結合。」，亦點出公共外交中首腦外交及其政策宣示、與他國元首、民間團體、媒體等互動交流的重要性。¹⁹ 學者將公共外交歸因於全球化，強調大眾傳播媒體技術下，國家形象的影響；有些學者認為中國大陸視公共外交為策略工具，在策略管理邏輯下搭配不同種類的對策以達成特定需求。²⁰ 亦有論者認為中國大陸推展公共外交是面對國內民意在接收國外意識型態後的思想解放、利益團體的多樣性發展、易受鼓動的民族主義等情況之應對，為妥善控制國內社會的

¹⁶ 戴紹安，「中國文化軟實力政策研究—以國家漢辦下的孔子學院為例」，台北：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碩士班學位論文（2014年）。

¹⁷ 卜正珉，*公眾外交：軟性國力，理論與策略*（台北：允晨文化，2009年）；Joseph S. Nye,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4).

¹⁸ Ingrid d'Hooghe, "Into High Gear: China's Public Diplomacy," *The Hague journal of diplomacy*, Vol. 3, No. 1 (March 2008), pp. 37~61.

¹⁹ 楊潔篪，「公共外交與中國國家形象的塑造」，頁43~44；袁鵬，「新時期中國的大戰略—對「十八大」報告的戰略解讀」，頁3。

²⁰ Ingrid d'Hooghe, "Into High Gear: China's Public Diplomacy," *The Hague journal of diplomacy*, Vol. 3, No. 1 (March 2008), p. 39.

穩定和在全球化潮流下站穩腳步。²¹ 另外，也有學者視公共外交為中國大陸軟實力的運用，著眼於議題制定能力以及與國際行為者間的互動。²² 儘管學界對中國大陸公共外交運用有不同的主張，但基本上都對公共外交實為中國大陸更好的對外政策工具有一定的共識，特別是，相較於武力使用或是使用其他財政手腕，公共外交更能有助於改善其他國家對中國大陸之印象。

在中國大陸學界，有些學者將中國大陸推動公共外交歸因於宏觀環境的變遷，認為公共外交因著全球化下的媒體傳播得以改變國家形象而受到重視。²³ 唐小松、王義桅和檀有志等人以戰略工具解釋公共外交的成因，國家視其需求而有不同類型的公共外交政策，而其邏輯出發是戰略管理。²⁴ 另有一些學者，如張志洲、趙可金等人，則認為公共外交的出發點是軟實力的延伸，為的是獲得國際的話語權，公共外交是一國施展軟實力的體現。²⁵

現有文獻多將重點放置公共外交的重要性、何謂公共外交、公共外交的種類與如何提升公共外交等。許多文獻在探討公共外交改善中國大陸形象觀點，提供了豐富的研究，尤其許多學者提出中國大陸公共外交作為消除中國威脅論、改變國際中不利中國大陸的輿論與認知的槓桿作用，然而較少文獻在中國大陸公共外交於整體外交政策中比重遞增的原因詳加解釋，以及何以隨領導人更迭，至今習近平上任，中國大陸公共外交推展力度呈遞增現象。²⁶ 誠然，全球化、科技現代

²¹ 廖登山，「後冷戰時期中國軟權力之研究」，台北：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學位論文（2007年）；余金武，「中國公共外交的內外維度：爭論、概念、關係」，**觀察與思考**（浙江），第12期（2015年），頁8。

²² James F. Paradise,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Harmony: The Role of Confucius Institutes in Bolstering Beijing's Soft Power," *Asian Survey*, Vol. 49 No. 4 (July/August 2009), pp. 649~669.

²³ 張昆，**國家形象傳播**（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年）。

²⁴ 唐小松、王義桅，「國外對公共外交的研究」，**國際問題研究**（北京），第1期（2005年），頁60~63；檀有志，「公共外交中的國家形象建構—以中國國家形象宣傳片為例」，**現代國際關係**（北京），第3期（2012年），頁54~56；Wang Yiwei, "Public Diplomacy and the Rise of Chinese Soft Power,"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 616, No. 1 (March 2008), pp. 257~273.

²⁵ 張志洲，「文化外交如何贏得軟實力」，**對外傳播**，第10期（2012年），頁36~37；趙可金，「人文外交：全球化時代的新外交形態」，**外交評論：外交學院學報**，第6期（2011年），頁73~89。

²⁶ 韓方明，**公共外交概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王儉，「試論改革開放以來中央三代領導人關於文化建設發展戰略的思考」，**遼寧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1卷第6期（2009年），頁17~19；徐進，「新時期拓展中國公共外交的必要性」，**重慶交通大學學報**

化等因素亦影響國家對外政策的考量，但本研究認為，中國大陸積極推動公共外交背後，其主要動機應是在中國大陸評估國際局勢後，認為公共外交是最能夠避免遭受其他國家反制的方法。

二、後鄧時期「國是訪問」外交政策

藉由外交手段將政府政策、理念與價值觀宣傳予國際聽眾並非新鮮事，但中國大陸直到 1990 年 12 月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強和改進對外宣傳工作的通知》第一次明確指出「對外宣傳的著眼點應主要放在爭取國外最廣大的群眾上，同時要做好國外上層人士或接近決策層人士的工作。中間群眾佔人口的大多數，比較尊重客觀事實，爭取和增進他們對我們的了解和友誼，可以對其本國的決策層形成重要的影響」；同年成立「中共對外宣傳小組」國家形象的塑造由被動轉為主動，重心由強調策略宣傳向公共外交體系過渡。²⁷ 二十一世紀經過十年的醞釀，中國大陸學界對於公共外交的界定和研究日趨完善，亦擴大了公共外交的內涵賦予其更靈活的應用與中國特色。趙啟正大力提倡公共外交後在 2011 年提出了新公共外交，指出「公共外交包括官方與民間的各種雙向交流，其接與間接的促成外國公眾對本國的了解，提升本國在其心目中的形象，進而促成外國政府對本國政策的改善。」²⁸《公共外交戰略》一書更明確的表示中國大陸加強公共外交是時代與大環境的需要，為的是在後冷戰時期，中國大陸迥異於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制度與意識形態，以及中國大陸綜合實力大幅提升國際格局轉變，使得國際輿論不利中國大陸的背景下，以更易被理解與接受的文化性軟實力，加強中國大陸國際

（社會科學版），第 14 卷第 5 期 14（2014 年），頁 111~114；莊朝榮，「中國提升文化產業軟實力之策略」，*臺灣經濟研究月刊*，第 36 卷第 2 期（2013 年），頁 76~81；鄭華，「中國公共外交發展進程中的困惑及其應對」，*國際觀察*（上海），第 2 期（2012 年），頁 66~71。

²⁷ 郭晶，「國際電台台長王庚年：中國國際廣播 60 年」，*人民網*，2009 年 09 月 16 日，檢索時間：2015 年 12 月 18 日，<<http://media.people.com.cn/BIG5/137684/10067379.html>>。

²⁸ 趙啟正，*公共外交與跨文化交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 年），頁 4~9。

話語權、提升國家形象。²⁹

中國大陸特殊國情與富人治色彩下，外交政策的解讀須更側重個人層次的考量，即領導人在外交政策的選擇與影響力，單以傳統西方學界外交理論觀察恐無法適用於中國外交政策，特別是在黨國體制下中共制度化發展所產生的變化。³⁰ 當今制度化的中國大陸，最高領導人在職久了、建立權威之後，與初上任者相較更能夠影響政策結果，也就是說最高領導人剛上台時受到的局限較大，職位未必賦予其權威。³¹ 後鄧時期中國大陸外交決策的產出與最高領導人和其他菁英的互動、個人風格的展現以及權力鞏固程度等因素息息相關。

Wang Jian & Chang Tsan-Kuo 在中國威脅論盛行之時，著眼於公共外交與媒體之間的關係，以時任中國大陸領導人江澤民 1997 年訪美為個案，分析愛荷華州的三家地方報紙及「紐約時報」對於公共外交事件的報導與評價，利用國家領導人出訪做為公共外交手段的有效性研究。³² Zhang Juyan and Glen T. Cameron 以 2000 年 9 月江澤民訪美活動為案例，以美國三家主流平面媒體分析此訪問政策的影響，發現中國大陸公共外交訪問政策確然能對美國媒體輿論造成程度不等的影響。³³ 劉常敏、黃建達在《當代中國首腦出訪與周邊外交》一文中指出首腦出訪是一國外交戰略實踐的直接手段，其主動性反應了一國的外交意圖，有著增進交流、關係協調與糾紛處理的重要職責。³⁴ 中國大陸的公共外交所謂的軟實力加強非指社會軟實力的提升，而是政府軟實力的強化，大陸國家領導人為國家利益的所言所行成為公共外交的重要內容，藉由政府主導、面向社會公眾、以傳播和

²⁹ 趙啟正，*公共外交戰略*（北京：學習出版社，2014 年），頁 10~27。

³⁰ 王緝思、資中筠，「國際關係理論與中國外交研究」，資中筠主編，*國際政治理論探索中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年），頁 307。

³¹ Richard C. Bush, *The Perils of Proximity: China-Japan Security Relations*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13), pp.145~248.

³² Wang Jian and Tsan-Kuo Chang, "Strategic Public Diplomacy and Local Press: How A High-Profile Head-of-State Visit was Covered in America's Heartland," *Public Relations Review*, Vol. 30 (March 2004), pp. 11~24.

³³ Zhang Juyan and Glen T. Cameron, "China's Agenda Building and Image Polishing in the U.S.: Assessing an International Public Relations Campaign,"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 29, No. 1 (March 2003), pp. 13~28.

³⁴ 劉常敏、黃建達，「當代中國首腦出訪與周邊外交」，*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南京），第 1 期（2011 年），頁 58~68。

交流為主要手段。³⁵ 另外蘇淑民亦指出大陸國家首腦和政府官員是為公共外交的先行者，可藉由中華民族精神與領導人個人魅力的展現，增進外國公眾的了解意願與興趣。³⁶ Scott. Kastner & Phillip Saunders 以 1998~2008 年中國大陸最高領導人的出訪作為指標，搭配質性描述與量化統計模型，分析當代中國大陸究竟是國際體系現狀維持者亦或潛在修正主義，探討中國大陸外交政策意涵。³⁷ 現有文獻在領導人出訪後之外國公眾觀感、媒體輿論轉變的關聯有生動的描述，關於中國大陸高層領導出訪的分析多從中國大陸宏觀外交戰略如大國外交、周邊外交、開發中國家交往的角度出發，或是作為中國大陸發展軟實力的例證補充，且多為評論式之政策分析。此外，針對國是出訪的文章多為對領導人的單一次出訪或地區的政策性描述與評論，僅針對各時期最高領導人個案式出訪的動機、過程與可能影響的論述，尚未有以國是訪問外交政策為主的研究。中共外交決策權威的高度集中，中央層級勢力於此平衡後所產出的政策態勢是為觀察重點，外交領域涉及黨、政、軍三大組織系統，可以說各方勢力在此折衝與妥協的結果影響了中共外交政策，同時反映了領導人的相對權力鞏固的動態過程。³⁸ 因此，國是訪問外交政策有其研究價值，而此領域目前尚待充實。

第三節 研究途徑與方法

一、研究途徑

研究途徑 (Approach) 是指選擇問題與相關資料的標準，闡明研究者將由何

³⁵ 杜鈴玉，「新形勢下推動公共外交與提升國家軟實力之研究」，*警專學報*，第 5 卷第 2 期 (2011 年)，頁 266~274。

³⁶ 蘇淑民，「公共外交與中國國家形象的塑造」，頁 76。

³⁷ Scott L. Kastner and Philip C. Saunders, "Is China a Status Quo or Revisionist State? Leadership Travel as an Empirical Indicator of Foreign Policy Prioriti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6 (June 2012), pp. 163~177.

³⁸ Yong Deng, "Reputation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China Reacts to the China Threat Theory," in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 Ross, ed.,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種層次、角度為出發點進行觀察與分析。³⁹ 公共外交不同於傳統的外交形式，冷戰後的中國大陸對於公共外交的運用日益靈活多元，施展力度、著重程度更甚以往，本研究將以公共外交作為研究途徑，以此視角切入探討後鄧時期中國公共外交政策中之「國是訪問」策略，探討其成因、模式與相關影響。公共外交性質的轉變以「911 事件」為明顯的分水嶺。2001 年前公共外交主要由一國政府經由各種媒介影響他國公眾以及國際輿論，內涵包括促進他國民眾對本國的好感度、增進民眾與他國民眾的交流認識、強化他國民眾對本國的政治認同與諸如旅遊、投資、求學等的往來意願。⁴⁰ 「911 事件」後隨著學界重新檢視美國的公共外交政策、科技與傳媒技術的日新月異、非政府組織的興盛與非國家行為者的自主性及影響力提升，公共外交質變下賦予「新公共外交」新的內涵，包含多元化行為者的參與、國家對軟性實力及形象的重視與建構、行銷概念的引入、科技整合下的多樣媒介使用等等。⁴¹ 考量國是訪問外交策略涵蓋 2001 年前後，公共外交發展的變化過程，且其策略具動態發展之特性，故不進一步將公共外交區分為「傳統公共外交」及「新公共外交」探討。本研究之目的是理出中國大陸的「國是訪問」與中國大陸所要達成的各種公共外交政策目標之間的「相關性」（correlation），並非以「因果關係」（causation）的論證作為本文的目的，透過分析、比較中國大陸後鄧時期至今三位最高領導人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歷年來「國是訪問」在四個重要面向上的變化，包含出訪的次數、訪問的國家數、出訪的國家與地區，以及出訪的時間點，理解中國大陸國是訪問外交策略的輪廓與內涵。

³⁹ 孫本初，「如何寫一篇優質的碩博士論文」，發表於撰寫碩博士論文與投稿期刊學術論壇（台北：台北大學，2005 年）。

⁴⁰ Mark Leonard, *Public Diplomacy* (London: The Foreign Policy Centre, 2002), pp. 1~21; Nicholas Cull, *The Cold War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American Propaganda and Public Diplomacy*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6~9; Gifford D. Malone, *Political Advocacy and Cultural Communication: Organizing the Nation's Public Diplomacy* (Lanham: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8).

⁴¹ 卜正珉，*公眾外交：軟性國力，理論與策略*（台北：允晨文化，2009 年），頁 399；Paul Sharp, "Revolutionary States, Outlaw Regimes and the Techniques of Public Diplomacy," in Jan Melissen, ed., *The New Public Diplomacy: Soft Pow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106; Nicholas J. Cull, "Public Diplomacy: Taxonomies and Histories,"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Vol. 616, No. 1 (March 2008), pp. 31~54.

二、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 (Method) 是指研究者蒐集與處理相關資料的程序與手段，針對所欲研究對象及相關問題，設計資料的彙整與分析以利研究的進行。⁴² 社會科學中的非回應研究在不影響社會行為的前提下，以內容分析法、既有統計資料分析法、比較性與歷史性研究等方式對研究對象加以探究。⁴³ 本研究將比較中國大陸後鄧時期三位最高領導人「國是訪問」外交中的一些格式化事實，以作為本研究後續評估其成因與影響的背景。具體研究方法如下：

(一) 歷史研究法

歷史研究法 (Historical Method) 是以歷史發展脈絡作為研究的原始資料，產生新的詮釋、拓展自己的觀點。「歷史」作為人類活動紀錄的載體，提供了解過去以及預測未來的可能性，歷史研究法是一種剖析過去所發生的事實，並以科學態度尋求歷史資料、檢視歷史紀錄並客觀的分析、系統性的整理與解釋這些資料的研究方法。⁴⁴ 探討中國大陸公共外交政策須以歷史期程加以分析，方能了解發展全貌。因此，本研究將梳理中國大陸後鄧時期最高領導人自 1993 年至 2015 年的國是訪問出訪記錄，檢視國是訪問外交政策的發展脈絡，探究政策內外環境因素與相關影響並加以整合。

(二) 比較分析法

比較研究法 (Comparative Research) 是在社會科學研究中經常運用的方法，對研究對象進行相互比較及長期檢視。⁴⁵ 比較研究包括「求同比較」及「求異比較」，前者在事物相同點基礎上了解可能的共同規律，後者則是藉由事物相異點

⁴² 孫本初，前引文。

⁴³ Earl R. Babbie 著，林佳瑩、蔡毓智譯，**研究方法基礎理論與技巧** (台北：雙葉書廊，2013 年)。

⁴⁴ 顧力仁，**歷史法及其在圖書館學研究上的應用** (台北：書府，1998 年)，頁 48~62；Earl R. Babbie 著，林佳瑩、蔡毓智譯，同上註，頁 379~388。

⁴⁵ Earl R. Babbie 著，林佳瑩、蔡毓智譯，**研究方法基礎理論與技巧**，頁 379~388。

區分不同屬性與發展特殊性，藉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事物對比下的異同，有助於研究者認識研究對象的多樣性與一致性。⁴⁶

本研究將透過比較研究法，對應後鄧時期三位最高領導人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主政時期的國是訪問外交政策之差異，比較其出訪次數、出訪國家數、出訪國家與地區，並加以分析以呈現中國大陸公共外交之國是訪問政策的整體脈絡與變化之可能因素。

(三) 既有統計資料法

既有統計資料法 (Analysis of Existing Statistics) 是以官方、準官方或具有公信力的資料進行分析。這些資料可以作為社會科學研究的主要材料，有助於研究者進行初步的定位，同時提供歷史或概念性的脈絡，以利後續的研究發展。⁴⁷

本研究將透過既有統計資料法，運用 Pew、Gallup 具有公信力的研究機構所做的中國大陸好感度之統計資料，包括美國民眾對中國大陸的好感度、日本民眾對中國大陸的好感度、各國家對中國大陸的觀感數據，檢視中國大陸國是訪問後的成效與可能影響。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範圍

公共外交的主軸是探討「軟實力」之運用，透過政府所主導之政策行為改善他國政府與民眾對自身的觀感、提升國家形象，進而達到政策目的。本研究所欲探討的主題為中國後鄧時期「國是訪問」外交策略，比較此期間三位最高領導人

⁴⁶ 王梅林，「比較研究」，國家教育研究院，2012年10月，檢索時間：2017年03月19日，<<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679273/>>。

⁴⁷ Earl R. Babbie 著，林佳瑩、蔡毓智譯，研究方法基礎理論與技巧，頁 371。

國是訪問的異同，進而了解此項外交政策變動的成因、過程與影響。國是訪問的出訪資料蒐集上，本研究將以中國大陸官方資料來源為主，梳理新華社報導與新華網國內外大事紀，明確提及國是訪問以及具有最高規格的禮炮、國宴、致詞儀式等國是訪問出訪記錄，輔以中國大陸外交部下的世界知識出版社之相關書籍。本研究試圖從公共外交進行理論與實證的研究，統計 24 年來的國是訪問數據作為分析標的，希冀在此格式化事實 (stylized facts) 中找出一些可能的模式以供進一步之分析。

由於國是出訪是一動態發展的外交政策，本研究的時間範圍由江澤民就任國家主席 1993 年起至開始研究的 2016 年，對國是訪問外交政策作一系統性的分析整理。本文以 1993 年作為後鄧時期國是出訪外交政策的起始，主要是著眼於「國家元首在中國政治運作上的實質意涵」以及「中共在黨政二元體制下最高領導人掌權的性質轉變」的兩個考量。

首先，中國大陸在 1983 年設置國家主席一職後，先後由政治局常委李先念、政治局委員楊尚昆擔任，但顯然這兩個人都並非是當時中國的最高領導人，鄧小平仍然掌握實權；直至 1993 年江澤民身兼黨主席、中央軍委、國家主席三位一體，賦予國家主席此職位不同的意涵，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的象徵。國際間往來由重視與中國共產黨交流轉向與注重國家層面交往過渡，國家主席由單純的虛位元首轉向國家象徵，職務影響力與代表性提高。後鄧時期，國家主席固定由總書記出任，即「國家元首」從酬庸性質向具實質影響力、代表性發展，此職位由過去單純的虛位元首轉向國家象徵。再者，中國大陸黨國體制下，尚未邁向制度化之前，是由個人式的政治強人主導政治生態。儘管鄧小平逐漸退居幕後，但其個人影響力仍大，故有 1992 年鄧小平以一介普通黨員的身分南巡，卻仍然能主導國家整體發展局勢的事實，由此可知，當時的中國大陸實際上的最高領導人，並非名義上擔任黨、政、軍的最高職位者。但隨著中國大陸菁英政治制度化的逐漸推進，建政早期的魅力型領導人式微，中國大陸的菁英政治朝向制度化發展，中國大陸最高領導人掌握「黨務系統」與「政務系統」最高職位者的慣例出現。

綜合上兩點，探討中國大陸後鄧時期國是訪問外交政策，由 1993 年江澤民接任國家主席後才成為實際上的最高領導人作為分析的起點，不僅符合中國政治生態的權力演變，亦可充分掌握了中國大陸「國家主席」這個職務的權威與「國是訪問」外交作用的連結。

二、研究限制

(一) 研究途徑與方法的限制

本研究欲採用歷史分析法、比較研究法、既有統計資料分析法，然而中國大陸新聞媒體與出版資料仍多受限制，中國大陸坊間媒體雜誌、書籍、文章等對所謂國是訪問的報導與紀錄分類標準不一，雖本研究以官方資料來源為主，主要資料大多經官方認可後才得以釋出，但中國大陸官方對於資訊的掌控與限制，如取消過去紀錄的頁面連結或屏蔽特定的搜尋引擎等技術性手段，將影響本研究的完整性。為彌補上述之不足，本研究曾分別以 Google 以及 Yahoo 兩種不同搜尋引擎，對新華網資料做相同的搜索，並以出版的書籍作為支持，以保持數據的完整與研究的信度。

另外，有鑑於可得的跨國跨時 (time-series cross-section) 的大數據資料的問卷收集與取得不易，本研究無法收集每年世界各國對中國大陸好感度的統計數據，但相關資料能提供一定信度與效度的分析指標。唯受限於許多控制變數與可能的敵對解釋目前仍欠缺適合的資料，故本研究並未進一步分析其詳細的因果關係。而在對中國大陸威脅的感受分析這項，本研究將以最低可能性 (Least Possible Case Selection) 挑選美國與日本作為研究設計考量，強化本研究之信度。

(二) 時間的限制

國是訪問是中國大陸仍持續推行的公共外交政策，因寫作時間的關係本研究

無法完整的分析時任中國大陸現行最高領導人習近平的國是訪問歷程。故本研究將專注於既有的過去兩任最高領導人江澤民、胡錦濤主政時期的完整二十年國是訪問資料，並以習近平現有資料為輔。

(三) 軟實力測量的限制

至今文獻中尚未有解決「軟實力」測量的優良方案，為了克服檢驗軟實力效率的困難，本文各項檢驗指標的選擇將分成兩部分進行。第一個部分是直接檢證中國的國是訪問是否達到了官方所宣稱想要達成的目標，也就是說，是否成功地降低他國對中國大陸威脅的感受、是否增進雙邊關係、是否有助於促進雙邊的共同利益。為減少判斷此三項官方宣示的施行成效的指標選取爭議，第二部分的檢驗方式是以主要國際關係理論為基礎，來探討中國的「國是訪問」行為是否與理論所指涉的重要變數有所關聯。國際關係理論所認為的重要變數包括現實主義所強調的權力，自由主義所強調的民主、貿易、和國際組織，建構主義所強調的互動經驗與實踐，以及國內政治主義所強調的國內政治經濟變化。本文試圖以研究中最常使用的操作化方式，表現於各個圖表和模型，類似的檢驗方式諸如政策性與理論性的指標選擇亦常見於主流的期刊。⁴⁸

第五節 研究架構與章節安排

為了解釋中國大陸「國是訪問」外交的成因、過程與影響，本文的內容安排

⁴⁸ 以下幾篇期刊文章對於中國與他國之間的關係的檢驗，其變數的選擇也是基於主要國際關係理論的建議與政策的建議，可參考：Alastair Iain Johnston, “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7, no. 4 (April 1, 2003), PP. 5~56; Alastair Iain Johnston, “How New and Assertive Is China’s New Assertivenes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7, no. 4 (2013), PP. 7~48; Scott L. Kastner and Phillip C. Saunders, “Is China a Status Quo or Revisionist State? Leadership Travel as an Empirical Indicator of Foreign Policy Prioriti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56, no. 1 (March 1, 2012), PP. 163~77.

如下：首先在緒論的部分，本文提出了主要的研究問題；接著，本文的第貳章是一個描述性的研究，論述國是訪問政策和公共外交之關聯、國是訪問政策的變化與格式化事實 (stylized facts)，探討「國是訪問」可能的驅動成因。在第參、肆、伍章中，分析有關後鄧時期三位最高領導人「國是訪問」的變化與格式化事實，梳理出訪的次數與國家，其目的在於找出一些可能的模式以供後續成效之研究，探討「國是訪問」的公共外交策略的可能影響。第陸章將以宏觀視角檢視國是訪問的整體成效，以作為前三章的補充與支持。根據前述，在驅動因素方面，中國「國是訪問」的行為與領導人政治生存考量的關聯度較高；而在目標達成方面，中國的「國是訪問」與各項官方所宣稱的欲達成目標並未顯著關聯，反而是與「使出訪國的國家利益更趨近中國、更疏遠美國」的這個事實有穩定的關聯性。最後將在第柒章總結經驗證據的發現，比較分析三位領導人政策之差異，並闡述本文的發現為何對於理解中國大陸外交政策的邏輯有著重要的理論意涵。

第貳章 「國是訪問」外交政策

第一節 國是訪問與公共外交

為達國內外環境的穩定，中國大陸在快速崛起的同時，也更加關注由文化、軟實力、國家形象塑造組成的公共外交。¹ 根據陳雪飛（2017）的整理，自建國以來，中國大陸公共外交的實踐經歷了三大階段：第一，建國後到 1970 年代末是「初創期」，較為人所熟知的舉動包含了「乒乓外交」與中美、中日關係的正常化；第二，1980 年代到冷戰結束是「調整期」，伴隨著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和平」與「發展」被確定為外交政策的兩大主軸，過去以意識型態劃分敵我為主的國際關係戰略為靈活務實的對外政策所取代，許多中央部會開始成立「對外宣傳小組」；第三，冷戰結束以來至今是「建制期」，此時許多更具行動力的正式機構開始成立，顯示中國大陸開始正式重視公共外交，並把公共外交從過去間歇性的輔佐性質提升為常態性的國家外交戰略。在這個冷戰後的「建制期」，中國大陸在公共外交所進行的努力可以從一系列正式制度的設立看出端倪：1991 年，國務院新聞辦成立；1997 年，中共中央宣傳部要求把「宣傳」一詞的英文翻譯從過去的 propaganda 統一調整為 publicity；2001 年 911 事件發生後，公共外交開始成為中國大陸國際關係學界的研究重點；2004 年，中國大陸外交部於成立「公眾外交處」，且在 2008 年改名為「公共外交處」，並在 2009 年升格為「公共外交辦公室」；2010 年，中國大陸外交部成立公共外交諮詢委員會，將資深外交官和學者結合起來，積極向國內外闡釋、推廣、介紹中國的外交理念；2012 年，中國大陸公共外交協會在北京成立，更積極地將社會資源和民間力量招攬進來。在 2008 年的北京奧運和 2010 年的上海世界博覽會中，中國大陸亦積極推廣所謂的「奧運外交」和「世博外交」，積極展現各方面的軟實力。配合中國大陸國際

¹ Ingrid d'Hooghe, "Into High Gear: China's Public Diplomacy," *The Hague journal of diplomacy*, Vol. 3, No. 1 (March 2008), p. 39.

廣播電台、新華社海外分社以及中國大陸海外文化中心，不遺餘力地以世界各主要語言製作宣傳中國大陸的新聞與節目，更在 134 個國家地區建立了 500 所孔子學院和 1000 個孔子學堂，冷戰後中國大陸在公共外交上所投入的資源和努力都明顯與前兩個時期有所不同。²

本文以 1993 年作為中國正式注重執行「國是訪問」外交政策，有鑑於以下兩點說明：第一，從資料來看(請參見本文的附表二)，中共從 1949 年建政以來，一直到 1982 年，這 34 年間只進行過 15 次「出訪活動」，且從 1982 年以後就未進行過任何最高領導人的出訪。其因鄧小平的健康因素未能出訪，故從冷戰在 1991 年蘇聯解體結束後，一直要到 1993 年才有了闊別 12 年之久的最高領導人再一次出訪，即江澤民的第一次出訪。1993 年之後的每一年，中國大陸最高領導人都有進行「國是訪問」，迄今從未間斷(請參見本文的附表一)。從經驗資料可以清楚看出，1993 年是一個很明顯的切點。第二，根據上述提及的前中國大陸外交學院教師、現任外交學與外事管理系公共外交教研室主任陳雪飛的整理，中國大陸具有官方色彩的學者基本上都同意中國大陸的公共外交在冷戰結束後開始進入「建制期」。此時其中國大陸開始積極成立各相關機構，正式將公共外交與公共外交中的各項工作內容列為例行的工作項目，包含「國是訪問」，這也支持了中國大陸在冷戰後開始注重「國是訪問」的說法。因此本文認為從 1993 年開始分析方能掌握中國大陸「國是訪問」行為的全貌。

若考量中國大陸成立公共外交相關之官署時間點，對國是訪問外交政策的研究時間點應調整至廿一世紀時期。儘管將分析的期程改到胡錦濤就職(2002 年 11 月)之後亦無不可，且較不具爭議性，但考量樣本代表性與統計的結果未有明顯的差別，本文仍以 1993 年作為研究起始，以下詳細說明之。第一，為樣本代表性不足的問題，若將時間點延到胡錦濤就職之後，本文會失去 45% 的樣本。江澤民擔任中央委員會總書記(1989 年 6 月~2002 年 11 月)、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

² 陳雪飛，「新中國公共外交的歷程與特點」，閱讀屋，2017 年 2 月 21 日，檢索時間：2017 年 4 月 21 日，<<http://www.readhouse.net/articles/231826638/>>。

(1993年3月~2003年3月)、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1989年11月~2004年9月)，期間江澤民處於無所爭議的三位一體，即中國大陸最高領導人的期間有完整的十年(1999年3月~2003年3月)。到了胡錦濤與習近平的時代，因中國大陸最高領導人的任期已較為制度化，故可明確地說，胡錦濤擔任中國大陸最高領導人的期間為2002年11月至2012年11月，亦有完整的十年時間；習近平從2012年11月接掌至今，也幾乎有完整的第一個任期。³ 第二，數據改變結果未有影響。若把討論的期間延至胡錦濤就職(2002年11月)之後，統計模型的結論也並未有重大的改變。本文檢驗了資料的 sub-sample，只將胡錦濤就任(2002年11月)以後的資料放入模型中，結果發現，模型輸出的結果與原本納入江澤民期間的結果並無顯著不同，中國大陸的「國是訪問」在大多數指標中皆沒有顯著的效果。⁴

雖中國大陸政府真正注意到需發展公共外交應是胡錦濤任職以後，中國大陸相關學界建言也是胡錦濤的第一任期末到第二任期才較多，且直到2004年中國大陸的外交部才成立「公眾外交處」，但事實上，中國大陸的最高領導人早在冷戰結束後的1993年便開始，且例行性地進行每年的「國是訪問」。故，雖中國大陸學理與政策操作的發展有時間上不一致，但為完整分析國是訪問外交政策與其展現的公共外交成效，本文從1993年起開始分析，期間包含江澤民、胡錦濤兩位離退之最高領導人完整十年任期，以完整呈現「國是訪問」行為。

³ 如果本文將正式的討論期程延後到胡錦濤就職之後、並把江澤民時期的「國是訪問」作為背景資料，那麼本文的樣本數將會被限縮到僅能涵蓋胡錦濤任內的完整資料(2002年~2012年，佔總資料量的42%)、且習近平的資料也只有三年(2012年~2015年，佔總資料量的13%)。如此一來，本文的結論可能將甚為偏頗，即使結論相同恐被質疑僅僅是胡錦濤任內的結果，不能代表三位領導人的「國是訪問」。

⁴ 此外，出訪次數的起伏也符合「發生國內菁英政治重大事件的該年出訪次數會減少」的模式(請見本文的圖2.4)，因此若把討論的期間延至胡錦濤就職(2002年11月)之後，本文也將得到相同的結論。

一、 國是訪問的重要性

自 1993 年開始，作為公共外交工具之一的「國是訪問」成為中國大陸重要的外交行為，其乃最被規律性使用的主要政策。進行於中國大陸最高領導人與他國最高領導人之間的「國是訪問」為中國特色公共外交的一環，中國大陸外交部長楊潔篪就曾指出，中國特色的公共外交堅持統籌國內與國際兩個大局，致力於在引導外國公眾正確認識中國大陸的同時，努力使國內公眾更加全面了解國際形勢和中國大陸外交。⁵ 此外，楊潔篪亦明確表示：

我們將緊緊圍繞首腦外交、國內大型活動和重要時間節點，廣泛開展政策宣示，進一步提高中國國家形象；優化公共外交日常和應急管理機制，加強信息發布和輿論引導。……緊密圍繞黨和國家中心工作，以服務改革發展穩定大局為根本出發點……將注重弘揚中華文明與借鑑吸納其他文明有機結合。」⁶

這句話也點出公共外交中首腦外交及其政策宣示、與他國元首、民間團體、媒體等互動交流的重要性。⁷ 考量楊潔篪此時的官方身分和立場，這段公開談話即已明確地點出「國是訪問外交」確實為中國大陸公共外交的重要具體措施之一，且為中國大陸的公共外交中最具場面性的實踐途徑。「國是訪問」與其他訪問的不同，由中國大陸官方媒體的定義中可見一斑，如新華社在每一年的新聞報導，以及新華網的「國內外大事紀」的紀錄，都明確提及「國是訪問是具有最高規格的禮炮、國宴等儀式的正式且公開的外交行為」。此外，中國大陸最高領導人國是出訪的路線安排、公開言談、著重地區等皆為探究其外交政策輪廓的指標，而這也是「國是訪問」是中國大陸「公共外交」的重要措施的原因之一。⁸

公共外交包括許多種不同類型的外交政策選擇，使國家得以增進其與他國之

⁵ 蘇淑民，「公共外交與中國國家形象的塑造」，頁 73~77。

⁶ 楊潔篪，「努力開拓中國特色公共外交新局面」，求是（北京），第 4 期（2011），頁 43~44。

⁷ 楊潔篪，同上註，頁 43~46；袁鵬，「新時期中國的戰略—對「十八大」報告的戰略解讀」，現代國際關係（北京），第 5 期（2013），頁 3。

⁸ 李智琦，「近期中共領導人外交出訪之評析」，戰略安全研析，第 98 期（2013），頁 5~12。

間的關係。中國大陸目前經常使用的公共外交工具包括國是訪問、孔子學院的設置與推廣、熊貓外交、第一夫人外交等等。既然公共外交的內容與方法如此多元，那何以本文選擇分析公共外交中的「國是訪問」呢？

傳統的外交行為與互動多是政治家與外交官代表該國，藉由正式渠道的交流往來，公共外交與傳統外交的明顯差異可由學者蔡東杰所言「公共外交則是指各種力圖影響公眾態度，並進而影響對方政府外交決策的作法，通常被用於傳統外交難以奏效或難以取得預期效果的領域」以明之。⁹ 有鑑於「公共外交最大的著力之處即在彌補正式管道外交的不足」的公共外交精神，本文選擇分析中國大陸公共外交中的「國是訪問」的考量因素主要有三。首先在於，「國是訪問」是所有公共外交手段中最正式的外交工具。國是訪問是最正式的訪問形式，有一定的外交禮儀內容如正式歡迎儀式、鳴放 21 響禮砲、公眾演講、新聞記者招待會等等，其象徵性意義之主要目的在於營造或建立新的友好關係。¹⁰ 其次，相較於其他公共外交的方式，「國是訪問」是媒體宣傳效果最大的一種外交工具。國家領導人至他國訪問並非傳統外交實踐的常態，元首間相互往來建立互信，在地理已非限制阻礙的二十世紀成為有用的外交工具之一。國是訪問意味中國大陸領導人親自前往他國，會見他國元首或領導，有著最高規格的禮儀與待遇。因此，此類盛大鄭重的活動必將在兩國間被媒體報導、周知於民，這即是中國大陸國家形象建立最主要的作用。再次，「國是訪問」是雙邊最高領導人最直接的溝通方式，不論是在雙邊交流、商討未來可能的合作、強化雙邊領導人的個人之間的聯繫等等，都具有最直接的效果，在衝突解決或是政策合作上，也已經被證實具有直接的影響。¹¹

上述三點「國是訪問」有別於其他公共外交手段的特質，本文認為在所有的

⁹ 蔡東杰，*當代中國外交政策*（三版）（台北：五南，2014年），頁286。

¹⁰ 趙可金，*外交學原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1年）。

¹¹ Yoram Z. Haftel, "Designing for Peace: Regional Integration Arrangements, Institutional Variation, and Militarized Interstate Disput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61, No. 1 (Winter 2007), pp. 217~237; Scott L. Kastner and Philip C. Saunders, "Is China a Status Quo or Revisionist State? Leadership Travel as an Empirical Indicator of Foreign Policy Prioriti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6, No. 1 (March 2007), pp. 163~177.

公共外交工具中，「國是訪問」應比其他政策選項在國際關係議題上更可能具有效果，故將專注於國是訪問之分析，探討中國大陸的公共外交在「國是訪問」這項工具上的應用。

二、「中國特色」的國是訪問

公共外交為西方國際關係理論，即公共外交非中國大陸外交策略產物，毛鄧以來最類似的外交工具乃人民外交，後鄧時期的中國大陸欲縮短西方對中國的誤解、增進認識，基於西學為用公共外交乃中國大陸近代衍生出的外交策略。公共外交之國是訪問是當代中國大陸面對西方國家特為之的舉措。換言之，中共知道公共外交、國是訪問的意涵與其在西方國家所代表的意義，由此，國是訪問的意義不僅僅只是禮炮的施放，與其他領導人出訪相較也不單純的只作為「高層菁英出訪行為」，具有更深層的意涵和研究的價值。

另外由中共高層菁英出訪的差異性，可一窺國是訪問作為中國大陸重要公共外交政策之端倪。後鄧時期中共高層政治菁英趨向制度化，其一特徵為政治局常委的嚴明職務分工與排名，形塑各常委的行為意涵、暗示各職務的舉措。領導人出訪因不同職務有不一樣的意義，本文著眼於國是出訪，僅針對擔任國家主席之最高領導人進行分析，未納入其他常委出訪或總理出訪原因如下：

（一） 職務因素考量

職位分工限制了常委們活動，賦予「國是訪問」於外事活動中的特殊性，故無納入其他常委出訪進行分析比較的必要。例如「中國共產黨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本身不需要也不宜出國，筆者檢視王岐山任中紀委書記時的紀錄，「出訪」頁面為空白，頂多在中國大陸會見、接見外賓，如柬埔寨副首相、新加坡總

理等。¹² 另外，主管宣傳、時任中央書記處書記的劉雲山有多次出訪記錄，梳理後可發現其由兩大類組成，一為上述所言之多功能性質的出訪，如 2014 年 6 月出訪歐洲四國且有各別推動夥伴關係、行銷高鐵等合作項目。¹³ 二為針對社會主義國家的訪問，是中共既有的外交工具，如 2015 年 10 月訪問朝鮮，具有黨對黨交流的意涵，此類型在西方國家的交往互動中尤為明顯，針對該國在黨團進行更深入的交流。¹⁴

（二） 「國是出訪」的資格限定

雖然中國大陸採集體領導，唯有國家主席的出訪才有「國是出訪」的可能，其他領導人的出訪大多為正式訪問、工作訪問、友好訪問等。其他擔任要職的常委如國家副主席、總理也有頻繁出訪的行為，但其訪問多為出訪國家與參加國際多邊會議或國際例行重大活動的「套裝行程」，即具有多功能性質非以訪問特定國家為主要目的的出訪行為。由中共官方媒體新華網所記錄的「領導人活動報道集」囊括中共政治局常委的重要講話、重要活動、參觀考察、會見接見、出訪、致電致信、其他等等，可知一二。¹⁵ 例如 2005 年 12 月新華網與中國大陸外交部記載的「溫家寶訪問法國、斯洛伐克、捷克、葡萄牙和馬來西亞並出席第九次中國－東盟領導人會議和東盟與中日韓領導人會議以及首屆東亞峰會等會議」¹⁶；亦或李克強任總理時 2014 年 12 月 14 日至 20 日「訪問哈薩克斯坦、塞爾維亞並

¹² 「張德江、王岐山分別會見新加坡總理李顯龍」，新華網，檢索時間：2017 年 9 月 20 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7-09/20/c_1121697639.htm>。

¹³ 新華網專題報導，「劉雲山出訪歐洲四國」，新華網，檢索時間：2017 年 11 月 07 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cnleaders/liuyunshan/lys201406cf/>>。

¹⁴ 新華網專題報導，「劉雲山出訪朝鮮」，新華網，檢索時間：2017 年 11 月 07 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cnleaders/liuyunshan/lys201510chx/index.htm>>。

¹⁵ 新華網專題報導，「王岐山活動報導集」，新華網，檢索時間：2017 年 11 月 07 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wjb1125/>>。

¹⁶ 新華網專題報導，「溫家寶出席歐亞五國並出席國際會議」，新華網，檢索時間：2017 年 11 月 07 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wjb1125/>>；「溫家寶總理訪問法國、斯洛伐克、捷克、葡萄牙和馬來西亞並出席第九次中國－東盟領導人會議和東盟與中日韓領導人會議以及首屆東亞峰會等會議」，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檢索時間：2017 年 11 月 07 日，<http://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zt_674979/ywzt_675099/2005year_675849/wjbzlfw_675869/>。

出席國際會議」；¹⁷ 時任副總理的張高麗 2016 年 5 月 30 日至 6 月 7 日「赴俄羅斯舉行中俄能源合作委員會第十三次會議、出席第二屆中俄中小企業實業論壇並訪問阿塞拜疆、格魯吉亞、亞美尼亞」¹⁸；其他包括人大委員長、政協主席等的出訪形式如同上述，對特定國家的訪問為「正式友好訪問」或「正式訪問」。

唯有中國大陸國家主席具「國是訪問」出訪的資格，與其他領導人有所區別，雖其他類型的高層出訪行為亦具有公共外交的意涵與作用，然本文僅探討最高規格訪問形式的對外行為影響與公共外交作用。

三、「國是訪問」政策之變化

本文主要的目的在於探討中國大陸「國是訪問」外交的成因、過程與影響。在本處本文將探討中國大陸「國是訪問」外交中的一些格式化事實，以作為本文後續在評估其成因與影響之前的背景。本研究分析中國大陸在後鄧時期歷年來「國是訪問」在四個重要面向上的變化，包含出訪的次數、訪問的國家數、出訪的國家與地區，以及出訪的時間點。本文目的是分析中國大陸的「國是訪問」行為，並非將中國大陸的最高領導人每一次的出訪紀錄納入分析，「國是訪問」並非一般性的「工作訪問」，其代表的意義與出訪條件相對於「工作訪問」或是「非正式訪問」而言更為重大與嚴謹。

(一) 出訪次數

綜覽中國大陸國是訪問外交政策的變化，並擷取出每年國是出訪的次數分析，本文以圖 2.1 呈現從 1993 年起中國大陸每年的「國是訪問」出訪次數，發現幾項特徵。首先，後鄧時期中國大陸「國是訪問」的出訪次數，除了江澤民在 1993

¹⁷ 新華網專題報導，「李克強訪問哈薩克斯坦、塞爾維亞並出席國際會議」，新華網，檢索時間：2017 年 11 月 07 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cnleaders/lkqcf1412/index.htm>>。

¹⁸ 新華網專題報導，「高麗赴俄羅斯舉行中俄能源合作委員會第十三次會議、出席第二屆中俄中小企業實業論壇並訪問阿塞拜疆、格魯吉亞、亞美尼亞」，新華網，檢索時間：2017 年 11 月 07 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cnleaders/zhanggaoli/zglcf201605/index.htm>>。

年與 1998 這兩年較少僅僅只有出訪過一次之外，其他年份的出訪次數大多保持穩定，江澤民與胡錦濤兩人每年都規律地出訪二至四次。中國大陸領導人從 1993 年到 2015 年這段期間中，每年平均出訪的次數是 3.39 次。其次，相較於他的前兩任領導人，習近平的出訪行為更為活躍、且積極地使用「國是訪問」作為外交工具。習近平除了在繼任領導人後的首年只出訪了相對較少的四次之外，從其繼任的第二年開始，每年至少都有六次以上的出訪（圖 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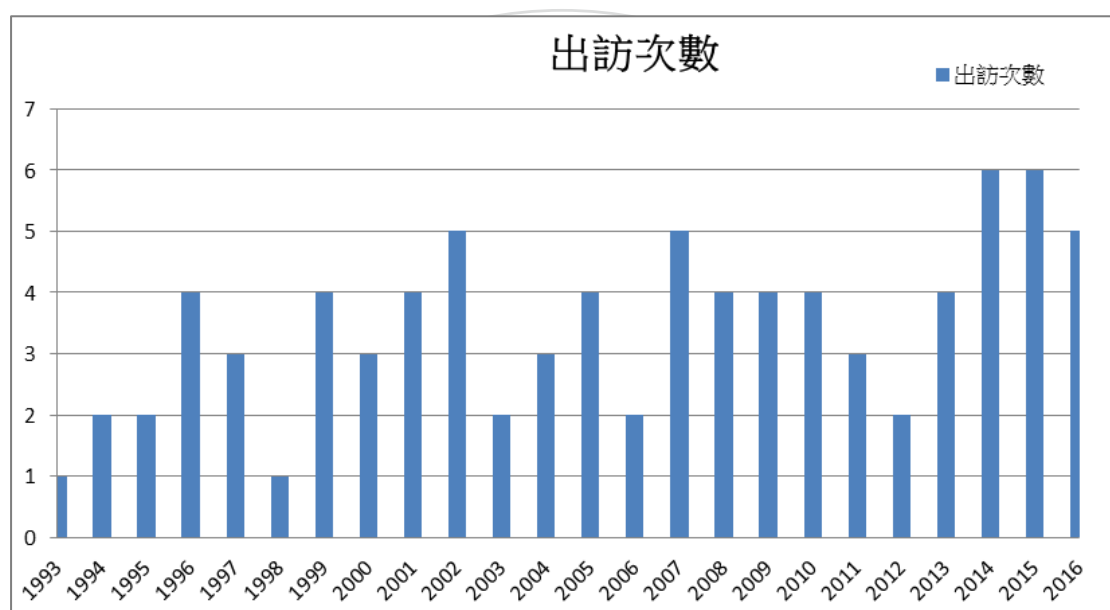


圖 2.1 中國大陸歷年「國是出訪」的次數，1993~2016

資料來源：綜整自新華網國內外大事紀；鍾之成，為了世界更美好：江澤民出訪紀實（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 年）。

說明：國是出訪之確切日期，請參見本文之附表一。

（二）出訪的國家數

接者單獨將中國大陸國是訪問對象數目抽出，並依年份排序製作出下圖 2.2，以國是出訪的國家數目作為切入觀察，特點有二：首先，中國大陸領導人進行「國是訪問」的次數和出訪的國家數目高度相關，也就是說，中國大陸領導人在出訪次數增加的同時也拜訪了更多的國家。其次，中國大陸領導人從 1993 年到 2015

年這段期間中，每年平均訪問 8.65 個國家。中國大陸「國是訪問」出訪國家數的最高峰為 2014 年，在該年習近平訪問了 17 個國家；而出訪國家數最少是在 1993 年與 1998 年，江澤民在這兩年分別都只訪問了一個國家（圖 2.2）。呈現國是出訪次數與訪問國家數目之變化有所關聯外，亦彰顯不同領導人主政時期的外交政策運用差異與此外交工具之使用日趨頻繁的現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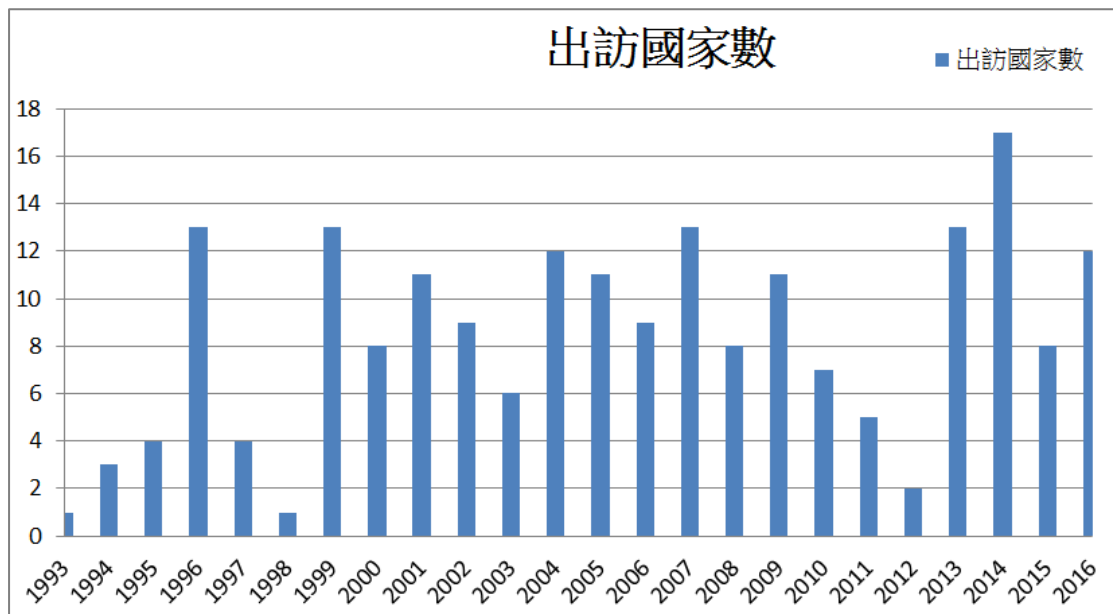


圖 2.2 中國大陸歷年「國是出訪」訪問的國家數，1993~2016

資料來源：綜整自新華網國內外大事紀；鍾之成，為了世界更美好：江澤民出訪紀實（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 年）。

說明：國是出訪之確切日期，請參見本文之附表一。

第二節 國是訪問外交之成因

中國大陸之所以重視並推動「國是訪問」的原因主要出自於三個理由：對冷戰後國際新結構的反應、對「中國威脅論」的回應，以及領導人政治生存的考量。本節將一一分析與驗證上述影響中國大陸「國是訪問」行為的可能原因。

一、 回應冷戰後的新國際結構

大多數的學者對當今中國大陸大戰略在冷戰後逐漸的成型有一定的共識：第一，1991年間蘇聯的垮台舒緩了中國大陸北方的安全威脅和意識形態上的壓力，使其得以推動更具彈性的對外政策。第二，在此同時，鄧小平健康狀況日益惡化，中國大陸外交政策的制定與決策逐漸朝著制度化的方向發展，由個人權威的強勢領導向集體式的決策過程過渡。第三，冷戰結束之後，國際體系從美蘇兩極體系轉變成為美國獨強的單極體系。這三個內外國內外結構因素的突然轉變，形塑了冷戰後當代中國大陸大戰略。¹⁹ 此國際新結構下，中國大陸的領導人瞭解到，美國領導下的單極體系，對中國共產黨而言最佳的策略應該包含了兩個層面：一方面，中國大陸必須努力維持高速的經濟成長，以確保中共政權的正當性可以藉由經濟上的良好表現而持續鞏固。因此，中國大陸作為一個理性的行為者，對於新單極國際結構的回應表現為，在美國所主導的世界貿易體系中加入世界市場，以及確保經濟發展所需的各種重要資源得以穩定供給。另一方面，隨著中國大陸綜合實力的增長，將無可避免的帶給周邊的東亞國家安全上的顧慮，因此，中國大陸最理性的政策為盡量抑制侵略性的行為，以避免東亞國家與美國合作，組成一個反制的聯盟來圍堵中國的發展。²⁰ 也因為中國大陸實力的快速增長已然引起周邊國家的注意，且其地緣政治複雜，區域的均勢改變給予美國涉足亞太事務的動機，中國大陸遂加重實行公共外交的努力，以應付國外的挑戰和維持國內的發展。於此邏輯下，公共外交與「國是訪問」的努力因而成為冷戰後中國不可或缺的外交工具。據此，若為對新國際結構的回應，即冷戰結束後的新國際結構是因果關

¹⁹ 寇健文，*中共菁英政治的演變：制度化與權力轉移 1978-2004*，（台北：五南，2005年），頁313~357；寇健文，「中共與蘇共高層政治的演變：軌跡、動力與影響」，*問題與研究*，第45卷第3期（2006），頁39~75；Lowell Dittmer, "The strategic triangle: An elementary game-theoretical analysis," *World Politics*, Vol. 33, No. 4 (July 1981), pp. 485~515; Avery Goldstein, Edward E. Steinfeld, *Playing Our Game: Why China's Rise Doesn't Threaten the West*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²⁰ Avery Goldstein and Edward E. Steinfeld, *Playing Our Game: Why China's Rise Doesn't Threaten the West*; Randall L. Schweller, "After Unipolarity: China's visions of international order in an era of US declin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6, No. 1 (Summer 2011), pp. 41~72.

係中的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應檢證以下假說：

H1：冷戰結束後中國大陸的「國是訪問」無論是在出訪頻率或是訪問國家的數目上都比冷戰結束前還要多。

對假設一的驗證相對直接明瞭，只要比較中國大陸在冷戰結束前後的出訪頻率與訪問的國家數目是否有明顯的差距即可。在冷戰結束之前，在中國大陸實際掌權大權的最高領導人分別為毛澤東、華國鋒、鄧小平，雖然 1982 年後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由李先念、楊尚昆擔任，但著眼於實際掌權者仍為鄧小平，李先念以及楊尚昆的出訪非能與毛澤東和鄧小平相題而語，故在中共菁英政治制度化發展前僅以毛、華、鄧三人為主。²¹ 冷戰前期中國大陸最高領導人的出訪甚少，僅有毛澤東曾經以國家主席的身分在 1949 年和 1957 年訪問過蘇聯。其二乃毛澤東欽點的接班人華國鋒，在 1978 年訪問了朝鮮、羅馬尼亞、南斯拉夫、伊朗等國。其三為在毛澤東之後長期掌握實權的鄧小平，曾經以國務院第一副總理的身分在 1957 年至 1982 年這段期間先後訪問過蘇聯、北韓、法國、緬甸、尼泊爾、日本、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和美國。值得注意的是，在 1978 年後鄧小平取代華國鋒成為中國大陸無所爭議的最高領導人，鄧小平曾分別在 1979 年訪問美國和在 1982 年訪問朝鮮。這兩次出訪為冷戰結束之前同時身兼政務以及黨務二種身分性質的中國大陸最高領導人的最後一次出訪。²² 中國大陸實際掌權之最高領導人接下來一直要到 1993 年江澤民繼任當政後，才有了睽違十二年的首次最高領導人國是訪問，此後出訪的次數與訪問的國家數才開始逐年增加。

除了在冷戰結束前後的出訪頻率與訪問的國家數目是否有明顯的差距之外，中國大陸最高領導人在冷戰結束前的出訪就其根本性質而言，也與冷戰結束後大

²¹ 此時期的中國大陸屬強人政治，無法完全以職務的高低界定影響力與權力，如 1992 年鄧小平以一介無職位黨員身分南巡，左右當時中央與地方領導人的路線、確立了中國大陸日後的改革開放。

²² 關於冷戰結束前中國大陸實際掌權之最高領導人的出訪次數與出訪國家之統計，詳細請見本文的附表二。

不相同。冷戰結束前鄧小平的「國是訪問」，究其性質，實為封閉多年的中國大陸向西方世界打交道的第一步，因此在公共外交宣傳的意義上，其主要目的在於一改毛澤東時代中國大陸的不結盟外交作風，使中國大陸與各大國之間的外交關係正常化；²³ 而在冷戰結束之後，從江澤民以降的中國大陸最高領導人之「國是訪問」，其目標已經明顯轉向塑造「中國形象」之目的。這個冷戰前後中國大陸「國是訪問」在行動次數上和代表意義上的顯著差距，說明了「國是訪問」確實是中國大陸在冷戰結束後因應新國際結構的新外交策略。

二、對「中國威脅論」的回應

中國大陸政治菁英在 1990 年中期逐步取得共識，確立穩定的中國大陸大戰略的同時，在其他國家中，「中國威脅論」的說法亦隨之浮現。²⁴ 中國大陸作為一個非民主、且人權紀錄極差的政權，在外界的看法中，逐漸形成了「一個快速崛起的非民主國家將成為一個區域與全球和平的重大威脅」的輿論傾向，此外，成熟的現實主義因素、缺乏的自由主義因素，以及在建構過程中的中國大陸與各國之間的種種負面互動經驗，在在都指出隨著中國大陸快速崛起所可能帶來的潛在威脅。²⁵

除了這些結構性的因素之外，另外兩個事件也加劇國際社會中其他行為者對中國大陸可能帶來潛在威脅的憂慮。第一個是《大國政治的悲劇》(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這本暢銷書的出版，作者米爾斯海默提出了攻勢現實主義，認為中國大陸與諸如日本、美國等強權國家間將有一場不可避免的大規模衝突。

²³ 蔡東杰，*當代中國外交政策*（三版），頁 20~24。

²⁴ Denny Roy, "The 'China Threat' Issue: Major Arguments," *Asian Survey*, Vol. 36, No. 8 (August 1996), pp. 758~771; Yong Deng, "Reputation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China Reacts to the China Threat Theory," in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 Ross eds.,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²⁵ Aaron Friedberg, "The future of US-China relations: Is conflict inevitabl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2 (Autumn 2005), pp. 7~45; Michael W. Doyle, *Ways of War and Peace: Realism, Liberalism, and Socialism* (NY: WW Norton & Co Inc., 1997).

²⁶ 另一個事件是自從中國大陸在 2001 年成為世界貿易組織的會員國之後，其經濟實力持續以驚人的速度成長，且在數年之內以極快的速度超越德國和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不僅在 2005 年到 2011 年之間推動總值超過 4 千億美元的對外直接投資。²⁷ 此外也於 2016 年正式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成為有能力可以主導國際金融秩序的主要大國之一。一個專制的、強大的、理論上而言是危險的中國大陸，在其他國家的認知上，遂成為潛在的安全威脅。²⁸ 中國大陸的政治菁英對此情況瞭然於胸，並意識到若中國大陸對此毫無作為任其發展，中國大陸大戰略將為形勢所逼，在其他國家選擇與美國結盟、塑造阻礙中國大陸成長的圍堵聯盟下被迫妥協。

根據主流國際關係理論，「國是訪問」可以透過幾種方式降低中國大陸所帶來的威脅感。首先，理性選擇理論認為，衝突前的對話和協商是避免戰爭的有效辦法。²⁹ 「國是訪問」的運用無疑是雙邊領導人正面的相互溝通渠道。第二，新自由制度主義主張重複互動有助於解決囚徒困境與促進合作。³⁰ 藉由「國是訪問」，雙邊領導人皆對未來進一步合作有所期待，因而得以降低起於互動不足的衝突。第三，自由主義中的貿易和平論主張經濟互賴與交流能促成和平。³¹ 「國是訪問」與隨後的雙邊經濟合作，使中國大陸創造與他國更緊密的經濟關係之利基，故能緩和對其威脅的顧慮。第四，社會建構主義強調社會建構過程的重要性，認為國

²⁶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Y: WW Norton & Co Inc., 2001).

²⁷ 此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所公開發布之「2012 年中國統計年鑑」中所公布的資料，網址請參閱 <<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2/indexch.htm>>。

²⁸ 李思嫻，「中國威脅論下的『和平崛起』論述」，*人文社會學報*，第 11 期（2015），頁 53~80；Aaron Friedberg, “The future of US-China relations: Is conflict inevitabl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2 (Autumn 2005), pp. 7~45.

²⁹ James D. Fearon, “Rationalist Explanations for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9, No. 3 (Summer 1995), pp. 379~414; Bruce Bueno de Mesquita and David Lalman, *War and Reaso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Imperative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³⁰ Kenneth A. Oye, “Explaining Cooperation under Anarchy: Hypotheses and Strategies” *World Politics*, Vol. 38, No. 1 (October 1985), pp. 1~24; Robert O.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³¹ John R. Oneal and Bruce Russett, *Triangulating Peace: Democracy, Interdependence,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NY: WW Norton & Co Inc, 2001); Zeev Maoz, “The Effects of Strategic and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on International Conflict across Levels of Analysi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53, No. 1 (January 2009), pp. 223~240.

家間的相互認知與利益與關係是透過互動的實踐所建立的。³² 在此邏輯下，「國是訪問」塑造正向的互動實踐，能加速雙邊關係的發展。綜上所述，在主流國際關係理論的基礎上，「國是訪問」對中國大陸而言不啻為削減「中國威脅感」的務實選擇。

因此，若對「中國威脅論」的回應是影響中國大陸進行「國是訪問」的其中一項主因，則可以通過檢定下面的假設來測試：

H2：中國大陸「國是訪問」的行為與「中國威脅論」變動起伏相呼應。

藉由網路服務中最大的搜尋引擎 Google 以「中國威脅」(China threat) 為關鍵字，在該年的平均相對搜尋頻率作為觀察考量。Google 搜尋引擎提供以每個月為單位的相對搜尋頻率，如果該月是該關鍵字有史以來被搜尋最頻繁的一個月，則該月的相對搜尋頻率即為 100%，而該關鍵字被搜尋次數僅有最頻繁月份的一半之多的另一個月，其相對搜尋頻率即為 50%。本文將每一年 12 個月的相對搜尋頻率予以平均，以算出該年的平均相對搜尋頻率，利用 Google 所提供可檢索的時間範圍 2004 年到 2015 年，製作下圖 2.3。³³

圖 2.3 的虛線為以「中國威脅」為關鍵字的在該年的平均相對搜尋頻率，實線為歷年中國大陸出訪的次數，虛點線為歷年中國大陸出訪的國家數。以「中國威脅」為搜尋關鍵字的高峰出現在 2005 年，其後呈現逐年降低的頻率(圖 2.3)。如果中國大陸的「國是訪問」是以消弭他國對中國大陸所帶來的威脅感受為主要目的，則我們應該要在圖 2.3 中發現中國大陸「國是訪問」的行為應該要與「中國威脅」的輿論消長有一定相關連動性。然而，比較國際間對「中國威脅論」的

³² Alexander 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6, No. 2 (Spring 1992), pp. 391~425;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³³ 目前學界已有不少學者採用此方式來探測他國感受到中國威脅的程度，且發表於國際關係中的優良期刊、頗具影響力的專書及政策報告中。例如 Alastair Iain Johnston, "How New and Assertive is China's New Assertivenes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7, No. 4(2013), pp. 7~48.一文之中，Johnston 曾以每一年使用者在 Lexis Nexis 學術資料庫中搜索中國(China)和強勢(assertive)這兩個關鍵詞的次數來看他國研究者是否感受到中國的外交政策有改採強勢作為的傾向，請參見頁 10。

搜尋頻率與國是訪問策略使用的軌跡，清楚地呈現中國大陸「國是訪問」的策略執行相對穩定，不論是出訪的次數或是出訪的國家數並未隨著「中國威脅」的輿論有起伏消長。此外，在「中國威脅」最高峰的 2005 年前後，中國大陸並未積極增加「國是訪問」的使用，而且在「中國威脅」之說相對不盛行的 2012 年之後，中國大陸反而更積極地進行「國是訪問」。可見消弭「中國威脅」輿論的考量並非是直接影響到中國大陸「國是訪問」變動的主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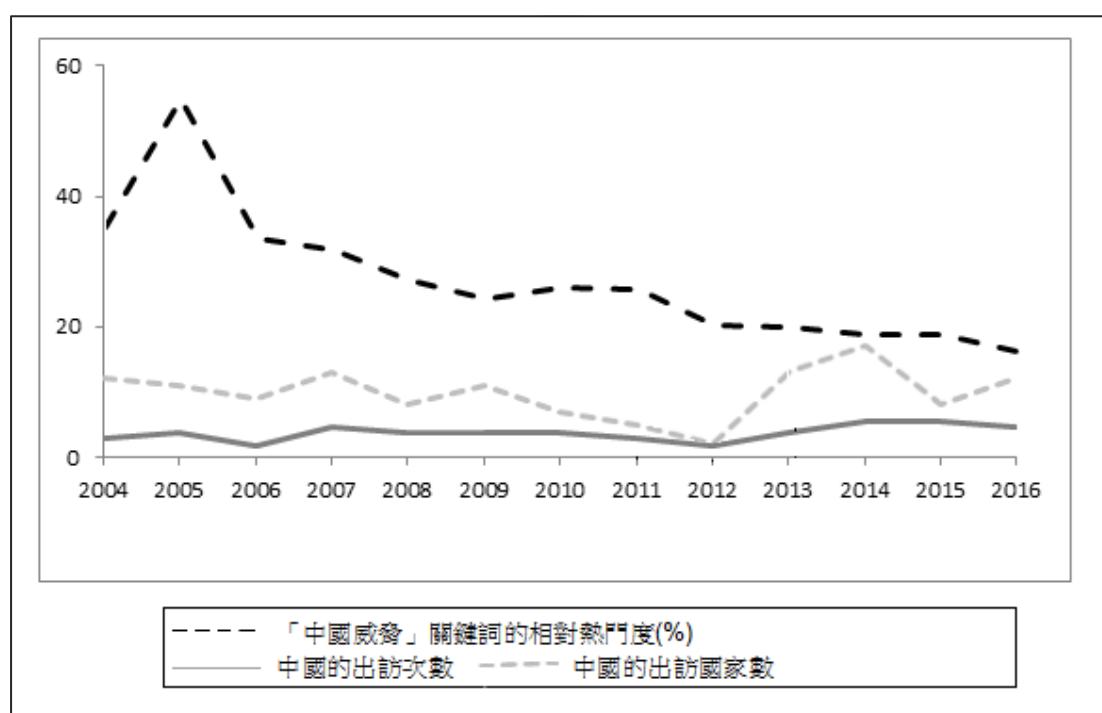


圖 2.3 歷年 Google 關鍵字搜尋「中國威脅」(China threat) 之頻率

資料來源：“China Threat,” **Google Trends**, November 1, 2015, <<https://www.google.com/trends/>>.

三、 領導人政治生存的考量

在非中國大陸學者所做的中國大陸公共外交研究中，有一個非常熱門的論述認為「國是訪問」事實上是反映了中國大陸領導人的政權掌控能力。當領導人尚未穩定權勢時，其將以處理國內問題為首要，避免頻繁地離開國內權力中樞實行

國是出訪策略；相對地，若領導人政權鞏固、掌握實權，他會選擇出國訪問其他國家，意圖在國內與國際社會進行宣傳，彰顯其作為中國大陸最高領導人的重要地位。

從獨特黨國體制的制度化發展及其政策產出與推行，顯示中共最高領導人政治繼承後權力鞏固程度變化。尤其在中國大陸國力增強接軌世界、中共菁英政治日趨制度化後，不僅外交決策受到影響，政務系統亦是，由中國大陸國家主席從單純的虛位元首變成國家象徵可清楚看出。³⁴ 如果中國大陸的「國是訪問」行為受到領導人的政治生存週期的因素影響，則應該要驗證以下的假設：

H3：中國大陸領導人在初階班的政權繼承時期，其於「國是訪問」的作為將與其在任期中後期的政權鞏固時期有不同的行為表現。

承接上節對國是訪問外交政策之資料分析，觀察後鄧時期歷年來國是出訪之次數與出訪國家數目，在比較不同領導人時期的國是訪問外交工具使用情形，有三項特點值得注意：第一，中國大陸「國是訪問」的次數和出訪國家數目在中國大陸領導人初接權力時有減少的現象，且在領導人掌政的中、後期有增加的趨勢，即在整體上呈現週期性之波動變化（圖 2.1、圖 2.2）。第二，後鄧時期的三位中國大陸領導人在「國是訪問」的行為上有一個共通點，就是他們「國是訪問」的次數和出訪的國家數目皆會在出訪美國的前一年大幅增加（表 2.1）。關於後鄧時期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三位最高領導人之國是訪問策略運用、特色將在後續第參至伍章中呈現。而有關中國大陸最高領導人國是訪問之比較則將在後續第柒章中探討。

³⁴ 許志嘉，*中共外交決策模式研究：鄧小平時期的檢證分析*（台北：水牛出版社，2000年）；寇健文，「中共『幹部年輕化』與政治繼承」，*中國大陸研究*，第44卷第5期（2001），頁1~17。

表 2.1 後鄧時期中共領導人「國是訪問」出訪次數與訪問國家數目之比較
(1993~2016)

江澤民 (1993~2002)			胡錦濤 (2003~2012)			習近平 (2013~)		
年份	訪問次數	出訪國家數目	年份	訪問次數	出訪國家數目	年份	訪問次數	出訪國家數目
1993	1	1	2003	2	6	2013	4	13
1994	2	3	2004	3	12	2014	6	17
1995	2	4	2005	4	11	2015	6	8 (US)
1996	4	13	2006	2	9 (US)	2016	5	12
1997	3	4 (US)	2007	5	13			
1998	1	1	2008	4	8			
1999	4	13	2009	4	11			
2000	3	8	2010	4	7			
2001	4	11	2011	3	5			
2002	5	9	2012	2	2			

資料來源：綜整自新華網國內外大事紀；鍾之成，*為了世界更美好：江澤民出訪紀實*（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年）。

說明：括號中的 US 為在該年出訪美國。粗黑色數字表示在該年出訪的國家數目，較前一年大幅增加。

以上的模式間接地支持著假設三的說法：中國大陸「國是訪問」的運用與中國大陸領導人的權力週期有著密切的連動關係。除了從領導人接掌權力的週期來判斷之外，本文進一步觀察中國大陸的主要政治事件是否與中國大陸「國是訪問」行為的變動有所關聯。本文先主觀的列出一般大眾都聽聞過的大事件，製作下圖 2.4。從中可以間接發現，中國大陸「國是訪問」的出訪次數出現明顯減少之時，該年中國內部皆發生重大的政治事件，而其他國際事件、兩岸事件則較無影響。即便諸如台海危機、SARS、舉辦奧運、世界博覽會、加入 WTO 等重大事件發生，與事件前一年之「國是訪問」的出訪次數相較，並未對於中國大陸「國是訪問」的次數帶來太大的影響；反之，當出現政治菁英權力轉移與權力鬥爭，諸如接班、打貪反腐、高員落馬等事件時，中國大陸最高領導人則有較少離開國內政治圈進行出訪的現象，使得「國是訪問」的出訪次數與前一年相比出現明顯的減

少。後鄧時期，中共政治繼承以制度化發展避免風險、確保權力的合法性與和平轉移，形成一循環的政治權力變化，表現在中國大陸最高領導人的國是訪問行為上是相似的週期循環。³⁵ 以下針對「國是訪問」明顯減少的年度分析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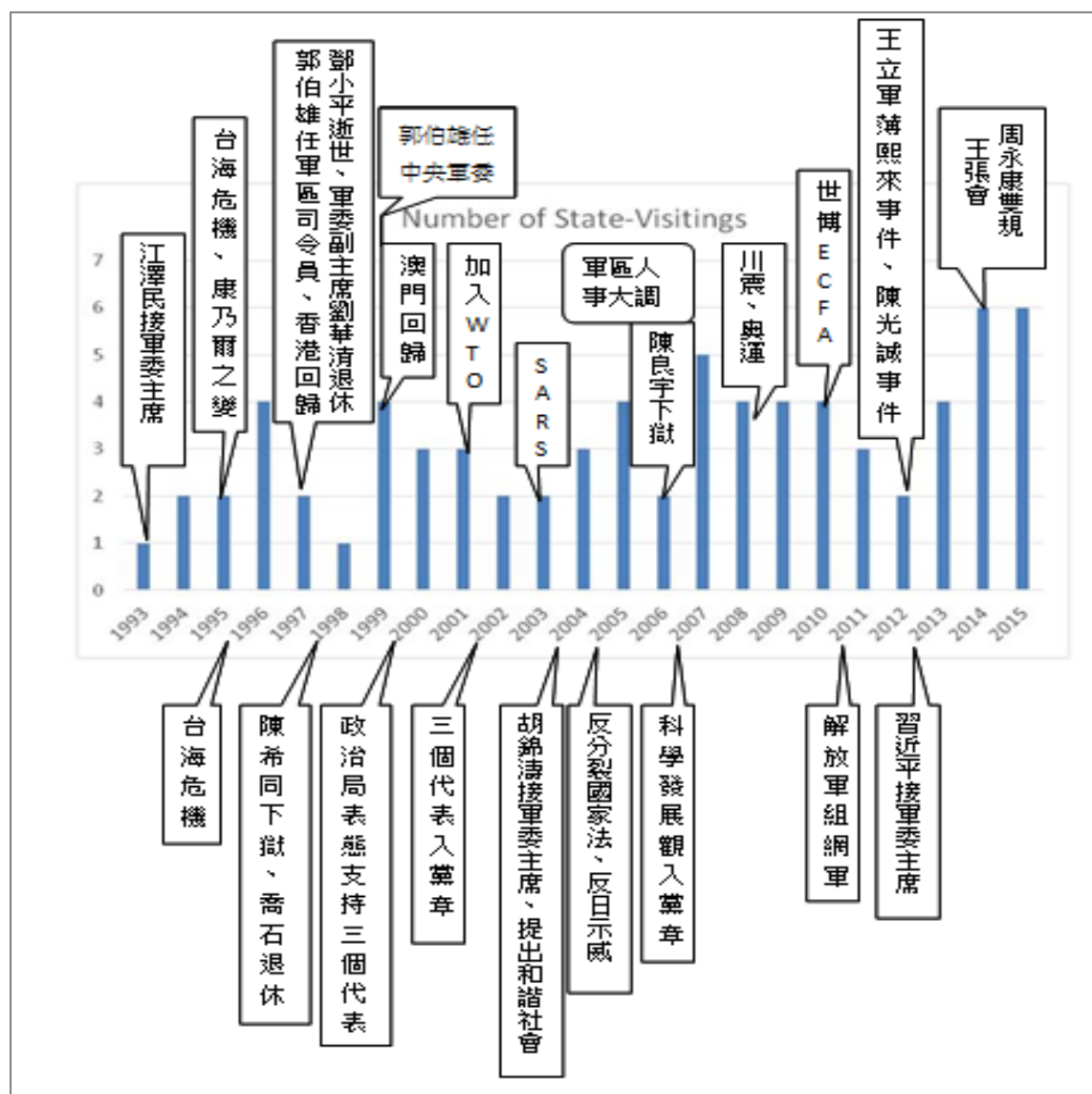


圖 2.4 主要政治事件與中國大陸「國是訪問」行為的變動

資料來源：綜整自新華網國內外大事紀；維基百科；鍾之成，為了世界更美好：江澤民出訪紀實（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年）。

³⁵ 由冀，「中共十七大：承上啟下的政治繼承」，陳德昇主編，中共「十七大」政治菁英甄補與地方治理（台北：印刻出版社，2008），頁 190~202；包淳亮，「當代中共權力繼承的制度限制」，東亞季刊，第 33 卷第 1 期（2002），頁 25~36；朱新民，1978-1990 中共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八十年代後中國大陸的政治發展（台北：永然文化出版社，1990年）。

(一) 江澤民 1993 年掌握黨、政、軍大權後，同年進行首次「國是訪問」

江澤民掌握「三位一體」的黨、正、軍大權後，1993 年成為中國大陸最高領導人，並進行國是訪問。軍委主席一職代表了中國大陸的武裝力量，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與「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是一個機關兩塊招牌，在黨指揮槍的原則下，國防軍事的指揮決策權與人民解放軍的武裝力量的實權，實握於中央軍委主席之手，因此總書記若兼任軍委主席即等同實掌大權。而中國大陸國家主席則是政務系統的最高領導，雖不享有實際的行政權及軍權，但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最高代表。江澤民自 1989 年即接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但直至 1990 年 3 月接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1993 年 3 月接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1993 年掌握「三位一體」成為實質上的最高領導人之後，才有了首次的「國是訪問」，此次訪問也是中國大陸闊別 12 年之久才再度重啟的「國是訪問」。

(二) 1997 年郭伯雄任軍區司令員、鄧小平逝世、劉華清退休

1997 年鄧小平逝世後，中共中央權力的遞嬗反映在其親近部署的離退(如劉華清退休)與新進勢力的填補。此時江澤民雖掌握三位一體的政治大權，著眼於權力的鞏固與國內既有均勢的失衡，其應專注於內部政治生態。³⁶ 在軍區的人事異動上，明顯可見的事件為郭伯雄(屬江澤民的人馬)的升職以及劉華清(屬鄧小平的人馬)的離任。由此觀察可清楚發現，在權力交接的 1997 年江澤民的出訪次數比 1996 年減少。

(三) 1998 年陳希同下獄、喬石退休

在中共集體領導的原則下，當其最高決策層的權力出現變動時，經常伴隨著黨內要員的清算事件，反映著各派系之間的角力與新掌權者立威的回應，如 1998

³⁶ 陳德昇、陳陸輝，「中共『十七大』政治菁英甄補與地方治理策略」，*中國大陸研究*，第 50 卷第 4 期(2007)，頁 63~65。

年陳希同擔任政治局委員於屆中被罷黜。陳希同事件的背景始於王寶森事件，1994年接獲密報、隨著1995年中紀委開始審查陳希同、十四屆五中全會被撤銷中共常委、1997年開除陳希同黨籍、1998年判刑下獄，直至1998年全案定調。³⁷ 事件脈絡呈現國內政治權力交鋒掣肘，彰顯江澤民勢力的鞏固過程。北京市長陳希同與自上海進駐中南海的江澤民兩人之間的權力火花與不和諧時有耳聞，陳希同於北京勢力持續坐大對逐步掌權的江澤民而言無異如鯁在喉，1998年陳希同在歷經中紀委開除黨籍後判有期徒刑，是自1990年代中期後首位遭去職的政治局委員，同年喬石在江澤民的壓力下退休，以利中共政治離退的制度化建立，顯示中共內部權力的轉移。³⁸

（四）2004年胡錦濤接任軍委主席

如上述，軍委主席一職在中共政治生態內所代表的權力，非僅是國防軍事的指揮權，而是最高領導人確切掌握武裝力量的依據，胡錦濤於2003年接任國家主席，在尚未接掌軍委主席大權前，其權力未稱鞏固，在2004年胡錦濤接任軍委主席後，呈現在「國是訪問」的表現上，即為在2004年之後出訪的次數就開始相對穩定。

（五）2006年陳良宇事件、軍區人事大調動

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是繼陳希同後第二位被判刑革職的政治局委員，加上同年軍區人事大幅調動，彰顯中共內部權力的運作脫離常軌，對照該年胡錦濤「國

³⁷ 「陳希同：與薄熙來遭遇何其相似」，中央社 CAN News，2012年5月29日，檢索時間：2017年12月28日，

<<http://www.chinese.rfi.fr/%E4%B8%AD%E5%9B%BD/20120529-%E9%99%88%E5%B8%8C%E5%90%8C%E6%84%9F%E5%8F%B9%E4%B8%8E%E8%96%84%E7%86%99%E6%9D%A5%E9%81%AD%E9%81%87%E4%BD%95%E5%85%B6%E7%9B%B8%E4%BC%BC>>; 「揭秘陳希同、陳良宇獄中生活」，多維新聞，2013年8月22日，檢索時間：2017年12月28日，<<http://culture.dwnews.com/history/big5/news/2013-08-22/59318830-all.html>>。

³⁸ 包淳亮，「論中共權力接班的制度化—從十五大喬石退休談起」，東亞季刊，第32卷第2期（2001），頁75~92；陳奕廷，「中共改革開放以來權力繼承之研究」，中國文化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碩士班學位論文（2009），頁54~55。

是出訪」紀錄可見出訪次數亦大幅減少。³⁹ 陳良宇事件的背景是挪用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社保基金)的弊案，2005年接獲密報、2006年9月胡錦濤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便已定調此案，陳良宇被雙規並免去黨內與黨外一切職務。⁴⁰ 在此次事件的同年(2006年)，胡錦濤「國是訪問」的出訪次數與前幾年相比明顯大幅減少，而前述國際與兩岸的重大事件則對胡錦濤「國是訪問」次數的影響相對較小，若比較2006年前後的反分裂國家法出台、汶川大地震、舉辦奧運等等重大事件，可看出胡錦濤「國是出訪」的行為未有太大得變動，唯2006年是胡錦濤掌握軍權後「國是訪問」次數最顯著減少的一次。

(六) 2012年薄熙來事件

雖然胡錦濤有著比江澤民更穩定與頻繁的「國是出訪」行為，但在2012年時，一連串的重大政治事件出現，同年胡錦濤出訪的次數也大幅減少。2012年的大事件包括了年底十八大的召開影響到權力的交接，以及從2011年開始延燒到2012年的一連串與薄熙來相關的事件，隨之呈現的就是胡錦濤在2012年出訪的次數減少到僅僅只有兩次的國是出訪。⁴¹

綜上所述，雖無法完全排除其他可能影響「國是出訪」行為的事件因素取得精準的推論，但藉由資料的梳理，可見中國大陸最高領導人「國是訪問」的行為與「國內菁英政治因素」之相關性，明顯大於「國際事件與兩岸事件」之相關性。在最高領導人交替的權力繼承初期，「國是訪問」的次數相對少，而在其接任軍委掌握武裝力量後，於國內政治生態達到一定程度的權力穩定，「國是訪問」的

³⁹ 寇健文，「邁向權力核心之路：一九八七年以後中共文人領袖的政治流動」，*政治科學論叢*，第45期(2010)，頁7-8。

⁴⁰ 「陳良宇案暴露中國政治體制問題」，*BBC中文網*，2006年9月29日，檢索時間：2017年12月29日，〈http://news.bbc.co.uk/chinese/trad/hi/newsid_5390000/newsid_5393000/5393044.stm〉；「從陳希同到陳良宇：中國肅貪十年變遷」，*瀟湘晨報*，2013年6月6日，檢索時間：2017年12月28日，〈http://www.360doc.com/content/13/0612/15/5909776_292368697.shtml〉。

⁴¹ 薄熙來事件的重大事項包括了：2011年的海伍德案、2012年2月王立軍奔投美國大使館、2012年3月薄熙來被撤銷重慶市委書記職務，直至2012年11月十七屆七中薄熙來被撤銷黨籍，可參閱：「小資料：薄熙來事件回顧」，*BBC中文網*，2013年8月21日，檢索時間：2017年12月28日，〈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3/07/130725_boxilai_timeline〉。

次數也開始增加且次數穩定；若中國大陸內部出現重大政治事件，最高領導人「國是訪問」的行為相較於前一年將明顯減少。凡此種種，皆暗示著中共領導人政治生存的考量，為驅動「國是訪問」行為的關鍵。

第三節 小結

國是訪問為中國大陸公共外交政策的重要一環，不僅因其具政策延續性與常態性地為後鄧時期最高領導人所用，由實行之頻率軌跡透露中國大陸外交政策的方向和領導人性格、偏好、掌權狀態等相關資訊；更因為此外交策略為最正式的國際交往形式，工具性價值極高且廣為國際社會接受，有助於直接的雙邊溝通與協調。冷戰後，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等中國大陸最高領導人大幅地施展國是訪問外交策略，甚至有逐步地增的現象。背後的考量是對中國大陸如今躍升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成為區域中不可忽視的強權後，他國在理性考量、歷史糾葛、利益爭奪、主權顧慮等等因素下而生的不安全感，即中國大陸的崛起為國際體系中其他行為者帶來了潛在的威脅與憂慮。然而，當今中國大陸需要一穩定的外部環境，以遂行其和平與發展原則下的大戰略。因此，如何以成本最小且最易被接受的外交政策改善外界的觀感，進一步傳達訊息、增進雙邊合作、減少爭端誤會、達成領導人間相互了解，是中國大陸刻不容緩的課題，也是國是訪問外交策略的重要性所在。

中國大陸的公共外交為一新興的議題，在二十世紀末期發展，二十一世紀逐步成熟，成為學界討論的重心與中央政策的一環，尤其在十八大政治報告中「公共外交是補充」作為外交戰略的新提出，中國大陸外交布局與戰術考量日益清晰。經過一段時間的醞釀與嘗試，中國大陸對公共外交的定性定調時間點在胡錦濤主政時期才得明確，與國是訪問外交策略的操作或有時間的不一致。然而，考量國是訪問之公共外交精神與延續性，以及經過資料二次檢驗於 1993 年起始、2002

年起始兩個時間切點的結果並無顯著的不同。由此以公共外交途徑分析國是訪問外交策略應從 1993 年起涵蓋江澤民、胡錦濤之完整性十年任期。

本文經由對三項假設的分析，了解國是訪問外交策略的成因，探討其是否出於對冷戰後國際新結構的反應、對「中國威脅論」的回應，以及領導人政治生存的考量。首先比較冷戰前後，中國大陸最高領導人的出訪記錄可以明顯的發現其中差異，顯示「國是訪問」確實是中國大陸在冷戰結束後因應新國際結構的新外交策略。其次，以歷年來全球藉由 Google 搜尋之「中國威脅」(China threat) 關鍵字的頻率，對照中國大陸國是訪問的變化軌跡，兩者波動起伏的不一致可見消弭「中國威脅」輿論的考量並非是直接影響到中國大陸「國是訪問」變動的主因。再次，比較 1993 年至 2015 年中國大陸國際、兩岸、內部相關事件的發生節點與國是訪問外交策略的變動，呈現出中國大陸最高領導人「國是訪問」的行為與「國內菁英政治因素」之相關性，明顯大於「國際事件與兩岸事件」之相關性。綜論之，中國大陸國是訪問外交政策之驅動因素，是對後冷戰新的國際結構的應對以及領導人政治生存的考量。為深入了解不同領導人主政時期的國是訪問策略實行內涵與特色，下文中將個別剖析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三人的國是出訪行為。

第參章 江澤民時期國是訪問

第一節 訪問次數與對象

本文將觀察中國大陸在不同領導人主政下進行「國是訪問」所著重的國家與地區變化，以闡述不同時期國是訪問的內涵與實踐。國家地區之分類依據中華民國外交部網站，不屬於歐洲地區的國家則歸為亞洲與太平洋地區(亞太)；而中東地區乃據美國大中東計畫分類，包括阿拉伯聯盟 22 國、伊朗、土耳其、以色列、巴基斯坦、阿富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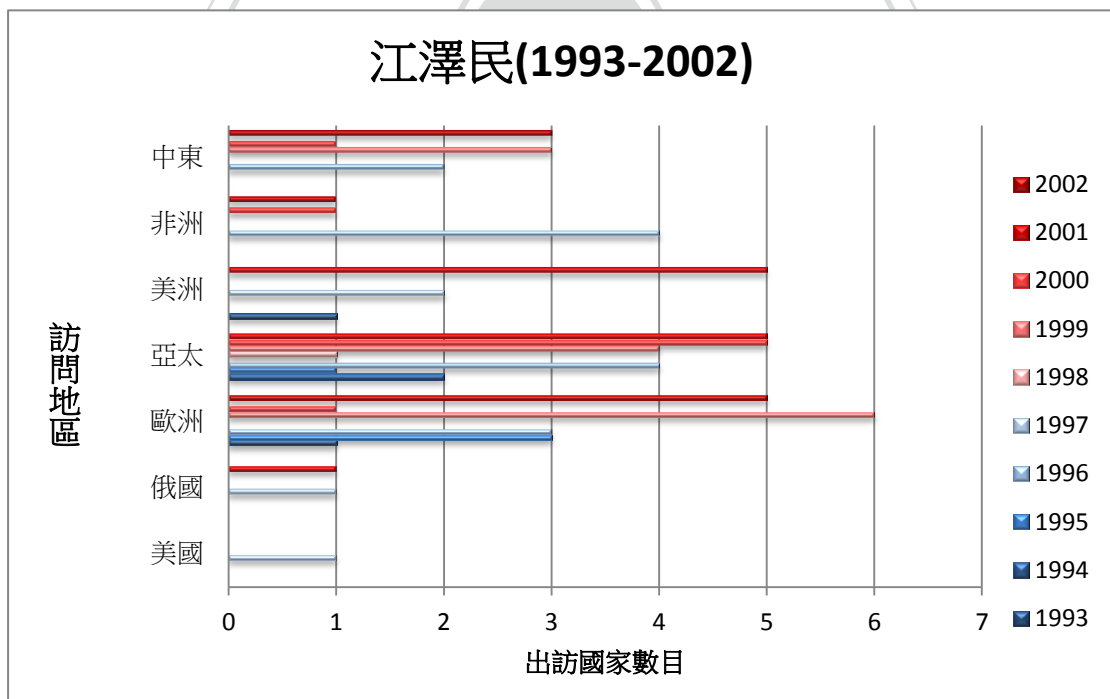


圖 3.1 江澤民歷年「國是出訪」訪問的國家與地區，1993-2002

資料來源：綜整自新華社報導、新華網領導人出訪專題、新華網國內外大事紀以及鍾之成，為了世界更美好：江澤民出訪紀實（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 年）。

說明：藍色線條為江澤民的第一個任期，紅色線條為江澤民的第二個任期。

江澤民主政時期，中國大陸以「國是訪問」作為外交工具的情形有兩個特徵：第一，江澤民在擔任第二任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的期間，出訪的次數與出訪的國家數都多過於他的第一個任期。第二，相較於世界上其他的地區，江澤民的出訪明顯著重於亞太國家與歐洲國家，其對此二地區投注的程度，大於同一時期的其他地區，如圖 3.1 紅色與藍色線段在不同區域的比例有明顯的差別。

第二節 內涵與實踐

中國大陸最高領導人往往藉由國是訪問廣泛參與諸多官方活動、走訪名勝、致贈禮品、拜會政府官員，增加媒體曝光吸引焦點外，也確保訊息被最大程度的傳播予受訪國。隨著中共日益加重公共外交，甚而在政治報告中成為外交布局的一環，中國大陸最高領導人出訪時也越來越重視所謂的「民間時刻」。藉走訪受訪國民眾的日常生活形成話題、展現個人風采，此外這些輕鬆時刻往往才是受訪國民眾感興趣、會主動關注並留下記憶點的報導。領導人在繁忙的行程安排中與民間不同群體、目標聽眾互動交流，無形中拉近距離，改善形象達到公共外交的目的。本文欲探討後鄧時期中國大陸最高領導人國是訪問的驅動成因與成效，非歸納整理每次國是訪問領導人的行為涵義與訊息解讀，故於此節中僅呈現領導人訪問美國與日本兩國的特色及公共外交之行為關聯，以作為民眾觀感改變的支持與參照。

美國與日本的民眾對中國大陸的態度是否在中國大陸進行「國是訪問」之後有所改善？之所以選擇美國和日本，除了中國大陸與這兩國之間的關係都是中國大陸所想要積極改善的「大國間關係」之外，也是基於一個最低可能性(least likely case selection)的研究設計考量，因為美國為當代國際體系的領導者，而國際關係理論普遍預期中國大陸的崛起可能具有改變體系領導者的制度安排的性質，至於日本則為中國大陸在亞洲的主要對手國，而且中日關係從二戰以來齟齬不斷，也是普遍被認同的事實。因此，如果中國大陸的「國是訪問」在可能性最低的美

國和日本兩國都能夠帶來改善雙方彼此印象的效果，則中國大陸的「國是訪問」可說是一項相當成功的策略。

以下將以國是訪問是否成功降低他國對中國大陸威脅的感受、是否促進與其他國家的雙邊共同利益，檢視其成效。

一、降低他國威脅感受之程度

(一) 美國民眾對中國大陸的態度

下圖 3.2 為蓋洛普公司(Gallup)從 1979 年 9 月開始所做的民調，調查美國民眾對中國大陸整體的觀感，選項分別為：非常有好感、基本上有好感、非常沒有好感、基本上沒有好感。¹ 本文擷取 1991 年至 2002 年的數據，在 1996 年之前，Gallup 只有在 1991 年和 1994 年分別做過兩次調查，在 1996 年以後則是每一年都有做調查。其中 1998 年、1999 年和 2000 這三年，Gallup 每年做了三次的調查，故取這三年的民意值的調查平均數。本文把回答「非常有好感」與「基本上有好感」的比率加總為對中國大陸「持正面態度」，把回答「基本上沒有好感」和「非常沒有好感」的比率加總為對中國大陸「持負面態度」；深色的線段為美國民眾對中國大陸持正面態度的趨勢變化，淺色線段則為對中國大陸持負面態度的走勢。江澤民曾於 1997 年十月國是訪問美國，該年度以一垂直的橘色線段標註。美國民眾對中國大陸普遍觀感相對差，江澤民主政期間 2001 年為好感度最高的一年為 45%，1997 年為好感度最低的一年僅 33%（圖 3.2）。

¹ Gallup 的問題是「整體來說，你對於中國的態度是如何？非常喜歡、大部份喜歡、大部分不喜歡還是非常不喜歡？」(What is your overall opinion of China? Is it very favorable, mostly favorable, mostly unfavorable or very unfavora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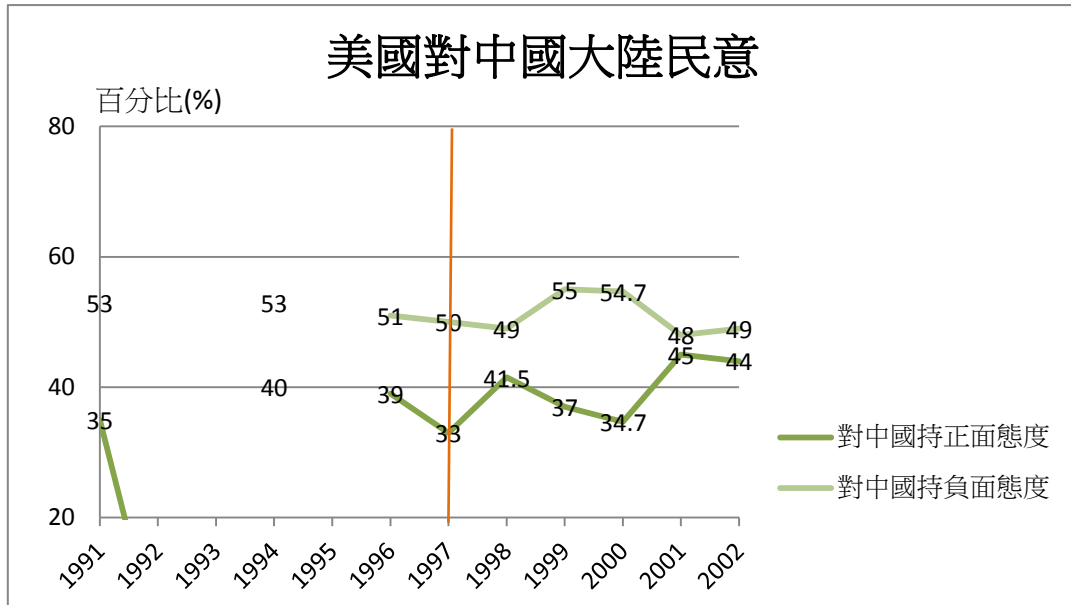


圖 3.2 美國對中國大陸民意，1991-2002

資料來源：“Americans’ Opinions of China,” Gallup survey, November 15, 2015, <<http://www.gallup.com/poll/1627/china.aspx>>.

值得注意的是，江澤民對美國的國是訪問乃其當政十年來停留在單一訪問國最久的一次，為期九天。中國大陸官方詳細記錄了江澤民對美國是訪問的行程，除了描述江澤民與他國元首會晤的言詞與歡快友好氣氛、所用篇幅明顯多於其他出訪活動外，由接待的對象與言詞透露出江澤民注重美國不同群體的聽眾，並予不同的回應方式，其特色有三：

第一、「擴大爭取面」以滿足不同議題取向閱聽者的需求。諸如親自向時任美國總統的克林頓（William Jefferson Clinton），介紹「西藏解放前農奴制度的悲慘情況和解放後發展的天翻地覆的變化」、直接與克林頓總統溝通推動中美關於中國大陸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談判進程；10月30日參眾兩院聯合早餐會，江澤民介紹了中國大陸在西藏、防核擴散、人權等問題的立場並「回答議員的提問包括人權和墮胎等刁難性問題」等；參觀德克賽爾大學（Drexel University）和賓夕法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時，焦點則轉向雙邊交流與文化層面，

如提及校園中的「孫中山系列講座」及唐代石刻雕塑等。² 於南加州會見華僑與留學生，江澤民指揮《歌唱祖國》的千餘人合唱。

第二、以情感面的人與人間互動，製造故事性話題、留下共同印象、增進私人交情。例如夏威夷晚宴上「在美國的反華勢力企圖通過示威遊行，干擾和破壞中國領導人的訪問」，但江澤民揮灑自如用吉他演唱夏威夷民歌“Alloha, Hawaii”並邀請州長夫人伴唱。³ 與退休美國重要官員會面敘舊，江澤民強調「結識新朋友，不忘老朋友」，此行亦與前總統布希（George W. Bush）共進早餐、與前美國國務卿季辛吉（Henry Kissinger）見面。型塑良好氛圍如中國大陸官方記載：「美國《華爾街日報》一向十分挑剔，這次也發表社論稱讚中國國家主席訪美，這是一種積極的變化」。為紐約證券交易所股市開盤時，江澤民展現幽默親和力：「你們的交易所股價上漲了，我得趕快走。」⁴

第三、高曝光度的致詞演講，以詩詞寓意。10月29日在白宮的致詞，對中美關係以「不畏浮雲遮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強調著眼兩國關係的大局能使中美關係保持穩定、紐約美工商界的晚宴演講、哈佛大學發表《增進互相了解，加強友好合作》的演講，指出「美國應該了解中國」並應於歷史和文化的角度出發。⁵

當年度10月26日至11月3日江澤民的國是出訪，使1998年美國民眾對中國大陸觀感有所改善，直到1999年再度下滑。國是訪問或有影響。

（二）日本民眾對中國的態度

江澤民主政時期日本民眾對中國大陸觀感持正面態度為深色線段，持負面態度為淺色線段，期間江澤民曾在1998年國是出訪日本，該年度以一垂直橘色線

² 鍾之成，為了世界更美好：江澤民出訪紀實（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年），頁269-279。

³ 「大陸領導人歷次訪美珍貴畫面」，今日新聞 NOWNews，2015年9月22日，檢索時間：2017年12月17日，〈<https://www.nownews.com/news/20150922/1820455>〉。

⁴ 「圖輯：牛仔帽、吉他與歷屆中國領導人訪美」，BBC 中文網，2015年9月23日，檢索時間：2017年12月17日，

〈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2015/09/150923_gal_china_usa_visit_history〉。

⁵ 鍾之成，為了世界更美好：江澤民出訪紀實，頁269-279。

段註記。分析日本民眾對中國大陸觀感的變化軌跡，其中對中國大陸好感度的比率，在 1996 年與負面態度比率交叉，逐步下跌，而負面態度則相對穩定(圖 3.3)。1993 年至 2002 年間好感度最高的一年 1993 年比率為 55.5，好感度最低的一年為 1998 年僅有 18.9%。江澤民 1998 年 11 月 25 日至 30 日國是出訪日本，此後日本對中國大陸民意有加溫好轉的現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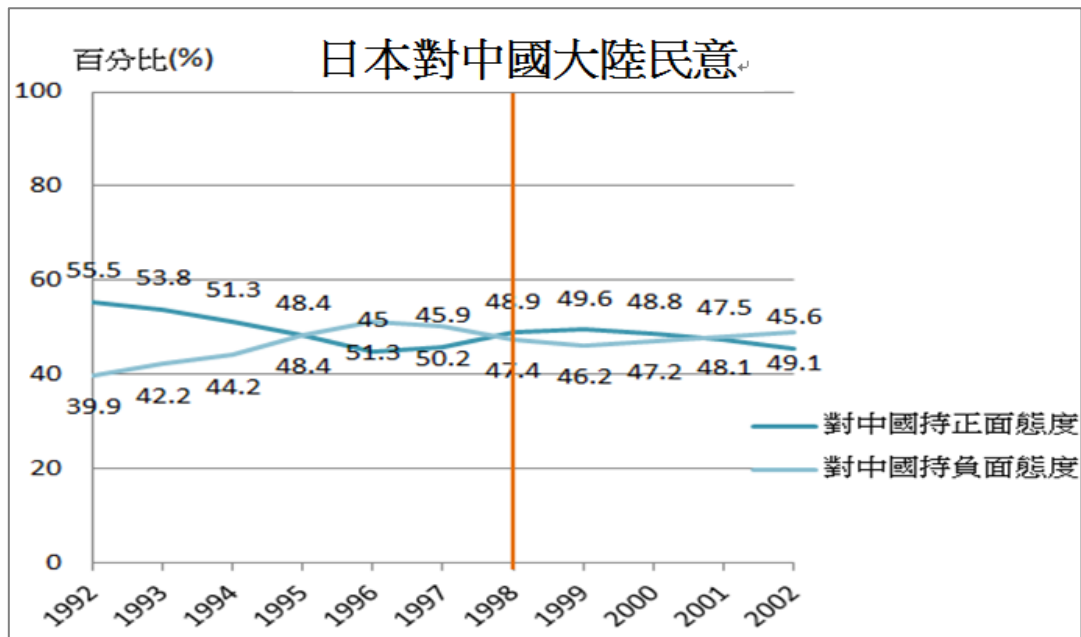


圖 3.3 日本對中國大陸民意，1992-2002

資料來源：Michael Green, “Japan’s Role in Asia: Searching for Certainty,” in David Shambaugh and Michael Yahuda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Asia, 2nd edition* (NY: New York, NY: Rowman & Littlefield, 2014).

江澤民與 1998 年 11 月 25 至 30 日國是訪問日本，梳理官方紀實，有兩點特色：其一，此次對日本的訪問關注對象以日本皇室與官方為主，並提日本侵略歷史。⁶ 雖江澤民曾赴早稻田大學、仙台市魯迅紀念碑、北海道等地訪問，然而在早稻田大學的演講《以史為鑑，開創未來》，但談話軸心呼應前日江澤民與時任

⁶ 劉斐青，「江澤民抵日訪問 中共元首第一人」，華視新聞網，1998 年 10 月 25 日，檢閱時間：2017 年 11 月 13 日，
http://news.cts.com.tw/cts/international/199811/199811250021946.html#.Wi_f1k1rzIU。

日本首相小淵惠三、明仁天皇晚宴上的「日本軍國主義給中國和亞洲其他國家的人民帶來了巨大浩劫」、「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日本軍國主義是中日兩國人民的共同敵人」等，圍繞中日關係的歷史議題。⁷ 此外，參訪仙台和北海道兩地，江澤民會晤互動的非官方民眾無法代表廣義及一般的日本民眾，如魯迅的孫女及其女兒、魯迅與仙台學習時的老師、八位曾與中國大陸接觸往來的日本農業專家。江澤民於日本的國是訪問，目標聽眾是以日本皇室與政府官方為主。

其二，江澤民展現特殊、友好的舉動與故事性話題，僅針對日本皇室。致贈禮品予受訪國是國是訪問的慣例之一，江澤民此行最友好、熱切的互動莫過於致贈日本皇室象徵的朱鷲，回應日方的要求外亦展現誠意與重視。江澤民於日本訪問期間雖對日官方與大學有致贈詩詞、談論詩詞書寫等交流互動，但在中國大陸官方紀錄中另著一章稱為「中國人民的友誼使者」，由此可見對日本皇室的重視。針對不同國情判別不同的目標聽眾，施以不一樣的交流互動似是江澤民的國是訪問策略，尤其考量日本皇室在日本民眾的心目中具相當程度的份量。論及敏感的中日關係歷史問題的同時以與皇室熱切的互動平衡，雖無頻繁走訪接觸不同階層的群眾，但以最有效率的方式取得日本民眾的注意。

自冷戰後，日本民眾對中國大陸持正面態度的比率在 1988 年首度高於負面態度，民意有好轉趨向，國是訪問或有影響。

（三）其他國家民眾對中國大陸觀感之轉變

本文另以美國獨立民調機構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全球態度調查計畫(Global Attitudes Project)資料作為支持，其為 2002 年開始至今對全球 64 國進行超過 500,000 份樣本的訪問數據，本研究以此檢證其他國家對中國大陸的

⁷ 鍾之成，為了世界更美好：江澤民出訪紀實；劉斐青，「江澤民訪日 今與小淵會談」，中時電子報，1998 年 11 月 26 日，檢索日期：2017 年 11 月 13 日，<<http://forums.chinatimes.com/report/japan/112601.htm>>; 「歷史問題多談無益？江澤民不同意」，中時電子報，1998 年 11 月 28 日，檢索日期：2017 年 11 月 13 日，<<http://forums.chinatimes.com/report/japan/112805.htm>>。

好感度。⁸ 然而江澤民主政期間的尚未有完整的資料數據，可供進一步的研究。在第六節中本研究將以後鄧時期二十年的整體性大數據分析中國大陸國是訪問的作用之成效，作為補充。

二、加強雙邊共同利益之交集

中國大陸官方宣稱其欲藉公共外交所達成的目標之一，是促進與其他國家之間的雙邊共同利益，本處從「是否使其他國家與中國大陸在聯合國大會有更相近的投票模式」來看中國大陸的「國是訪問」是否帶來了顯著的影響。以「世界各國在聯合國大會的投票紀錄」作為國家與國家之間關係的測量，梳理中國大陸曾國是訪問過的國家歷年來之「趨向中國的投票比率(Pct. agree China)」變化，觀察是否有明顯的投票行為模式改變。⁹ 即以該國在聯合國大會中的投票模式與中國大陸相同的次數，除以該國在聯合國大會中的總投票次數，得出其投票模式與中國大陸相同的百分比。

在此部分，本文將對不同時期最高領導人曾國是訪問過的國家先以地區分類，再檢視訪問後隔年的趨向比率變化，若使其明顯提升視為有所影響；若僅有些微幅度減少但訪問該年與次年皆保持相對高比率，則視作或有影響；若訪問後隔年的趨向比率明顯下降視作無影響；若有超過一次的國是訪問，則依次年的結果比例判定為有所影響、或有影響、無影響（表 3.1）。最後，檢視個別領導人主政期間國是訪問運用之成效，是否影響國際間其他行為者在聯合國大會中的投票行為，以了解中國大陸與受訪國之間的利益交集變化。

⁸ 全球態度調查計畫問題為：Please tell me if you have a very favorable, somewhat favorable, somewhat unfavorable or very unfavorable opinion of China.

⁹ Michael A. Bailey, Anton Strezhnev and Erik Voeten, “Estimating dynamic state preferences from United Nations voting data,”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61, No. 2 (2017), pp. 430~456.

表 3.1 國是訪問對聯合國大會趨向中國大陸投票模式的影響

	有所影響	無影響	或有影響
國是訪問一次	訪問隔年之趨向比率明顯提升	訪問隔年之趨向比率明顯下降	訪問隔年之比率微幅下降，但訪問該年及次年皆保持相對高比率
國是訪問兩次 (或以上)	兩次訪問隔年之趨向比率皆明顯提升	兩次訪問隔年之趨向比率皆明顯下降	訪問隔年之趨向比率一次提升一次下降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以下本文將江澤民主政期間曾國是訪問過的國家以地區分類為歐洲地區、亞太地區、中東地區、美洲地區以及非洲地區，探討受訪國 1993 至 2002 年十年間的投票模式。

(一) 歐洲地區

首先，歐洲地區共計有 18 個國家，從圖 3.4 中投票行為有明顯變化的為馬爾他、瑞士、克羅埃西亞、拉脫維亞、希臘、西班牙等國(圖 3.4)，以下詳述之。

1. 馬爾他

馬爾他於聯合國大會中的投票模式一直都有五成的比率偏向中國大陸，在 1997 年 70.58% 為最偏向中國的比率，最低為 1999 年的 55.88。而江澤民於 2001 年 7 月國是訪問馬爾他下圖中以■標註，該年與此後一年的投票比率相比，有提高的趨勢。國是訪問有所影響。

2. 瑞士

瑞士僅有 2002 年參與聯合國大會投票，故 1993 至 2001 年記錄為 0，2002 年有 53.52% 的投票比率偏向中國大陸。而江澤民於 1995 年國是大陸訪問瑞士在下圖中以■標註，隔年瑞士無參與投票，由此該次訪問對瑞士投票行為無影響。

3. 克羅埃西亞

克羅埃西亞趨向中國大陸的投票比率有逐年上升的趨勢，最低點為 1993 年的 38.46%，最高點為 1998 年的 56.89%。江澤民於 1996 年國是訪問克羅埃西亞下圖中以●標註，雖次一年比率由 52.17% 降至 51.51%，但除了 1993 年外每年趨向中國大陸的投票比率都至少有五成。國是訪問或有影響。

4. 拉脫維亞

拉脫維亞在聯合國大會的投票紀錄中，趨向中國大陸的投票模式比率平均有 45.23%，最高點為 2000 年的 50.76%，最低點為 1995 年的 30.76%。江澤民在 2002 年六月國是訪問拉脫維亞，該年的比率為 50.72% 於十年間相對高，國是訪問或有影響。

5. 希臘

希臘在聯合國大會的投票紀錄中，趨向中國大陸的投票模式比率平均有 53.5%，最高點為 1994 年的 59.09%，最低點為 1995 年的 47.43%。江澤民在 2000 年四月國是訪問希臘，該年的比率為 55.22% 相較於次年 50.74%。國是訪問無影響。

6. 西班牙

西班牙投票比率最高點為 1994 年 59.09%，最低點為 1999 年 48.52%，即 1994 年後趨向中國大陸的比率有遞減現象，在 2000 年後則有小幅回升。江澤民在 1996 年六月國是訪問西班牙，次年趨向中國大陸的投票比率下降了 4.15%，故國是訪問沒有達到中國大陸期待的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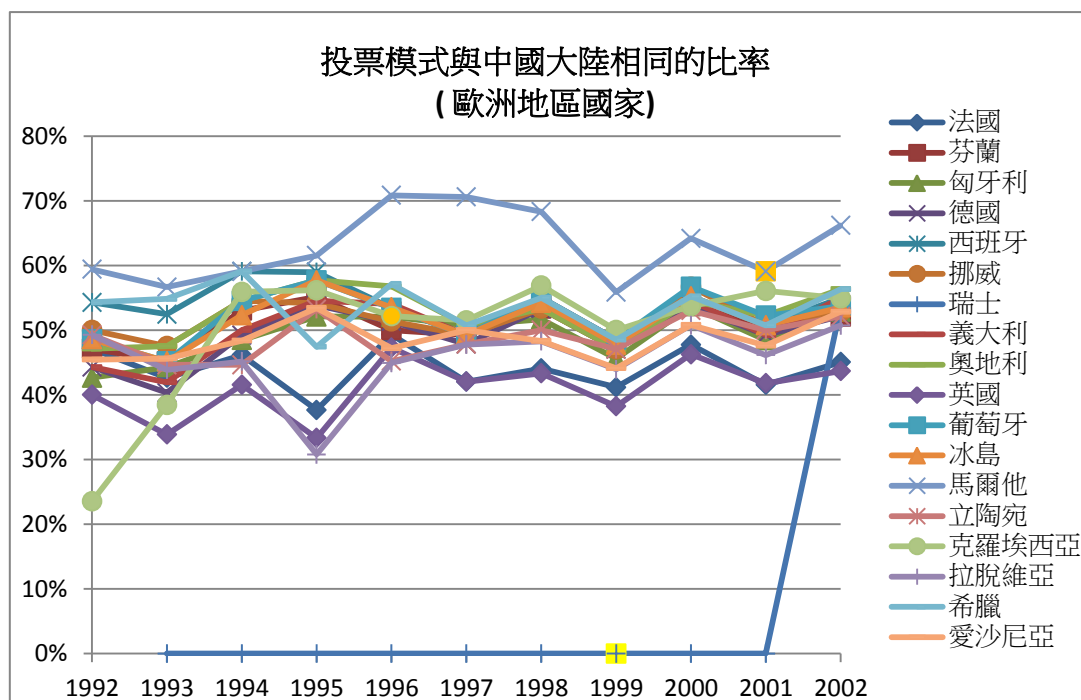


圖 3.4 投票模式與中國大陸相同的比率(歐洲地區國家)，1992-2002

資料來源：Bailey, Strezhnev, Anton Strezhnev and Erik Voeten, “Estimating Dynamic State Preferences from United Nations Voting Data,”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61, No. 2 (2017), pp. 430~456.

(二) 亞太地區

亞太地區共計有 22 個國家，從下圖 3.5 中具明顯變化的國家分別是：蒙古、柬埔寨、烏茲別克、白俄國、塔吉克、土庫曼、俄國、烏克蘭等（圖 3.5），以下個別分析。

1. 蒙古

蒙古趨向中國大陸的投票比例相當高，除了 1993 年驟降至 38.88% 是最低點外，基本上維持七成以上的比例，最高點則是 1992 年的 85.48%。江澤民於 1999 年 7 月國是訪問蒙古，其後三年蒙古的的趨向中國大陸的投票維持八成的高比例模式，國是訪問有所影響。

2. 柬埔寨

柬埔寨於 1992、1997、1998 年的聯合國大會投票紀錄空白，趨向中國大陸

的投票模式比率最高點為 1993 年的 90.69% 其後連續三年逐步下滑，但最低點也有 69.81% 的比率。江澤民於 2000 年 11 月進行國是訪問，其後兩年皆為 89% 以上的比率，國是訪問有所影響。

3. 烏茲別克

烏茲別克於 1992、1993、2001 年的聯合國大會投票紀錄空白，趨向中國大陸的投票模式比率最高點為 1994 年 65.38%，1995 年驟降至 17.39% 其亦是最低點。江澤民於 1996 年 7 月國是訪問烏茲別克該年比率為 48.14%，次年上升至 51.42%，國是訪問有所影響。

4. 白俄羅斯

白俄羅斯於聯合國大會的投票模式一直都有六成以上的比率偏向中國大陸，最高點為 2000 年的 86.15%，最低點為 1996 年的 20.27%。江澤民於 2001 年 7 月國是訪問白俄羅斯，該年及後一年的比率皆為八成以上，國是訪問有所影響。

5. 塔吉克

塔吉克於聯合國大會趨向中國大陸的投票模式比率自 1992 年起有逐步下降的趨勢，至 1997 年後又逐年升高，最高點為 1992 年的 84.21%，最低點為 1995 年的 43.33%。江澤民於 2000 年 7 月國是訪問塔吉克，雖 2001 年無投票紀錄，此後仍維持七成相對高比率，國是訪問或有影響。

6. 土庫曼

土庫曼於聯合國大會趨向中國大陸的投票模式比率平均有 73.59% 相對高且穩定，最高為 1995 年的 91.66%，最低點為 1997 年的 60.60%，值得注意的是兩年間下降了 31.06%。江澤民於 2000 年 7 月國是訪問土庫曼，該年及其後兩年皆有 68% 以上的比率，國是訪問有所影響。

7. 俄國

俄國於聯合國大會趨向中國大陸的投票模式比率有逐步上升的現象，最高點是 2000 和 2001 年的 77.27%，最低點為 1993 年的 37.09%。江澤民於 2001 年國是訪問俄國，該年及次年的比率皆有 76% 以上，國是訪問或有影響。

8. 烏克蘭

烏克蘭於聯合國大會趨向中國大陸的投票模式相對穩定，1992-2002 年都維持六成的比率平均為 66.02%，最高點為 1993 年的 72.58%，最低為 1994 年的 60%。江澤民於 2001 年 7 月國是訪問烏克蘭次年的比率上升至 69.01% 為整體次高，該年及次年比率皆高於平均，國是訪問有所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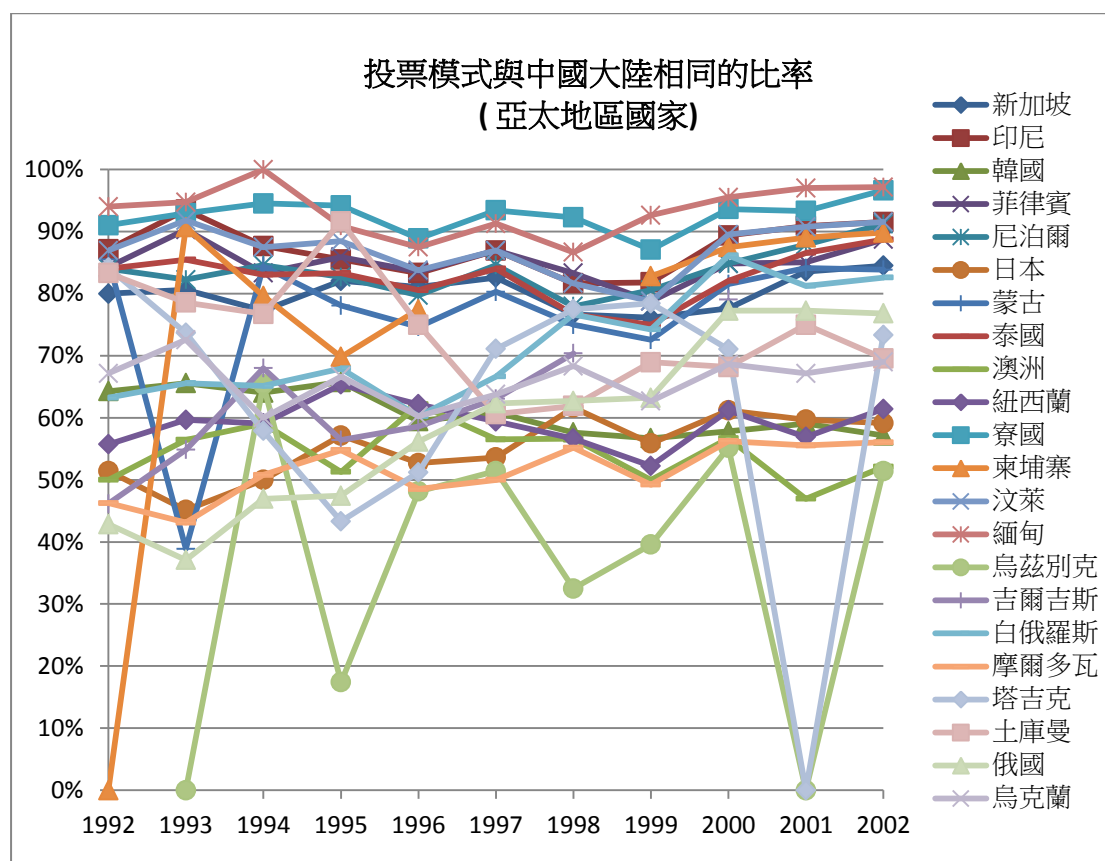


圖 3.5 投票模式與中國大陸相同的比率(亞太地區國家)，1992-2002

資料來源：Bailey, Strezhnev, Anton Strezhnev and Erik Voeten, "Estimating Dynamic State Preferences from United Nations Voting Data,"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61, No. 2 (2017), pp. 430-456.

(三) 美洲地區

美洲地區國家投票模式相對穩定，無明顯的變化。值得注意的國家有三，分別是美國、古巴、阿根廷（圖 3.6），詳述如下。

1. 美國

美國於聯合國大會的投票模式中，趨向中國大陸的比率相對低，最高為 1994 年的 18.18%，最低為 1992 年的 8.5%。江澤民於 1997 年 10 月國是訪問美國，下圖 3.6 中以 ◆ 表示。該年的比率為 17.39% 是十年間第二高，其後三年皆有 10% 以上，國是訪問或有影響。

2. 古巴

古巴則和美國相反，其趨向中國大陸的投票模式平均有 91.23% 的高比率，最高為 1993 年的 96.72%，最低為 1998 年的 83.63%。江澤民於 2001 年 4 月國是訪問古巴，下圖 3.6 中以 ✖ 表示。該年的比率為 93.75%，而次年的比例上升為 94.20% 是十年間第二高，國是訪問有所影響。

3. 阿根廷

阿根廷於聯合國大會趨向中國大陸的投票比率在 1995 年小幅下降後逐年上升，最高為 2002 年的 70.42%，最低為 1995 年的 41.55%。江澤民於 2001 年 4 月國是訪問阿根廷，下圖 3.6 中以 ● 表示，次年的比率上升為 70.42% 為十年間最高點，國是訪問有所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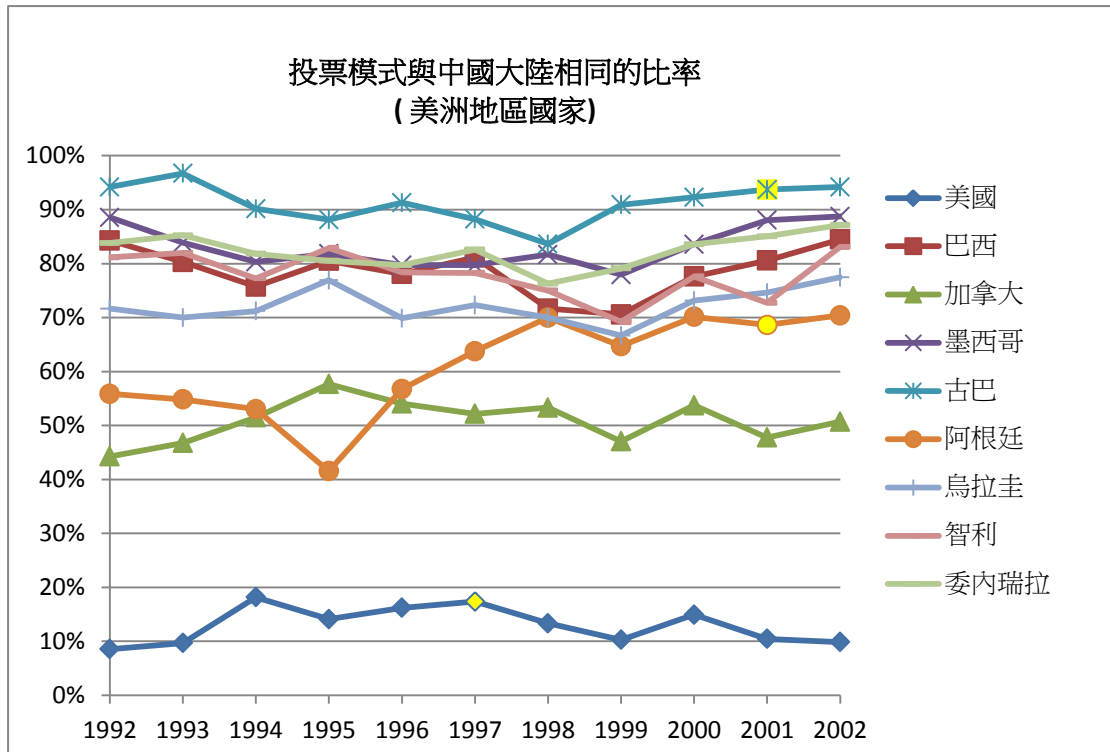


圖 3.6 投票模式與中國大陸相同的比率(美洲地區國家)，1992-2002

資料來源：Bailey, Strezhnev, Anton Strezhnev and Erik Voeten, “Estimating Dynamic State Preferences from United Nations Voting Data,”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61, No. 2 (2017), pp. 430~456.

(四) 中東地區

中東地區國家於聯合國大會投票模式與中國大陸相同的比率普遍偏高，明顯相對低的國家為土耳其，但仍有六成以上的高比率。值得注意的國家是利比亞，1999 年在其他中東國家比率相對趨緩時，利比亞反倒有九成以上趨向中國大陸的比率（圖 3.7）。

1. 利比亞

利比亞趨向中國大陸的投票模式有平均 89.2% 的高比率，最高點為 1992 年的 95.08%，最低為 1997 年 81.35%。江澤民於 2002 年 4 月國是訪問利比亞該年的比率 94.36% 是十年間第二高，國是訪問或有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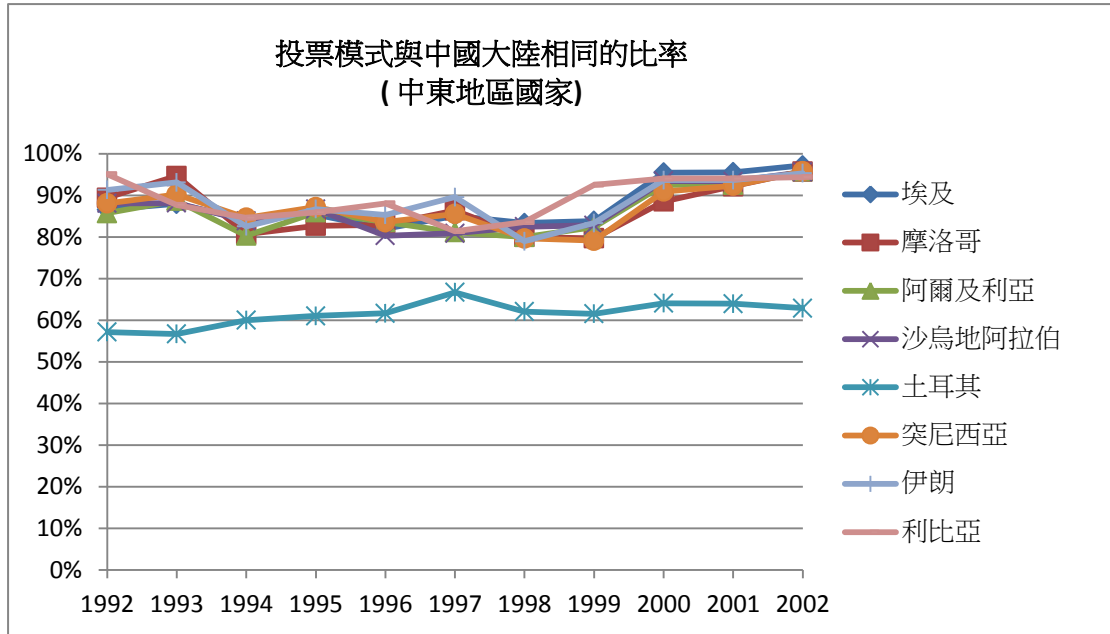


圖 3.7 投票模式與中國大陸相同的比率(中東地區國家)，1992-2002

資料來源：Bailey, Strezhnev, Anton Strezhnev and Erik Voeten, “Estimating Dynamic State Preferences from United Nations Voting Data,”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61, No. 2 (2017), pp. 430-456.

(五) 非洲地區

非洲地區國家有明顯不同變化的是紫色線段的南非(圖 3.8)。

1. 南非

南非於聯合國大會趨向中國大陸的投票模式中 1992 年無紀錄，1993 年比率為 100% 完全趨向中國大陸即本次投票選擇均和中國相同，而最低點為 1999 年的 67.16%。江澤民在 2000 年 4 月國是訪問南非，該年及次年的比率皆為 73% 以上 2002 年甚至回到 90% 區間，國是訪問或有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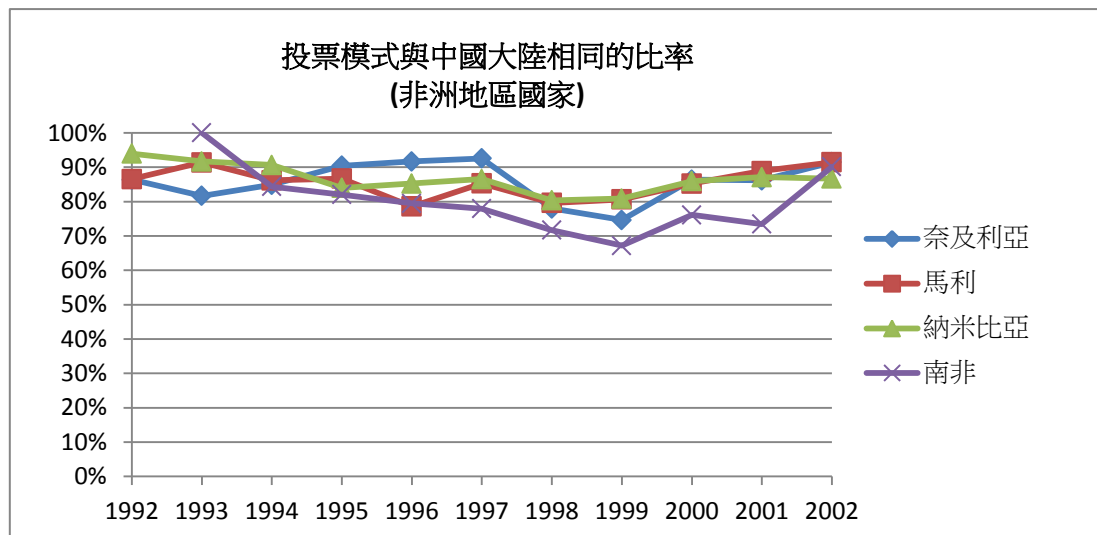


圖 3.8 投票模式與中國大陸相同的比率(非洲地區國家)，1992-2002

資料來源：Bailey, Strezhnev, Anton Strezhnev and Erik Voeten, “Estimating Dynamic State Preferences from United Nations Voting Data,”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61, No. 2 (2017), pp. 430~456.

第三節 小結

江澤民的國是出訪表現個人特色濃厚，包括吟詩賦詞、唱歌、跳舞等，在國際社會間塑造出不同於過往中國大陸最高領導人的形象。第一節中本文梳理了江澤民主政十年間國是出訪的紀錄，分析出訪次數與訪問國家數以做為後續研究的數據資料。第二節中本文進一步探究江澤民國是訪問的成效，以降低中國大陸威脅感、增進雙邊共同利益為二指標。首先在降低他國對中國大陸的威脅感部分，以美國民眾對中國大陸的觀感（圖 3.2）、日本民眾對中國的觀感（圖 3.3）、其他國家的觀感作為測量依據，本文發現在江澤民國是訪問後，有效改善美國與日本對中國大陸的好感度。惟受限於資料無法對其他國家觀感進一步的分析，後續的章節將以整體國是訪問成效測量作為補充。另外，國是訪問是否有效增進中國大陸與他國的雙邊共同利益，本文以聯合國大會中趨向中國大陸的投票模式比率檢測，並分析其成效（表 3.1）。檢視江澤民曾國是訪問過的國家十年間的投票比率

變化，投票模式有明顯變化 19 個國家中，江澤民國是訪問後 3 國沒有影響、9 國或有影響、7 國有所影響，由此視之國是訪問對投票模式有所作用。江澤民時期的國是訪問十年間 29 次的國是出訪共訪問 67 個國家，較著重亞太與歐洲國家，其國是訪問在降低中國大陸所帶來的威脅感及增進雙邊共同利益上皆有所成效。



第肆章 胡錦濤時期國是訪問

第一節 訪問次數與對象

胡錦濤是繼江澤民之後的中國大陸最高領導人，且為中共菁英制度化發展後權力和平過渡的繼承者，不同領導人展現不同的主政風格，透露行為意涵與當時國內外環境之考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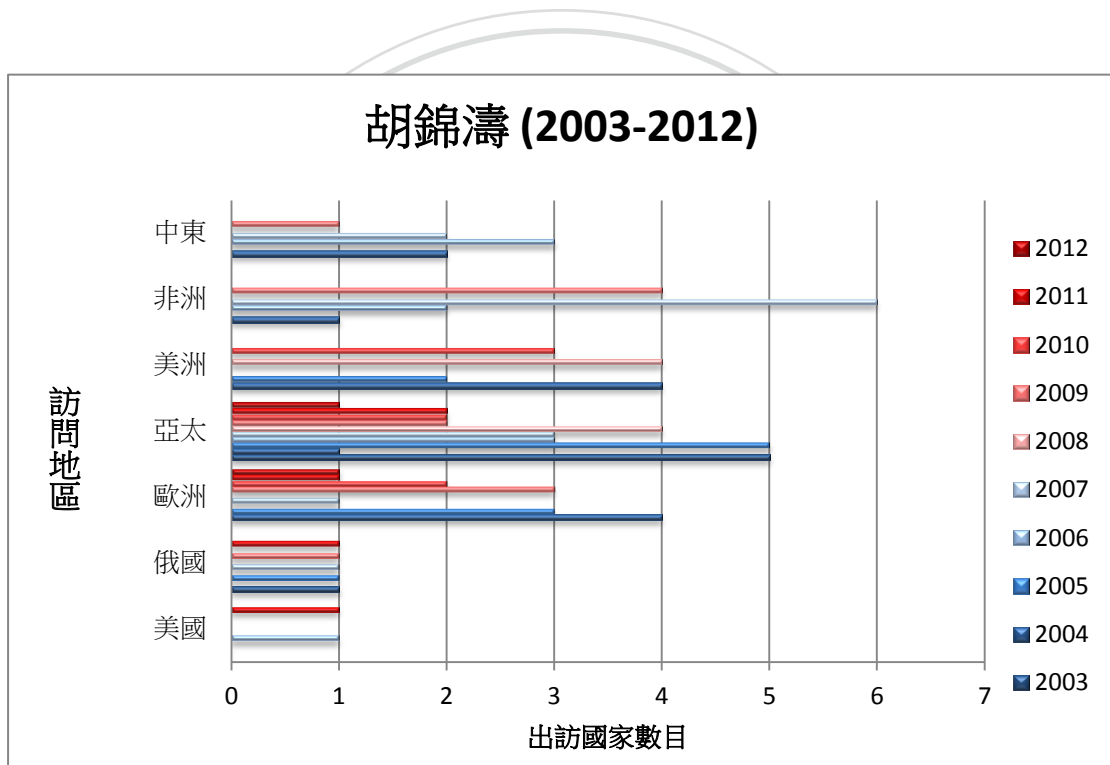


圖 4.1 胡錦濤歷年「國是出訪」訪問的國家與地區，2003-2012

資料來源：綜整自新華社報導、新華網領導人出訪專題、新華網國內外大事紀。

說明：藍色線條為胡錦濤的第一個任期，紅色線條為胡錦濤的第二個任期。

胡錦濤主政時期，中國大陸以「國是訪問」作為外交工具的情形有三點特徵值得注意。首先，與胡錦濤的前任領導人江澤民不同，比較兩人之第二任期，胡錦濤在他的第一個任期有著更多的出訪次數及出訪更多國家。第二，胡錦濤不僅只將出訪的重心投注於亞太國家，也增加了美國與非洲國家的出訪次數。第三，

江澤民僅國是出訪俄國一次，而胡錦濤則以每兩年一次的高頻率出訪俄國。下圖 4.1 中明顯可看出代表第一任期的藍色線段多於代表第二任期的紅色線段，且在各區域中代表時間序列的顏色漸層更為完整，尤其是亞太地區。

第二節 內涵與實踐

本節將分析胡錦濤國是訪問後是否有效改善他國對中國的威脅感、是否增進中國大陸對外的雙邊利益，以觀察國是訪問外交政策的成效。前者將檢視美國、日本、其他國家對中國大陸的觀感變化，後者則藉由聯合國大會中趨向中國大陸的投票模式剖析。需要注意的是胡錦濤曾在 2006 年及 2011 年以中國大陸國家主席身分訪問美國，惟美方與中方對 2006 年訪問性質有爭議。美方稱其為一次高規格的訪問雖有禮炮歡迎但非國是規格的 21 響禮炮，然而中方面在新華社的報導及中國人民共和國駐美大使館的網站中皆稱其為國是訪問(State visit)。¹ 2011 年的國是訪問則毫無爭議，時任美國總統歐巴馬(Barack Obama)打破慣例給予最高規格禮遇，包括在白宮為胡錦濤舉辦私人晚宴。² 本文以中國大陸官方說法為主，以探究胡錦濤的國是訪問外交。以下將以國是訪問是否成功降低他國對中國大陸帶來的威脅感受、是否促進與其他國家的雙邊共同利益，檢視其成效。

¹ 「President Hu Jintao arrives in Seattle for U.S. visit」，中華人民共和國駐美利堅合眾國大使館，2006 年 4 月 25 日，檢索時間：2017 年 11 月 14 日，
<<http://www.china-embassy.org/eng/zmgx/t248787.htm>>；Jeffrey A. Bader, "Chinese State Visits are always Hard: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Brooking**, September 17, 2015,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order-from-chaos/2015/09/17/chinese-state-visits-are-always-hard-a-historical-perspective/>>; Dana Milbank, "China and Its President Greeted by a Host of Indignities," **Washington Post**, April 20, 2006,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6/04/20/AR2006042001946.html>>.

² Austin Ramzy, "Will Obama and Hu Jintao Find Middle Ground," **TIME**, 2011/6/18.<
<http://content.time.com/time/world/article/0,8599,2042941,00.html>>.

一、降低他國威脅感受之程度

(一) 美國民眾對中國大陸的態度

藉由蓋洛普公司(Gallup)從1979年9月開始所執行的民意調查，了解美國民眾對中國大陸整體的觀感變化，如同上章中提及本文將回答「非常有好感」與「基本上有好感」的比率加總為對中國「持正面態度」，把回答「基本上沒有好感」和「非常沒有好感」的比率加總為對中國大陸「持負面態度」；深色的線段為美國民眾對中國大陸持正面態度的趨勢變化，淺色線段則為對中國大陸持負面態度的走勢(圖4.2)。胡錦濤曾於2006年4月及2011年1月國是訪問美國，均以一垂直的橘色線段標註。

美國民眾對中國大陸觀感在2003年至2012十年間有跌宕起伏的變化，呈現在圖4.2中為數個波動周期的變動。胡錦濤主政期間2007年為好感度最高的一年為48%，好感度最低點都維持41%，而對中國大陸持負面態度的比率在2012年來到了56%的新高峰。相對於江澤民的前十年美國民眾對中國大陸的觀感開始出現明顯波動，共有兩次的交叉，分別為2005年皆是47%以及2007年對中國大陸持正面觀感的民意受首次大於負面態度，正面態度為48%負面態度為47%。2006年胡錦濤國是出訪美國，而後2007年美國民眾對中國大陸觀感有所改善，但2008年再度下滑。2011年胡錦濤再度國是訪問美國，該年度民意的差距為2008年以來最小的一次，然隔年美國民眾對中國大陸觀感的差距從3%上升至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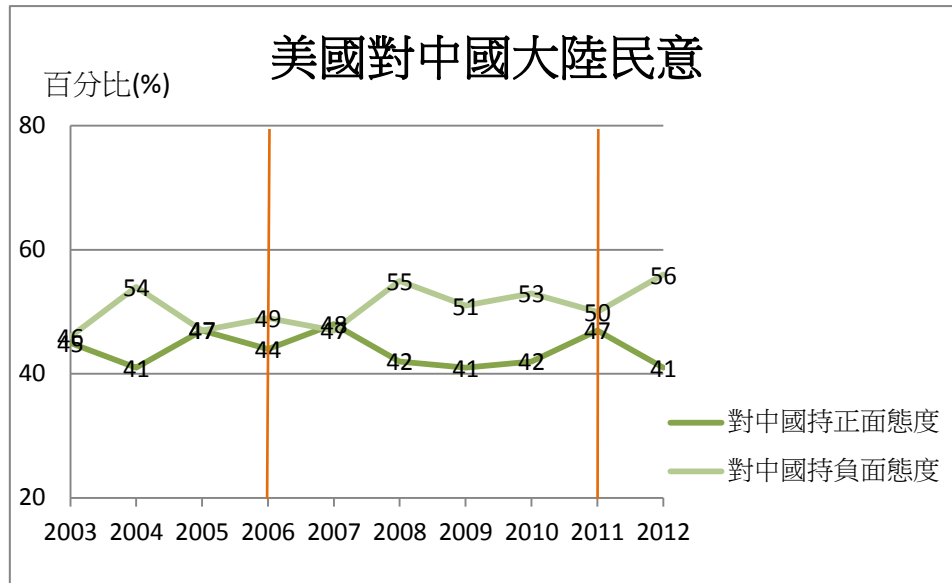


圖 4.2 美國對中國大陸民意，2003~2012

資料來源：“Americans’ Opinions of China,” Gallup survey, November 15, 2015, <<http://www.gallup.com/poll/1627/china.aspx>>.

胡錦濤於 2006 年 4 月 18 日至 29 日及 2011 年 1 月 18 日至 21 日對美國進行國是訪問，綜觀胡錦濤的訪問有三項特點：

第一、胡錦濤行為謹慎、溫文有禮。相較於前任領導人江澤民，胡錦濤舉措較符合外交禮儀，表現中規中矩並無特殊的個人才藝展現。胡錦濤展現輕鬆的一面，例如 2006 年 4 月 19 日參觀波音公司，在演講結束後接受員工代表致贈上有波音公司標誌的棒球帽，胡錦濤戴上球帽、握手致意並擁抱合影；4 月 21 日與主持人埃內斯托·塞迪略（Ernesto Zedillo）在耶魯大學演講後的提問可見一斑，主持人說「我拿到了 78 個問題，如果每個都問，你就走不了了。」胡錦濤道：「如果問題多，我就不走了。」、「不用對我手下留情」等。³ 又如 2011 年 1 月 21 日參訪美國唯一一所設有孔子學院的中學，芝加哥珮頓中學，胡錦濤致贈絨毛白兔玩偶「即將迎來兔年春節，白兔象徵吉祥如意」並祝同學們心想事成。⁴ 綜上所

³ 「習近平七次訪美，只有這次是國事訪問」，新華網，2015 年 9 月 18 日，檢索時間：2017 年 12 月 16 日，<http://news.xinhuanet.com/2015-09/18/c_1116603429.htm>。

⁴ 新華網專題報導，「胡錦濤主席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紀實」，新華網，檢索時間：2017 年 12 月 16 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hjt201001/>>。

述，胡錦濤親切幽默的應對亦不失其最高領導人風度，在應對進退間胡錦濤似更加謹慎。

第二、會晤面談、致詞講話中多以和平發展下的中美兩國關係、共同利益為主，試圖平息中國大陸崛起所可能造成的他國憂慮與威脅感。⁵ 以2006年訪問為例：4月18日與華盛頓州州長的歡迎宴會，胡錦濤致詞中強調「中美兩國在推動各自經濟社會發展方面有著共同追求，在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全球經濟增長等廣泛領域擁有共同戰略利益。」；4月18日下午參觀微軟公司總部，與正在學習中文的美國小學生交談，並一同在電腦上手寫輸入互動時，胡錦濤寫下「中美友好 萬古長青」；4月20日下榻國賓館與時任美國副總統錢尼（Richard B. Cheney）、臨時參議長史蒂芬（Ted Stevens）、國家安全顧問哈德利（Stephen John Hadley）會見，胡錦濤表示「我更加堅信，在當前國際形勢下，中美有者更廣泛而重要的共同戰略利益。⁶ 中美不僅是利益攸關方，而且應該是建設性合作者。」；4月20日在白宮與美國總統布希會談時，提到「中美建設性合作夥伴」，晚宴上發表《全面推進中美建設性合作關係》講話。另以2011年訪問為例：1月19日於白宮與美國總統歐巴馬會談上，胡錦濤強調「當今世界，國際形勢繼續發生深刻複雜的變化。」及中美應加強戰略互信；1月20日於美國友好團體歡迎宴會上發表《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中美合作夥伴關係》演講，並提到「我們將始終不渝走和平發展道路，繼續通過爭取和平國際環境來發展自己，又以自身發展維護和促進世界和平。」其與中共十七大政治報告中「始終不渝走和平發展道路」有相似意涵。

第三、重視高曝光、廣泛與美國不同群體目標聽眾接觸。2006年為期四天的訪問從西雅圖的波音和微軟公司、首都華盛頓、到耶魯大學，胡錦濤共參與

⁵ 李銘義，「美中台關係與台海安全」，翁明賢、吳建德、江春琦主編，**國際關係**（台北：五南，2006），頁498-500；Joseph Kahn, "In Hu's Visit to the U.S., Small Gaffes May Overshadow Small Gains," **New York Times**, April 22, 2006, <<http://www.nytimes.com/2006/04/22/world/asia/22china.html>>.

⁶ 「胡錦濤會見美副總統切尼和臨時參議長史蒂文斯等」，**中央政府門戶**，2006年4月21日，檢索時間：2017年12月16日，<http://big5.gov.cn/gate/big5/www.gov.cn/ldhd/2006-04/21/content_259806.htm>。

32 場活動，發表 6 次演講，會見美國總統布希、高層官員、國會議員、工商界、學術界以及華僑人仕等。2011 年四天的美國訪問，胡錦濤走訪華盛頓與芝加哥兩地，出席近 20 場活動。值得注意的是，2006 年的訪問胡錦濤以「量」為主，參加多場活動，增加接觸群眾；2011 年的訪問則以「質」為主，活動平均時間明顯曾長，會見美國總統歐巴馬、高層官員與國會議員外，亦與美國前總統克林頓（William Jefferson Clinton）、前美國國務卿季辛吉（Henry Kissinger）會面。總覽之，胡錦濤積極參與交流互動，以增加雙邊良性認識。⁷

梳理胡錦濤主政時期的兩次對美國是訪問，2006 年胡錦濤的出訪之後，美國人民對於中國大陸的好感度都有微幅上升的趨勢，然而，2011 年胡錦濤國是訪問後，美國人民對於中國大陸的好感度反而有所下降。⁸ 2011 年的國是訪問雖然歐巴馬給予相當的禮遇，高層間善意往來和互信似有升溫，但對於美國人民對中國大陸的態度開始帶來了負面的影響。綜觀胡錦濤國是訪問對美國民意的觀感，其似乎沒有明確且穩定的作用，故無法指出國是訪問有明確的效果。

（二）日本民眾對中國大陸的態度

胡錦濤主政時期日本民眾對中國大陸觀感持正面態度為深色線段，持負面態度為淺色線段，期間胡錦濤曾在 2008 年出訪日本，其為時隔十年後中國大陸再度國是訪問日本，該年度以一垂直橘色線段註記，呈現如下圖 4.3。觀察胡錦濤任期對日本的國是訪問，發現日本民眾對中國大陸好感度的比率在 2003 年時正面和負面觀感最為接近，其後比率各自朝極端成長呈現大相逕庭的發展，2003 年至 2012 年間好感度最高的一年為 2003 年比率為 47.9%，好感度最低的一年為 2012 僅有 18%（圖 4.3）。胡錦濤主政最後一年高達 80.6% 的日本民眾對中國大陸持負面印象，對中國大陸持正面態度的日本民眾低至 18%。由此，國是訪問似

⁷ 新華網專題報導，「胡錦濤出訪美國及亞非四國」，新華網，檢索時間：2017 年 12 月 17 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hjt0604/01.htm>>；John O'neil, "China's President Ends U.S. Visit with Yale Speech," **New York Times**, April 21, 2006, <<http://www.nytimes.com/2006/04/21/nyregion/chinas-president-ends-us-visit-with-yale-speech.html>>.

⁸ 林正義，「胡錦濤訪美行之研析」，**展望與探索**，第 9 卷第 2 期（2011），頁 1~6。

乎未對改善日本民眾對中國大陸的觀感有所助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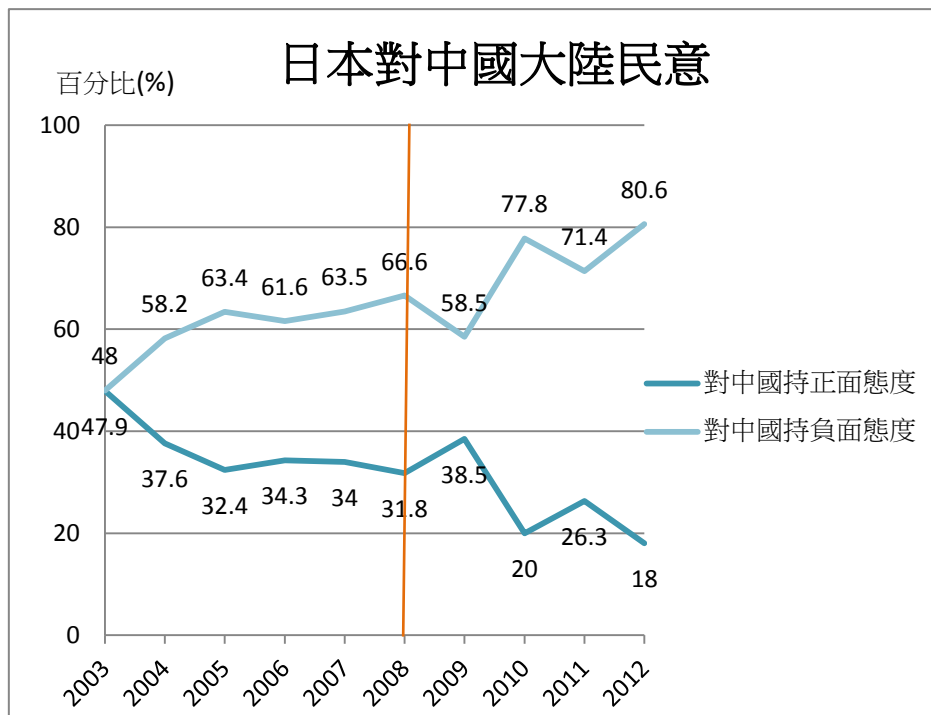


圖 4.3 日本對中國大陸民意，2003~2012

資料來源：Michael Green, “Japan’s Role in Asia: Searching for Certainty,” in David Shambaugh and Michael Yahuda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Asia, 2nd edition* (NY: New York, NY: Rowman & Littlefield, 2014).

胡錦濤於 2008 年 5 月 6 日至 10 日國是訪問日本，和前屆江澤民相比有兩大不同特色：

第一、胡錦濤以民間、舊交為目標觀眾。⁹ 例如 6 日胡錦濤乍抵日本便先在下榻飯店會見多批日本友人，而非日本皇室、政府官員。胡錦濤：「我這次訪問日本，就是為了進一步增進兩國人民的友好感情。」，反映胡錦濤此次訪日定調

⁹ 新華網專題報導，「暖春之旅—胡錦濤訪問日本」，新華網，檢索時間：2017 年 12 月 17 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hjt200805/>>。

；新華網專題報導，「圖輯—胡錦濤訪問日本」，新華網，檢索時間：2017 年 11 月 07 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hjt200805/tp.htm>>。

為「暖春之旅」的念舊重情主軸。¹⁰ 胡錦濤亦有與日本皇室、政府高層的會晤例如 6 日與時任日本首相福田康夫在松本樓的非正式會面、7 日在日本皇宮的歡迎儀式與國宴、9 日會見神奈川縣知事松澤成文等。¹¹ 值得注意的是在胡錦濤訪問的三天內與日本明仁天皇密集的會面，然而新華網未多著墨此一特殊的「禮遇」，反倒把焦點放置與老朋友、民間交流、青少年交流上。¹²

第二、展現親民溫和作風，扭轉日本民眾對中印象。胡錦濤 8 日在早稻田大學的演講與十年前江澤民相比有迥然不同的效果與迴響，其言：「歷史是最富哲理的教科書，我們強調牢記歷史，並不是要延續仇恨，而是要以史為鑑、面向未來，珍愛和平...」。¹³ 此外，與日本國手福原愛的「乒乓外交」成為話題，使日本民眾對胡錦濤的球技、作風及觀感有正面印象，甚至出現「胡錦濤旋風」一詞。¹⁴ 胡錦濤成功拉近與日本民眾及青年間的距離，留下親切的友好印象。

胡錦濤國是訪問日本，次年日本對中國大陸民意有加溫好轉的現象，是胡錦濤 2003 年主政以來民眾正負面觀感差距最小的一次，差距為 20%。國是訪問有所影響。

(三) 其他國家民眾對中國大陸觀感之轉變

檢視中國大陸的「國是訪問」是否改善了其他國家對中國大陸的態度的部分，本文以美國獨立民調機構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 針對全球國家和

¹⁰ 暖春之旅相關資料可參閱 2008 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暖春之旅胡錦濤主席訪問日本》，收錄中日關於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的聯合聲明、中日兩政府關於加強交流與合作的聯合新聞公報以及胡錦濤在早稻田大學的演講全文等文件。此外亦紀錄胡錦濤對日國是訪問的過程。

¹¹ 「福田選孫中山最愛松本樓宴胡錦濤象徵世代友好」，**蘋果新聞**，2008 年 5 月 7 日，檢索時間：2017 年 12 月 13 日，

<<https://hk.news.appledaily.com/international/daily/article/20080507/11077580>>。

¹² 「胡錦濤福田簽署聯合公報 東海、毒餃難題未解」，**蘋果新聞**，2008 年 5 月 8 日，檢索時間：2017 年 12 月 13 日，<<https://hk.news.appledaily.com/international/daily/article/20080508/11081829>>；

「胡錦濤訪東京 4 天三度晤日皇明仁 十分罕見」，**中國評論通訊社**，2008 年 5 月 7 日，檢索時間：2017 年 12 月 15 日，

<<http://hk.crntt.com/doc/1006/3/8/3/100638331.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0638331>>。

¹³ 胡錦濤，「在日本早稻田大學的演講」，**中國外交**（北京），第 7 期（2008），頁 3~6；胡錦濤，「以史為鑒面向未來」，**文苑：經典美文**（呼和浩特），第 20 期（2008），頁 15~16；張隆義，「江澤民訪日突顯雙方矛盾」，**中國大陸研究**，第 41 卷第 11 期（1998），頁 1~3。

¹⁴ 王銘義，「日本颳起『胡錦濤旋風』」，**中國市場**（北京），第 28 期（2008），頁 64~65。

地區所做的「對中國的觀感」(View of China) 調查作為支持。該調查從 2005 年開始進行，之後每年調查一次，但每年參與調查的國家有所不同，表 4.1 為胡錦濤主政時期各國在中國大陸進行「國是訪問」之後對中國大陸觀感的變化，灰底部分表示中國大陸曾在該年度對該國進行訪問，而灰底的...部分為中國大陸進行「國是訪問」的當年 Pew 並未進行調查。Pew 在調查中所使用的問題是「你對中國的看法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Do you have a favorable or unfavorable view of China?) 本文把回答「非常喜歡」(very favorable) 與「有些喜歡」(somewhat favorable) 的比率加總為對中國大陸「持正面態度」(favorable)，把回答「有些不喜歡」(somewhat unfavorable) 和「非常不喜歡」(very unfavorable) 的比率加總為對中國大陸「持負面態度」。表格中僅呈現持正面態度的百分比。

本文將八大工業國組織 (Group of Eight, G8) 的成員國並列為主要大國，其他國家依地區分類(表 4.1)。在中國大陸的外交詞令或外交政策的學術文獻中，雖然經常看到中國大陸官方與學者們使用「主要大國」這個詞彙，實際上究竟哪些國家是「主要大國」，中國大陸官方並未有一個明確的定義。一般認為不會有爭議的主要大國、或是中國所一直強調的改善「大國關係」中的大國，是指美國、日本、俄國與歐盟這四個國家或地區，而屬於開發中國家的人口大國(如印度、印尼、巴西等等)則較少被涵蓋在內。此外，英、法、德這三個外交史上的傳統大國，也甚少被中國大陸單獨提及，比較常見的是直接以「歐盟」來概括代稱。考量上述，本文將「主要大國」的標準定義為八大工業國組織中的成員國(Group of Eight, G8)，包含美國、加拿大、英國、法國、德國、義大利、日本、俄羅斯八個國家。¹⁵

¹⁵ 要特別說明的是，儘管因併吞克里米亞的爭議，俄國在 G8 的會籍於 2014 年經會員國同意後被凍結，然而在本文所探討的「國是訪問」期間俄國都屬於 G8 國家之一，因此不將其排除出主要大國之列。

表 4.1 各國在中國大陸進行「國是訪問」之後對中國大陸觀感的變化

國家	2002年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主要大國]									
美國		43%	52%	42%	39%	50%	49%	51%	40%
俄羅斯	71%	60%	63%	60%	60%	58%	60%	63%	62%
日本	55%		27%	29%	14%	26%	26%	34%	15%
德國		46%	56%	34%	26%	29%	30%	34%	29%
法國		58%	60%	47%	28%	41%	41%	51%	40%
英國		65%	65%	49%	47%	52%	46%	59%	49%
[亞太國家]									
印尼		73%	62%	65%	58%	59%	58%	67%	
南韓	66%		52%	48%	41%	38%		
澳大利亞					52%				
印度								
馬來西亞				83%		...		-	
菲律賓	63%						-	
[中東國家]									
約旦		43%	49%	46%	44%	50%	53%	44%	47%
黎巴嫩		66%		46%	50%	53%	56%	59%	59%
巴基斯坦		79%	69%	79%	76%	84%	85%	82%	85%
土耳其		40%	33%	25%	24%	16%	20%	18%	22%
以色列				45%		56%		49%	
巴勒斯坦				46%		43%		62%	
埃及			63%	65%	59%	52%	52%	57%	52%
[非洲國家]									
奈及利亞			59%	75%	79%	85%	76%		
肯亞			81%		73%	86%	71%	
迦納				75%					
南非				...	37%				
坦尚尼亞				70%	71%	...			
烏干達				45%					
[拉美國家]									
墨西哥			43%	38%	39%	39%	39%	40%
阿根廷				32%	34%	42%	45%		
巴西							52%	49%	50%
智利				62%					
[北美國家]									
加拿大		58%		52%		53%		
[歐洲國家]									
西班牙		57%	45%	39%	31%	40%	47%	55%	49%
波蘭		37%		39%	33%	43%	46%	51%	50%
希臘								56%
義大利				27%		...		-	30%

資料來源：陳郁芬，〈中國國家形象之建構：以胡錦濤時期為例〉，發表於中國政治學 2016 年會暨「新政局下的內外挑戰與政經治理：區域發展、分配正義、族群政治」國際學術研討會，〈花蓮：東華大學，2015〉；“Opinion of China,” **Pew Reserch Center**, February 14, 2017, <<http://www.pewglobal.org/database/indicator/24/>>.

說明：2000~2012 年資料引用自陳郁芬的整理，2002 年及 2013~2016 年為本文從相同來源更新。

由於非每個國家都持續的參與調查計畫，除了主要大國外亞太國家、中東國家、非洲國家、拉美國家及歐洲國家因數據資料零碎與不連貫，各只有一筆資料可供判讀。若以國是訪問後次年的好感度作為分析標的，共有 16 筆資料，有 7 次在中國大陸進行「國是訪問」後民眾對中國好感度提高，也有 7 次在中國大陸「國是訪問」後民眾對中國大陸的好感度減少，「國是訪問」後沒有改變民眾好感度則有 2 次。整體趨勢而言，可以發現中國大陸的「國是訪問」對於提升受訪國人民對中國大陸的好感度並沒有帶來明顯而穩定的效果。

二、加強雙邊共同利益之交集

如同上章所述，本節以「世界各國在聯合國大會的投票紀錄」作為國家與國家之間關係的測量，梳理中國大陸曾國是訪問過的國家歷年來之「趨向中國大陸的投票比例(Pct. agree China)」變化。本文依胡錦濤主政期間曾國是訪問過的國家以地區分類，探討受訪國 2003 年至 2012 年十年間的投票模式，以了解國是訪問後受訪國與中國大陸共同利益交集的是否因而強化。

(一) 歐洲地區

首先，歐洲地區共計有 15 個國家，投票行為有明顯變化與不同的國家為希臘（圖 4.4）。

1. 希臘

希臘於聯合國大會中的趨向中國大陸的投票模式一直都有五成左右的比率，最高點是 2010 年的 87.30% 為，最低為 2009 年的 49.25%。而胡錦濤於 2008 年 11 月國是訪問希臘，次年趨向中國大陸的投票比率反倒有下降的現象。國是訪問無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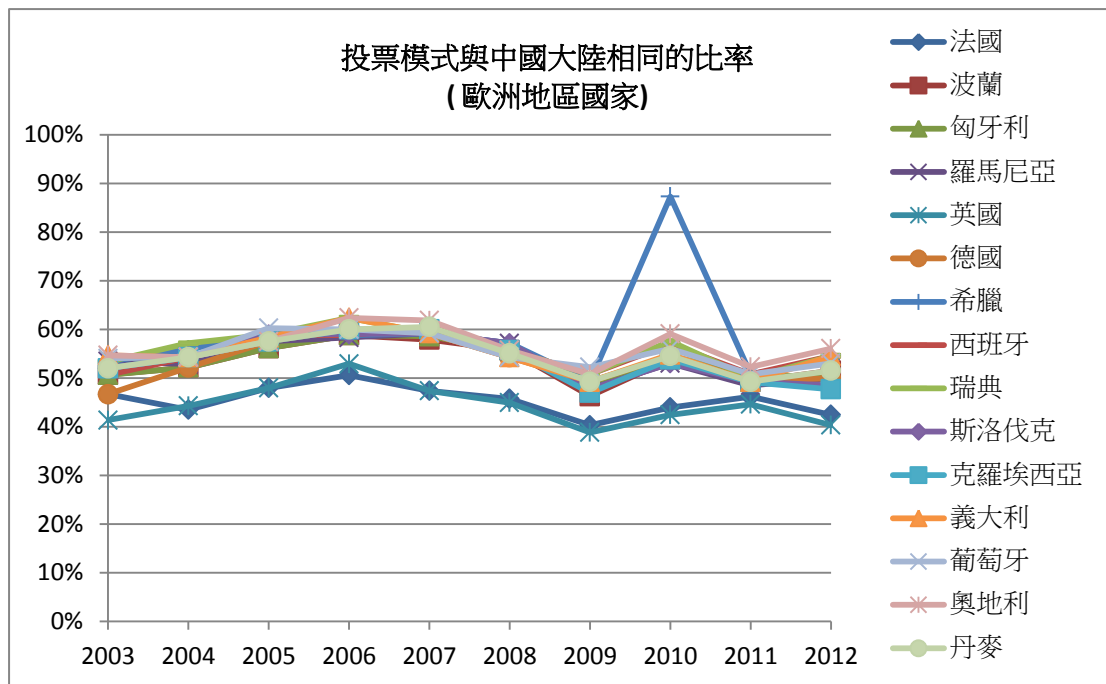


圖 4.4 投票模式與中國大陸相同的比率(歐洲地區國家)，2003-2012

資料來源：Bailey, Strezhnev, Anton Strezhnev and Erik Voeten, "Estimating Dynamic State Preferences from United Nations Voting Data,"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61, No. 2 (2017), pp. 430-456.

(二) 亞太地區


亞太地區共計有 20 個國家，從下圖八中具明顯變化與不同的國家分別是：俄國、澳大利亞、烏茲別克、土庫曼、烏克蘭（圖 4.5），以下個別分析之。

1. 俄國

俄國於聯合國大會中趨向中國大陸的投票模式平均都有 77.11% 的高比率，最高點為 2011 年的 81.53%，最低點為 2012 年的 72.72%。胡錦濤以兩年一次的高頻率訪問俄國，分別為 2003 年 5 月、2005 年 6 月、2007 年 3 月、2009 年 6 月以及 2011 年 6 月，下圖中以 ◆ 標註。除了 2011 年外，國是訪問後的次年俄國趨向中國大陸投票模式的比率都會提升。國是訪問有所影響。

2. 澳大利亞

澳大利亞在聯合國大會投票中平均有 42.67% 趨向中國大陸的投票行為的比

率，最高點為 2010 年的 48.48%，最低點為 2004 年的 34.32%。胡錦濤在 2003 年 10 月以及 2007 年 9 月國是訪問澳大利亞，下圖以  標註，次年的比率均無提升的現象。國是訪問無影響。

3. 烏茲別克

烏茲別克在聯合國大會中趨向中國大陸的投票模式有逐年升高的趨勢，2005 年後每年保持八成的高比率，最高點是 2009 年的 89.65%，最低點則是 2003 年的 53.65%。胡錦濤於 2004 年 6 月以及 2010 年 6 月國是訪問烏茲別克，下圖中以  標註，前次使隔年的趨向比率上升 20.26%，後者雖無明顯的改善仍維持 86% 以上小幅下降 0.22%。國是訪問或有影響。

4. 土庫曼

土庫曼於聯合國大會中趨向中國大陸的投票模式每年平均有 91.20% 的高比率，最高點為 2003 年的 98.14%，最低點為 2011 年的 84.48%。胡錦濤於 2008 年 8 月國是訪問土庫曼，次年的趨向比率由 92.3% 小幅降至 89.09%，但仍維持相當高的比率。國是訪問或有影響。

5. 烏克蘭

烏克蘭於聯合國大會中趨向中國大陸的投票模式在 2006 年前保持六成以上的比率，隨後出現下降現象，最高點為 2003 年的 66.66%，最低點為 2009 年的 48.48%。胡錦濤於 2011 年 6 月國是訪問烏克蘭，次年的趨向比率升高。國是訪問有所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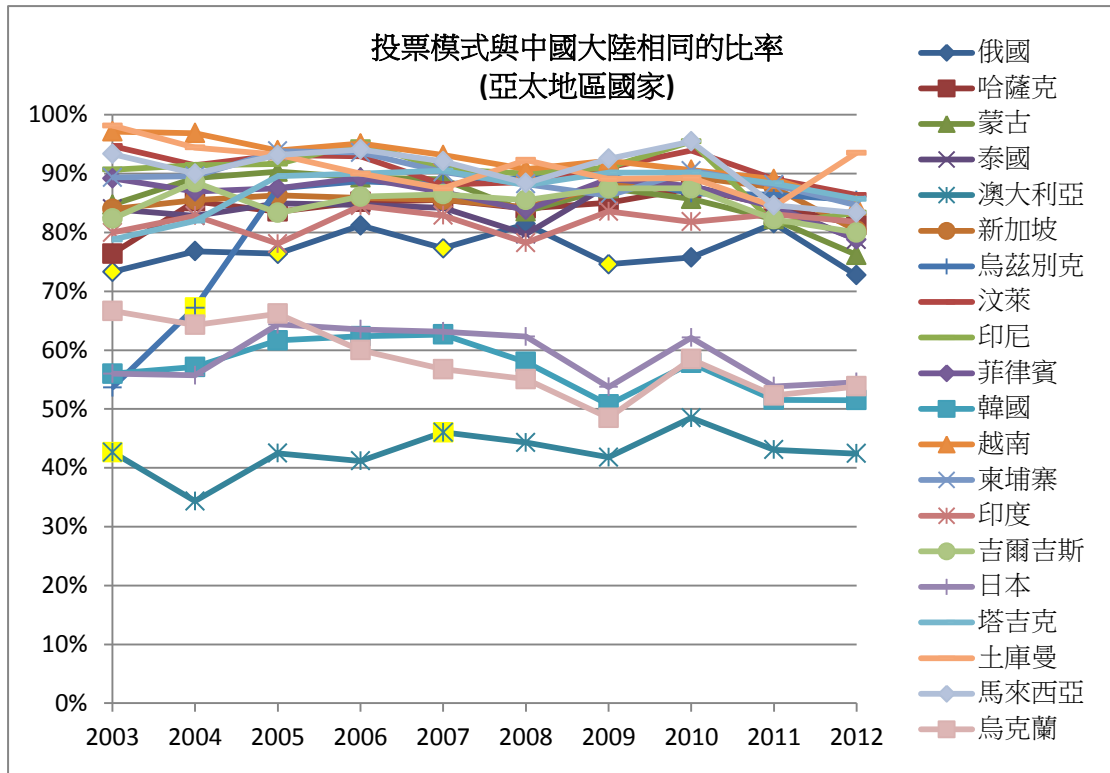


圖 4.5 投票模式與中國大陸相同的比率(亞太地區國家)，2003-2012

資料來源：Bailey, Strezhnev, Anton Strezhnev and Erik Voeten, “Estimating Dynamic State Preferences from United Nations Voting Data,”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61, No. 2 (2017), pp. 430~456.

(三) 美洲地區

美洲地區共計有 10 個國家，具明顯變化的國家分別是：古巴、加拿大、委內瑞拉（圖 4.6），以下個別分析之。

1. 古巴

古巴於聯合國大會中趨向中國大陸的投票模式每年平均有 91.47% 的高比率，最高點為 2003 年的 98.63%，最低點為 2012 年的 84.84%，十年內由幾乎完全與中國大陸投票模式下降了 13.79%。胡錦濤於 2004 年 11 月以及 2008 年 11 月國是訪問古巴，前次國是訪問後的隔年雖小幅下降 2.7% 但仍保持九成以上的高比率，後者則有所提升回復到九成的比率。國是訪問或有影響。

2. 加拿大

加拿大於聯合國大會中趨向中國大陸的投票模式2003至2010年每年平均有45.5%的比率，後兩年則降至二成，最高點為2005年的53.42%，最低點為2012年的24.61%。胡錦濤於2005年9月以及2010年6月國是訪問加拿大，兩次出訪的隔年都未提高趨向比率。國是訪問無影響。

3. 委內瑞拉

委內瑞拉於聯合國大會中趨向中國大陸的投票模式每年平均有89.08%的高比率，最高點為2006年的94.11%，最低點為2012年的80.3%。胡錦濤於2010年國是訪問委內瑞拉，次年的比率有下降的趨勢。國是訪問無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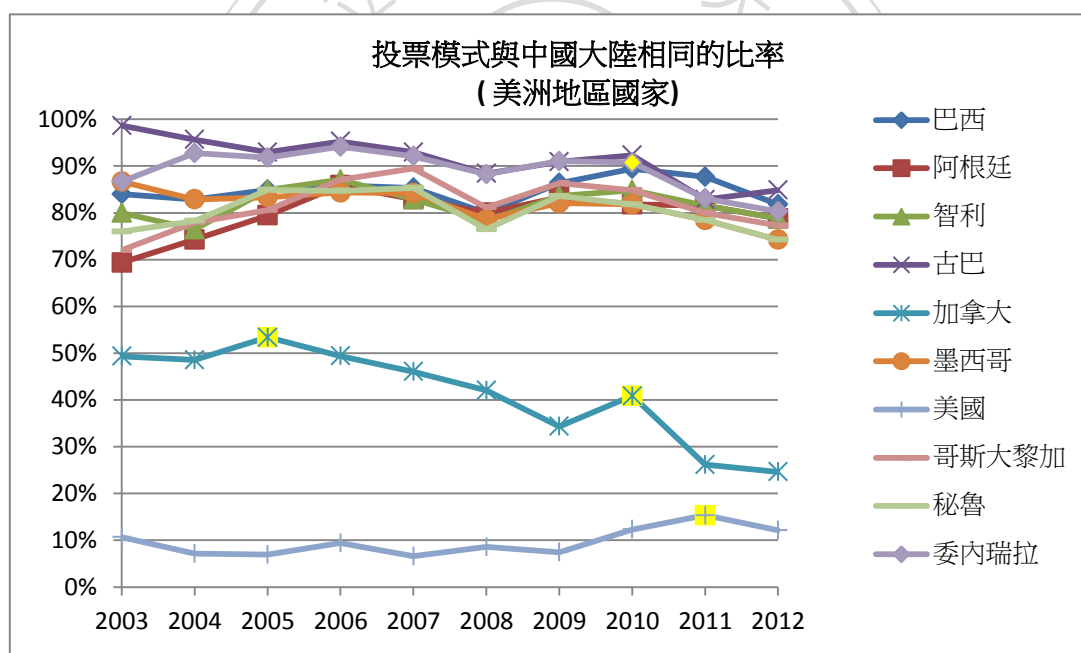


圖 4.6 投票模式與中國大陸相同的比率(美洲地區國家)，2003-2012

資料來源：Bailey, Strezhnev, Anton Strezhnev and Erik Voeten, "Estimating Dynamic State Preferences from United Nations Voting Data,"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61, No. 2 (2017), pp. 430~456.

(四) 中東地區

中東地區共計有7個國家，具明顯變化的國家為沙烏地阿拉伯（圖4.7）。

1. 沙烏地阿拉伯

沙烏地阿拉伯於聯合國大會中趨向中國大陸的投票模式每年平均有 89.61% 的比率，最高點為 2003 年的 97.18%，最低點為 2011 年的 75.38%。胡錦濤於 2006 年 4 月以及 2009 年 2 月國是訪問沙烏地阿拉伯，前次國是訪問後的隔年比率小幅下降 2.33%，仍有 89.33% 的比率，胡錦濤第二次國是訪問後的次年比率提高至 92.18%。國是訪問或有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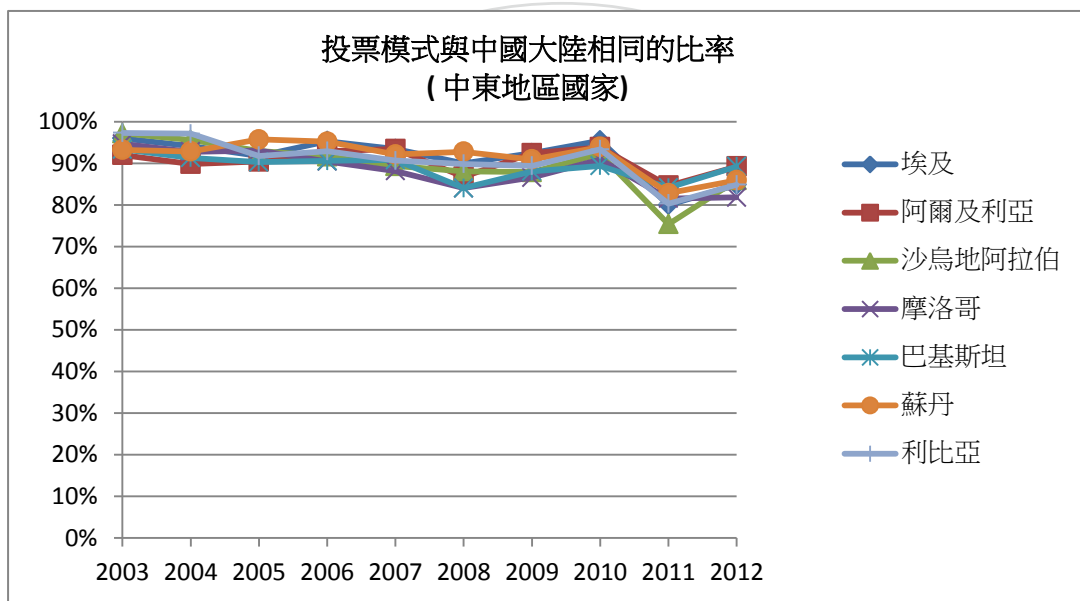


圖 4.7 投票模式與中國大陸相同的比率(中東地區國家)，2003-2012

資料來源：Bailey, Strezhnev, Anton Strezhnev and Erik Voeten, “Estimating Dynamic State Preferences from United Nations Voting Data,”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61, No. 2 (2017), pp. 430~456.

(五) 非洲地區

非洲地區共計有 13 個國家，具有明顯變化的國家為肯亞、喀麥隆、塞席爾 (圖 4.8)，以下分別詳述之。

1. 肯亞

肯亞於聯合國大會中趨向中國大陸的投票模式每年平均有 85.24% 的比率，最高點為 2003 年的 89.18%，最低點為 2004 年的 78.26%。胡錦濤於 2006 年 4

月國是訪問肯亞，次年的比率提高 4.01%。國是訪問有所影響。

2. 喀麥隆

喀麥隆於聯合國大會中趨向中國大陸的投票模式有逐步下降的趨勢，最高點為 2003 年的 70.31%，最低點為 2012 年的 52.30%。胡錦濤於 2007 年 2 月國是訪問喀麥隆，次年的趨向比率下降。國是訪問無影響。

3. 塞席爾

塞席爾於聯合國大會中趨向中國大陸的投票模式有劇烈的變動，2005、2006、2008 年 100% 完全和中國一致，但 2007 年驟降至 50% 此亦為最低點。胡錦濤於 2007 年 2 月國是訪問喀麥隆，次年比率大幅提升。國是訪問有所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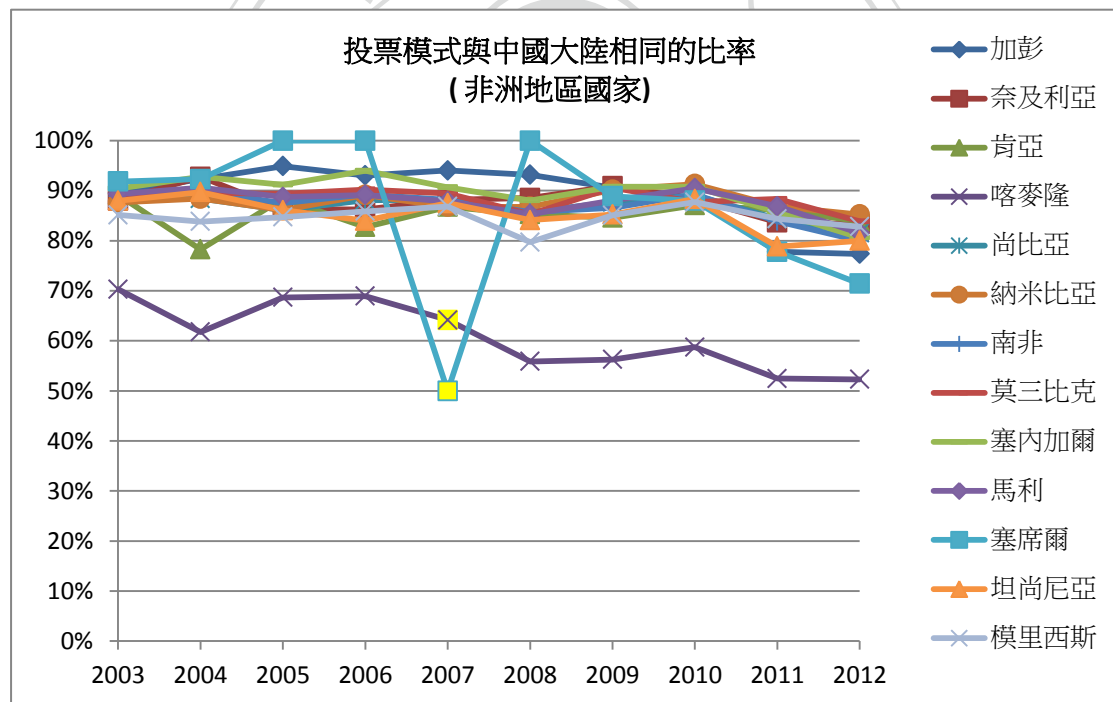


圖 4.8 投票模式與中國大陸相同的比率(非洲地區國家)，2003-2012

資料來源：Bailey, Strezhnev, Anton Strezhnev and Erik Voeten, “Estimating Dynamic State Preferences from United Nations Voting Data,”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61, No. 2 (2017), pp. 430~456.

第三節 小結

胡錦濤的國是出訪顯然更注重外交禮儀的表現，行為舉止顯得中規中矩符合外界對一國最高領導人的期待也無太大的意外。在第一節中本文梳理胡錦濤主政十年間國是訪問紀錄，分析出訪次數與訪問國家數，以作為後續研究的數據資料。第二節本文進一步探究胡錦濤國是訪問的成效，以降低中國大陸威脅感、增進雙邊共同利益為指標。

首先在降低他國對中國大陸的威脅感部分，以美國民眾對中國大陸的觀感、日本民眾對中國大陸的觀感、其他國家的觀感作為測量。本文發現胡錦濤國是訪問僅有效改善日本民眾觀感，對美國及其他國家方面則無明確的效果。胡錦濤 2006 年訪問美國有效改善美國民眾對中國大陸的正面態度，然而在 2011 年訪問後隔年，對中國大陸持正面態度的美國民眾比例降至低點，故無法指出國是訪問有明確的效果；而 2008 年訪問日本則有效改善日本民眾對中國的觀感。藉由全球大數據調查資料，發現就整體而言中國大陸的國是訪問並未對受訪國人民觀感有明顯穩定的效果。其次，檢視胡錦濤曾訪問過的國家在 2003 年至 2012 年間的聯合國大會投票行為變化，投票模式有明顯變化的 13 個國家中，胡錦濤國是訪問後 5 國沒有影響、4 國或有影響、4 國有所影響，由此，國是訪問對投票模式有所作用。胡錦濤時期的國是訪問在十年內共有 33 次國是訪問走訪 84 國，在降低他國對中國大陸的威脅感上無顯著效果，在增進雙邊共同利益上則有所成效。

第五章 習近平時期國是訪問

第一節 訪問次數與對象

習近平為現任中國大陸最高領導人，研究時間內尚未有完整的十年任期，故僅分析第一任期的國是訪問行為，圖 5.1 中的藍色漸層為第一任期的時間序列，呈現習近平主政時期中國大陸以「國是訪問」作為外交工具的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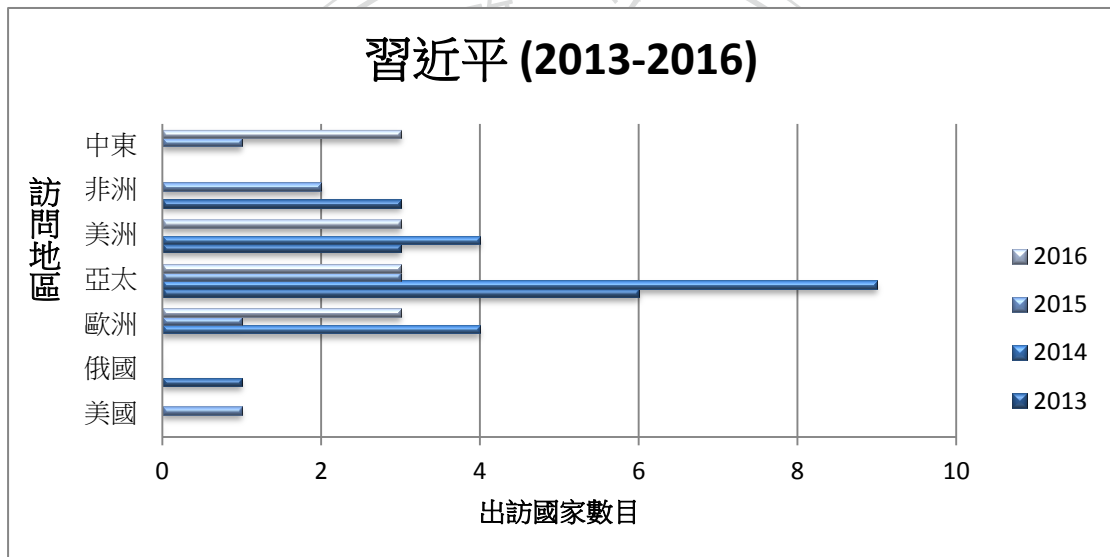


圖 5.1 習近平歷年「國是出訪」訪問的國家與地區，2013-2016

資料來源：綜整自新華社報導、新華網領導人出訪專題、新華網國內外大事紀。

說明：藍色線條為習近平的第一個任期，以漸層表示年份。

儘管習近平從 2012 年 11 月 15 日擔任中國大陸最高領導人以來，至今不過數年的時間，但仍然有兩點主要特徵。首先，習近平從接任的第一年開始便隨即加強以「國是訪問」作為主要的公共外交工具，不僅每年的出訪次數較之前的領導人大幅增加，而且出訪國家數目也更多。第二，在習近平的「國是訪問」戰略中，亞太國家似乎是其所關注的主要重心。從習近平在接任後前三年的「國是訪問」情形的觀察，可明顯看出他比之前所有的領導人更頻繁使用「國是訪問」這

個外交工具，對亞太區域的關注程度更遠大於其他地區。

第二節 內涵與實踐

本文撰寫期間習近平尚未有完整的十年任期，故著重在 2013 年至 2016 年四年期間習近平國是訪問紀錄。由於習近平尚未以中國大陸國家主席身分訪問日本，本文僅就現有資料分析國是訪問外交成效。值得注意的是，習近平的國是出訪有別於前兩任最高領導人，其夫人彭麗媛為國是訪問增添媒體注目，形成習近平的另一個「加分」特色，公共外交的作用與國是訪問外交之工具性價值更加明顯。以下將以國是訪問是否成功降低他國對中國大陸威脅的感受、是否促進與其他國家的雙邊共同利益，檢視其成效。

一、降低他國威脅感受之程度

(一) 美國民眾對中國大陸的態度

綜整蓋洛普公司(Gallup)連續三十七年針對美國民眾對中國大陸整體觀感的調查，下圖 5.2 呈現在習近平主政期間美國民眾對中國大陸觀感的變化，如同前兩章所述本文以深色的線段表示美國民眾對中國大陸持正面態度的趨勢變化，淺色線段則為對中國大陸持負面態度的走勢。習近平曾於 2015 年 9 月國是訪問美國，以一垂直的橘色線段標註。在 2013 年至 2016 年間美國民眾對中國大陸觀感在此四年間相對平穩，習近平主政期間好感最高的一年是 44%，對中國大陸持負面觀感最高的一年比率為 53% (圖 5.2)。習近平國是訪問後，並未明顯的改善美國民眾對中國大陸的正面觀感，反倒是持負面態度的比率提高了 2%，由此，國是訪問似乎未有成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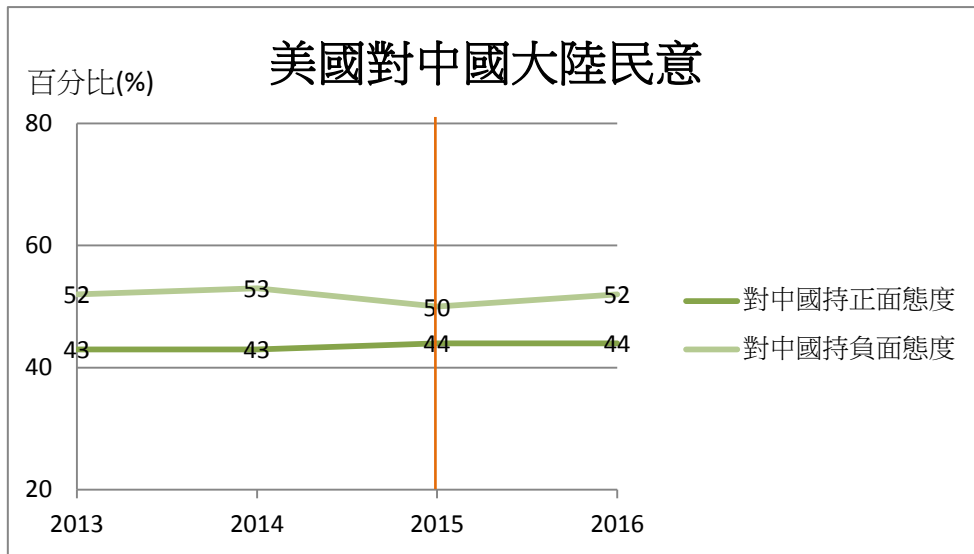


圖 5.2 美國對中國大陸民意，2013-2016

資料來源：“Americans’ Opinions of China,” Gallup survey, November 15, 2017, <<http://www.gallup.com/poll/1627/china.aspx>>.

綜觀官方新聞與紀錄可發現習近平 2015 年 9 月 22 日至 25 日對美國的國是訪問有三項特色：

第一、焦點著重在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經貿合作。習近平將此次訪美訂為和平之旅，國是訪問的重要目標之一，是打造中國大陸崛起後的大國得體外交形象，故習近平乃以大國身分，考量與既有大國美國的互動模式，以及強調與崛起後的中國大陸合作的利處。¹ 例如 22 日抵美習近平強調此次訪問為「推動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建設取得更大發展」、23 日出席中美企業家座談會提到中美經貿合作的巨大潛力、「我們將堅定不移奉行互利雙贏的開放戰略」、24 日與時任美國總統歐巴馬會晤時強調中美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² 雖此次國是訪問

¹ 熊玠，「中國復興有利於美國與全世界－習近平訪美給世人的信息」，*海峽評論*，第 299 期(2015)，頁 32~36；趙可金，「習近平訪美『中國夢』對話『美國夢』」，*人民論壇*（北京），第 19 期（2015），頁 17~19；新華網專題報導，「習近平美國之行」，*新華網*，檢索時間：2017 年 12 月 20 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cnleaders/xijinpings/xjpcpf1509/mgzx.htm>>。

² 「綜述：習近平訪美將深化新型大國關係內涵」，*新華網*，2015 年 9 月 10 日，檢索時間：2017 年 12 月 22 日，<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09/10/c_1116525792.htm>；「習近平訪美第一日」，*新華網*，2015 年 9 月 23 日，檢索時間：2017 年 12 月 22 日，

亦涉及網路安全、氣候變化、軍事透平、貿易匯率等議題，且敏感議題上美中兩國歧見未消針鋒相對，但中國大陸不冀求以一次訪問解決所有爭端，而是著眼於擘劃一新的大國互動模式。

第二、展現中國崛起的自信，「夫人外交」取代「民間交流」吸引目光。³ 儘管後鄧時期第一夫人皆曾同行國是訪問，但因中共固有政治傳統與歷史背景歷代領導人皆不強調此「柔情牌」，中國大陸第一夫人形象未曾在國際社會留下深刻印象。習近平上任後與彭麗媛攜手大方出訪的形象，展現了中共最高領導人自信，開啟外界對中國大陸的另一種認識。⁴ 習近平主政時期的「夫人外交」吸引媒體焦點，逐漸與過去中國大陸領導人國是訪問的輕鬆「民間時刻」比肩成為公眾討論的話題。檢視新華網報導與網路專頁，23日習近平訪問林肯中學並獲贈球衣，拿橄欖球與學生合照等，親切互動的撰寫非由習近平本人觀感或角度出發，僅以文字、採訪他人紀錄。中國大陸官方反倒增加對彭麗媛的對外表現多有著墨，如23日彭麗媛參觀癌症研究中心(Fred Hutchinson Cancer Research Center)、25日赴美國國家動物園熊貓館命名儀式、參觀林肯藝術中心與茱莉亞學院。⁵ 此外，國是訪問第一夫人彭麗媛的名字與中國大陸最高領導人同時出現在多篇報導上，為過去二十年來罕見。

<http://news.xinhuanet.com/video/sjxw/2015-09/23/c_1116658552.htm>；「習近平訪美第二日」，**新華網**，2015年9月24日，檢索時間：2017年12月22日，

<http://news.xinhuanet.com/video/sjxw/2015-09/24/c_1116671119.htm>；「習近平訪美第三日」，**新華網**，2015年9月25日，檢索時間：2017年12月22日，

<http://news.xinhuanet.com/video/sjxw/2015-09/25/c_1116684063.htm>。

³「美媒評習近平訪美『最難忘時刻』」，**新華網**，2015年10月2日，檢索時間：2017年12月22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10/02/c_1116733419.htm>；「習行跟拍 習主席來到林肯中學」，**新華網**，2015年9月25日，檢索時間：2017年12月23日，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09/25/c_128266287.htm>；「彭麗媛參觀林肯藝術中心和茱莉亞學院」，**新華網**，2015年9月29日，檢索時間：2017年12月22日，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09/29/c_1116703659.htm>。

⁴「國平：自信中國的亮麗國際表達」，**新華網**，2015年9月30日，檢索時間：2017年12月22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09/30/c_1116727734.htm>。

⁵「習近平訪美第二日」，**新華網**，2015年9月24日，檢索時間：2017年12月24日，<http://news.xinhuanet.com/video/sjxw/2015-09/24/c_1116671119.htm>；「彭麗媛同美國總統奧巴馬夫人米歇爾共同參觀美國國家動物園大熊貓館」，**新華網**，2015年9月26日，檢索時間：2017年12月23日，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09/26/c_1116684601.htm>。

第三、重視高曝光、廣泛與美國不同群體目標聽眾接觸但以政府官員為主。

⁶ 如同歷屆中國大陸領導人，國是訪問美國廣泛的接觸政府官員如時任美國副總統拜登(Joe Biden)、華盛頓州州長、華盛頓州聯邦參議員、西雅圖市市長等，企業界人包括美國十大企業首席執行長蘋果公司庫克(Timothy Donald Cook)、IBM 羅梅蒂 (Virginia Rometty)、臉書創辦人祖克伯(Mark Elliot Zuckerberg)等，及華僑人士等等。⁷ 但梳理新華網新聞，習近平訪美仍以與時任美國總統歐巴馬的會談為焦點，與其建構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考量相契合。

習近平於 2015 年 9 月 22 日至 25 日國是訪問美國，該年美國民眾對中國大陸的觀感為四年來差距最少的一次為 6%，次年美國民眾正面觀感不變，但負面觀感有上升現象。因此無法明確指出國是訪問有產生中國大陸預期的效果。

(二) 日本民眾對中國大陸的態度

習近平主政四年間日本民眾對中國大陸觀感持正面態度在圖 5.3 以深色線段表示，持負面態度以淺色線段顯示，期間習近平尚未國是出訪日本。2013 年至 2016 年間日本民眾對中國大陸的觀感呈現兩極趨勢，負面觀感每年都有八成以上的高比率，最高點為 83.2% 其亦是歷年來最高；正面觀感則低於二成並逐年下降，最低點為 12.5% 也創下歷來最低的紀錄(圖 5.3)。由於習近平尚未國是訪問日本，無法檢測其是否有緩和日本民眾觀感的作用。

⁶ 「平民情懷最動人」，**新華網**，2015 年 10 月 3 日，檢索時間：2017 年 12 月 23 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10/03/c_1116736727.htm>；「習近平訪美第二日」，**新華網**，2015 年 9 月 24 日，檢索時間：2017 年 12 月 22 日，<http://news.xinhuanet.com/video/sjxw/2015-09/24/c_1116671119.htm>。

⁷ 「習近平出席中美企業家座談會」，**新華網**，2015 年 10 月 24 日，檢索時間：2017 年 12 月 24 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09/24/c_1116662637.htm>；新華網專題報導，「習近平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並出席聯合國成立 70 週年系列峰會」，**新華網**，檢索時間：2017 年 12 月 23 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cnleaders/xij Jinping/xjpcf1509/index.ht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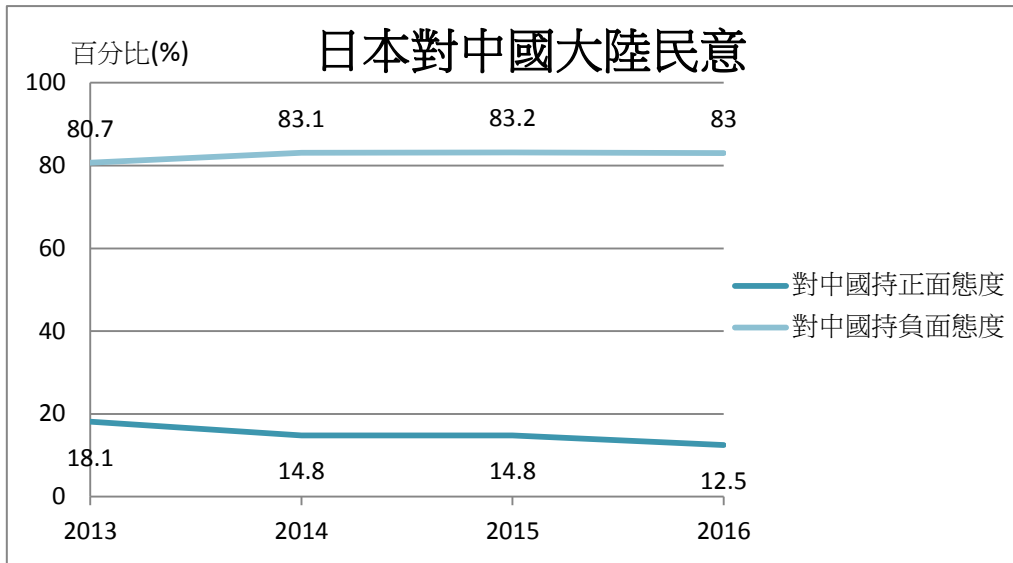


圖 5.3 日本對中國大陸民意，2013-2016

資料來源：CSIS Database, “How are Global Views on China Trending?” November 07, 2017, < <https://chinapower.csis.org/global-views/> >.

(三) 其他國家民眾對中國大陸觀感之轉變

除了依美國與日本民眾對中國大陸的觀感作為最低可能性 (Least Possible Case Selection) 考量外，本文亦以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 始自 2005 年針對全球國家和地區每年所做的「對中國的觀感」(View of China) 調查作為支持。下表 5.1 為習近平主政四年間各國在中國大陸進行「國是訪問」之後對中國大陸觀感的變化，灰底部分表示中國大陸曾在該年度對該國進行訪問，而灰底的...部分為中國大陸進行「國是訪問」的當年 Pew 並未進行調查。如上章所述本文僅呈現各國正面態度的趨勢變化，並抽出八大工業國作為主要大國之類別，其他國家則以地區分類。

本文以國是訪問後次年的好感度作為分析標的，共有 12 筆資料，有 7 次在中國大陸進行「國是訪問」後民眾對中國好感度提高，有 5 次在中國「國是訪問」後民眾對中國大陸的好感度減少。就整體趨勢而言，中國大陸的「國是訪問」對於提升受訪國人民對中國大陸的好感度或有影響，但並沒有顯著且穩定的效果。

表 5.1 各國在中國大陸進行「國是訪問」之後對中國大陸觀感的變化

國家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主要大國]					
美國	40%	37%	35%	38%	37%
俄羅斯	62%	62%	64%	79%	
日本	15%	5%	7%	9%	11%
德國	29%	28%	28%	34%	28%
法國	40%	42%	47%	50%	33%
英國	49%	48%	47%	45%	37%
[亞太國家]					
印尼		70%	66%	63%	
南韓		46%	56%	61%	
澳大利亞		58%	...	57%	52%
印度		35%	31%	41%	31%
馬來西亞		81%	74%	78%	
菲律賓		48%	38%	54%	
[中東國家]					
約旦	47%	40%	35%	33%	
黎巴嫩	59%	56%	53%	52%	
巴基斯坦	85%	81%	77%	82%	
土耳其	22%	27%	21%	18%	
以色列		38%	49%	55%	
巴勒斯坦		47%	61%	54%	
埃及	52%	45%	46%		
[非洲國家]					
奈及利亞		76%	70%	70%	
肯亞		78%	74%	70%	
迦納		67%	61%	80%	
南非		48%	45%	52%	
坦尚尼亞		77%	74%	
烏干達		59%	61%	65%	
[拉美國家]					
墨西哥	40%	45%	43%	47%	
阿根廷		54%	40%	53%	
巴西	50%	65%	44%	55%	
智利		62%	60%	66%	
[北美國家]					
加拿大		43%		39%	45%
[歐洲國家]					
西班牙	49%	48%	39%	41%	28%
波蘭	50%	43%	32%	40%	37%
希臘	56%	59%	49%		57%
義大利	30%	28%	26%	40%	32%

資料來源：陳郁芬，〈中國國家形象之建構：以胡錦濤時期為例〉，發表於中國政治學 2016 年會暨「新政局下的內外挑戰與政經治理：區域發展、分配正義、族群政治」國際學術研討會，〈花蓮：東華大學，2015〉；“Opinion of China,” **Pew Reserch Center**, February 14, 2017, <<http://www.pewglobal.org/database/indicator/24/>>.

說明：2000~2012 年資料引用自陳郁芬的整理，2002 年及 2013~2016 年為本文從相同來源更新。

二、加強雙邊共同利益之交集

延續前兩章對江澤民與胡錦濤的分析，本節以「世界各國在聯合國大會的投票紀錄」作為國家與國家之間關係的測量，梳理中國大陸曾國是訪問過的國家歷年來之「趨向中國的投票比例(Pct. agree China)」變化，以了解在習近平國是訪問後受訪國與中國大陸的利益是否趨於相似，即共同利益之交集增加。本文依習近平主政四年間國是訪問的對象，以地區分類，然受限於既有公開資料的取得，本文僅得探討受訪國 2013 至 2015 年三年間的投票模式。

(一) 歐洲地區

首先，歐洲地區共計有 8 個國家，投票行為有明顯變化與不同的國家為法國與英國(圖 5.4)。

1. 法國

法國於聯合國大會中趨向中國大陸的投票模式有逐年下降的現象，最高點為 2013 年的 43.75%，最低點為 2015 年的 38.88%。習近平於 2014 年 3 月國是訪問法國，次年的趨向比率下降的幅度在歐洲地區國家中相對明顯。因此，國是訪問策略無影響。

2. 英國

英國於聯合國大會中趨向中國大陸的投票模式在歐洲地區中相對低，最高點為 2013 年的 42.18%，最低點為 2012 年的 37.83%。習近平於 2015 年 10 月國是訪問英國，雖目前尚無訪問次年的資料，但該年在歐洲地區其他國家皆為下降的情況下，唯獨英國的趨向比率上升至 38.88%。國是訪問或有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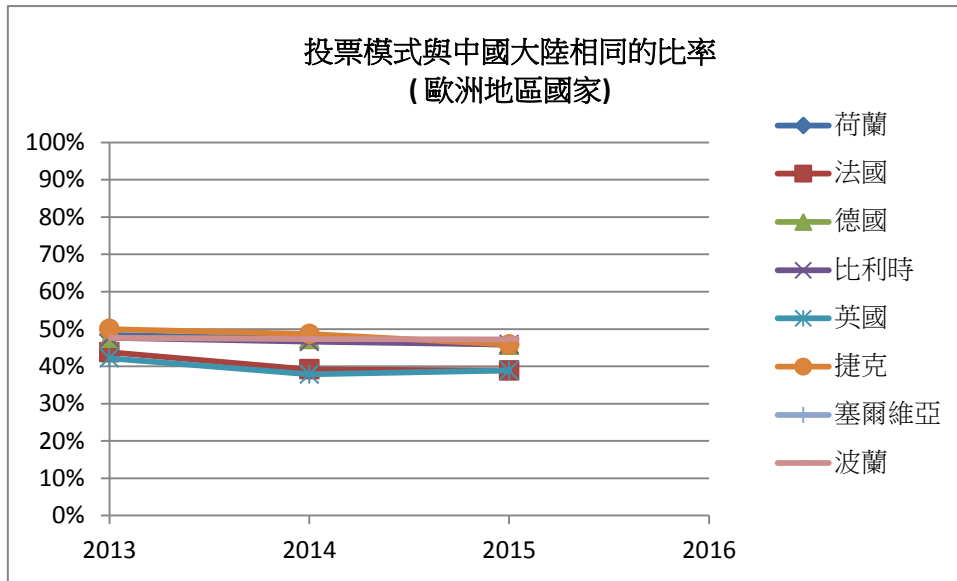


圖 5.4 投票模式與中國大陸相同的比率(歐洲地區國家)，2013-2016

資料來源：Bailey, Strezhnev, Anton Strezhnev and Erik Voeten, “Estimating Dynamic State Preferences from United Nations Voting Data,”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61, No. 2 (2017), pp. 430~456.

(二) 亞太地區

亞太地區共計有 22 個國家，從下圖七中投票行為有明顯變化與不同的國家為俄國、土庫曼、澳大利亞、斐濟(圖 5.5)，以下分別詳述之。

1. 俄國

俄國於聯合國大會中趨向中國大陸的投票模式，不同於亞太地區其他國家在三年間趨緩下降的走勢，反倒於 2015 年比率上升至最高點 72.22%，最低點則為 2014 年的 69.44%。習近平於 2013 年國是訪問俄國，次年比率下降 2.43%。國是訪問無影響。

2. 土庫曼

土庫曼於聯合國大會中趨向中國大陸的投票模式都維持八成以上的高比率，在 2015 年亞太地區其他國家趨向中國比率下降時反倒有些微上升的現象。習近平於 2013 年 9 月國是訪問土庫曼，次年比率下降 4.35%。國是訪問無影響。

3. 澳大利亞

澳大利亞於聯合國會中趨向中國大陸的投票模式，呈現先上升後微幅下降的趨勢，最高點為 2014 年的 40.54%，最低點為 2013 年的 37.5%。習近平於 2014 年 11 月國是訪問澳大利亞，該年為比率最高的一年，次年比率些微下降 1.66%。國是訪問或有影響。

4. 斐濟

斐濟於聯合國大會中趨向中國大陸的投票比率，可明顯發現逐年遞減的現象，最高點為 2013 年 84.12%，最低點為 2015 年 73.91%。習近平於 2014 年 11 月國是訪問斐濟，次年趨向比率減少。國是訪問無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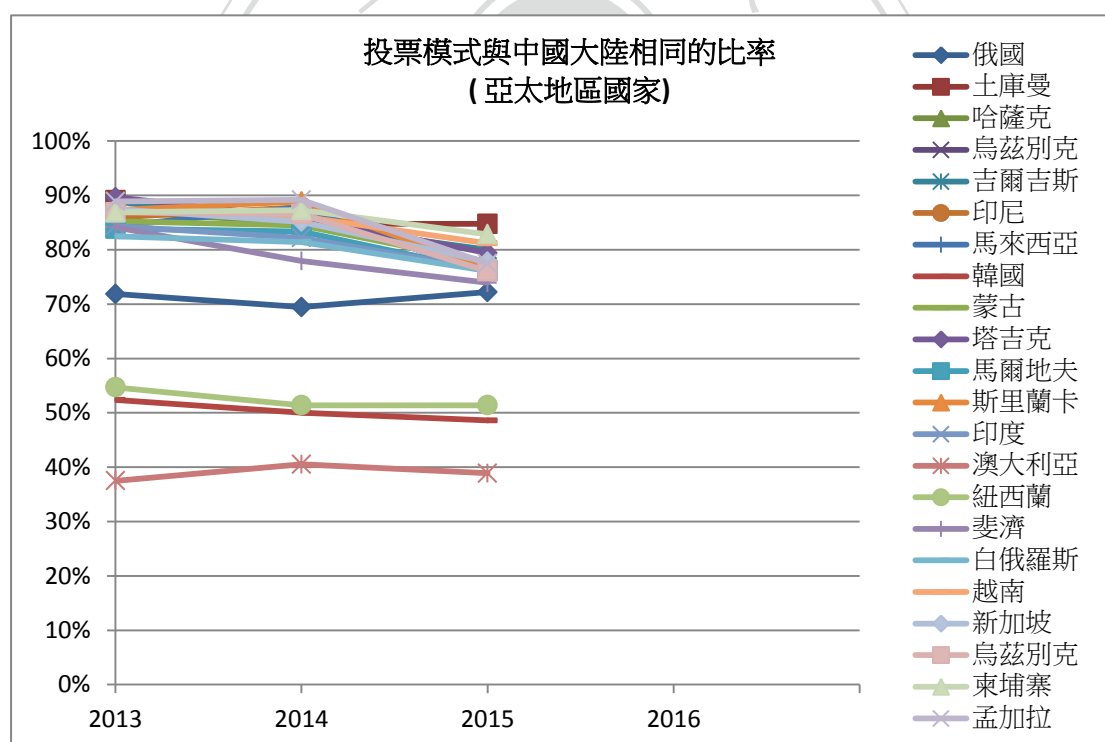


圖 5.5 投票模式與中國大陸相同的比率(亞太地區國家)，2013-2016

資料來源：Bailey, Strezhnev, Anton Strezhnev and Erik Voeten, “Estimating Dynamic State Preferences from United Nations Voting Data,”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61, No. 2 (2017), pp. 430~456.

(三) 美洲地區

美洲地區共計有 11 個國家，具明顯變化與不同軌跡的國家為古巴與美國(圖 5.6)，以下分別詳述之。

1. 古巴

古巴於聯合國大會中趨向中國大陸的投票模式，第二年即 2014 年之走勢不同於其他美洲地區國家下降或趨緩，古巴的比率上升至 86.30%，此亦是古巴比率最高的一年。習近平於 2014 年 7 月國是訪問古巴，次年趨向比率減少至 79.16%。國是訪問或有影響。

2. 美國

美國於聯合國大會中趨向中國大陸的投票模式普遍偏低，但在 2015 年美洲地區其他國家比率均下降時，上升至 16.66%。同年(2015)習近平於 9 月國是訪問美國，然無次年數據資料可供進一步分析。國是訪問或有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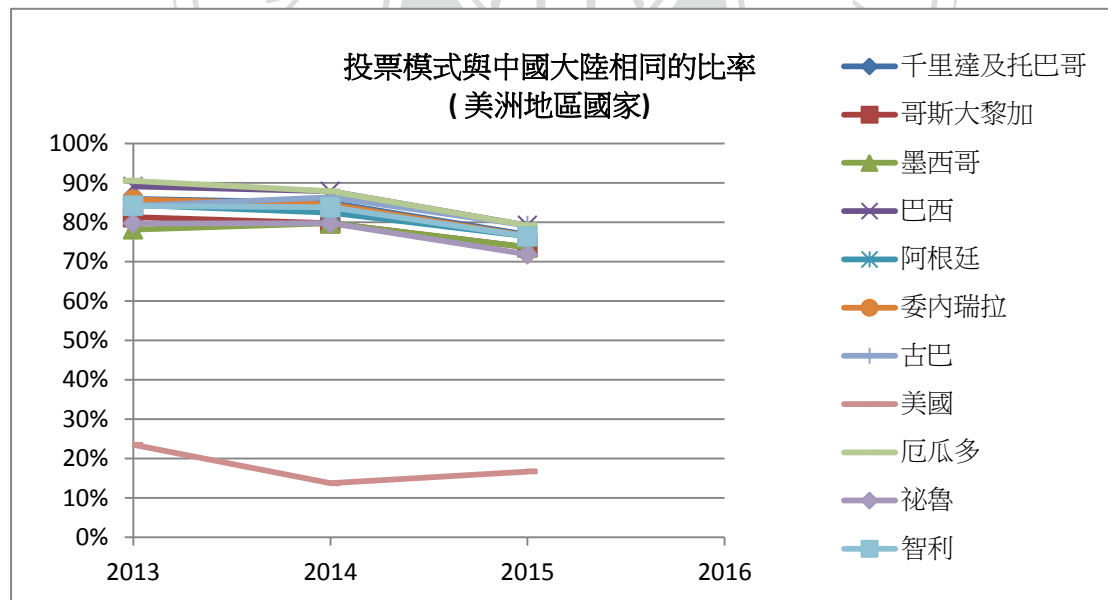


圖 5.6 投票模式與中國大陸相同的比率(美洲地區國家)，2013-2016

資料來源：Bailey, Strezhnev, Anton Strezhnev and Erik Voeten, “Estimating Dynamic State Preferences from United Nations Voting Data,”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61, No. 2 (2017), pp. 430~456.

(四) 中東地區

中東地區共計有 4 個國家，此四年間投票行為有明顯變化與不同的國家為巴基斯坦(圖 5.7)。

1. 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於聯合國大會中趨向中國大陸的投票模式在第二年，即 2014 年，中東地區其他國家比率皆上升時反下降，最高點為 2013 年的 90.47%，最低點為 2015 年的 83.33%。習近平於 2015 年 4 月國是訪問巴基斯坦，由於無隔年的數據資料，無法判斷國是訪問是否有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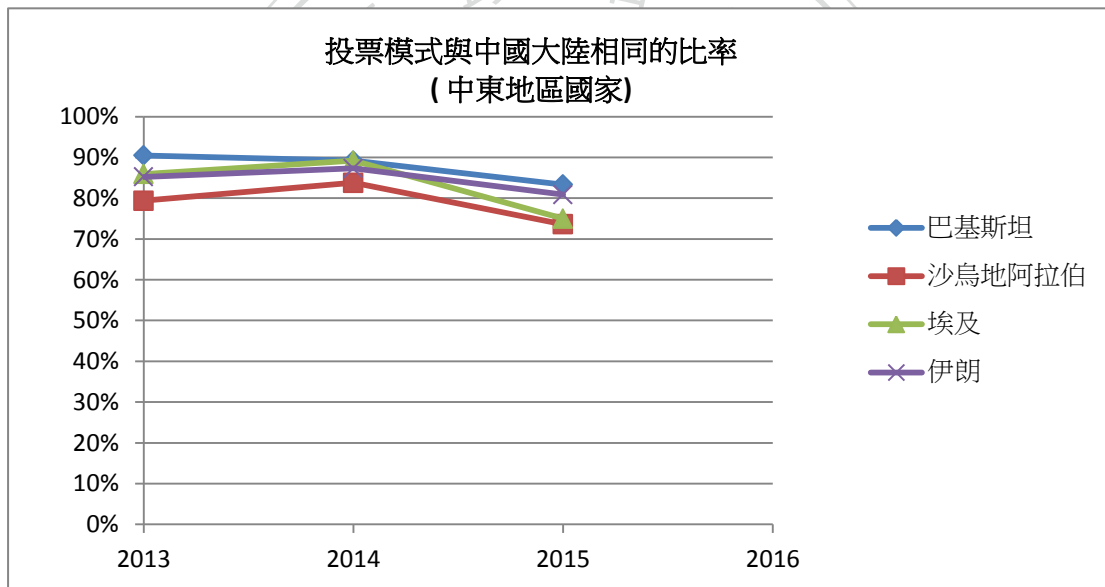


圖 5.7 投票模式與中國大陸相同的比率(中東地區國家)，2013-2016

資料來源：Bailey, Strezhnev, Anton Strezhnev and Erik Voeten, “Estimating Dynamic State Preferences from United Nations Voting Data,”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61, No. 2 (2017), pp. 430~456.

(五) 非洲地區

非洲地區共計有 4 個國家，投票行為具明顯變化與不同的國家為辛巴威(圖 5.8)，下列詳述之。

1. 辛巴威

辛巴威於聯合國大會中趨向中國大陸的投票模式，在第二年即 2014 年明顯有別於非洲地區其他國家，比率上升至 90.27%。習近平於 2015 年 12 月國是訪問辛巴威，然無次年數據資料可供進一步判斷國是訪問是否有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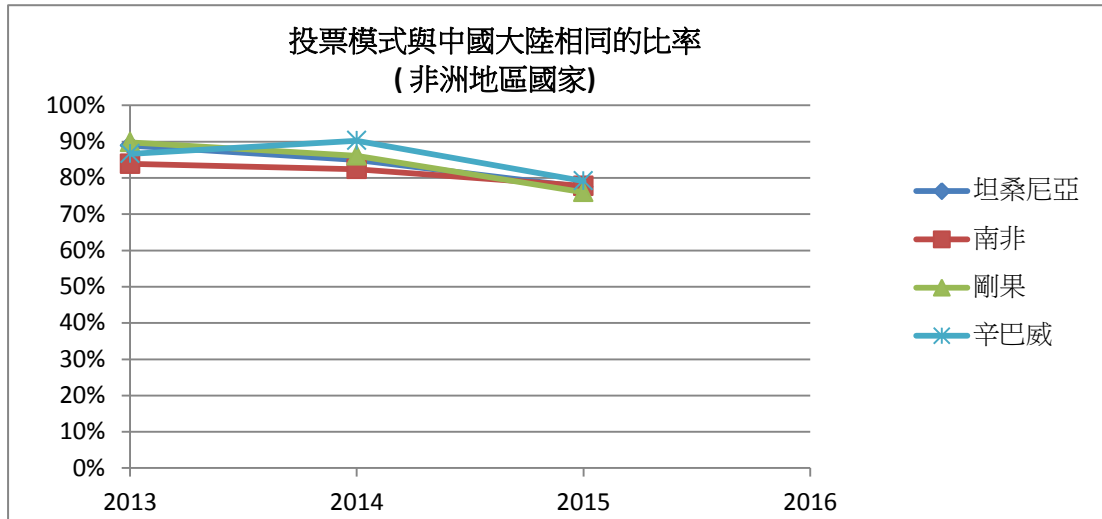


圖 5.8 投票模式與中國大陸相同的比率(非洲地區國家)，2013-2016

資料來源：Bailey, Strezhnev, Anton Strezhnev and Erik Voeten, “Estimating Dynamic State Preferences from United Nations Voting Data,”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61, No. 2 (2017), pp. 430~456.

第三節 小結

習近平的國是出訪明顯與歷屆領導人不同，除了打響中國大陸第一夫人柔情排外顯得更具大國自信。在第一節中本文梳理習近平目前主政四年間國是訪問紀錄，分析出訪次數與訪問國家數，以作為後續研究的數據資料。第二節本文進一步探究胡習近平國是訪問的成效，以降低中國大陸崛起後形成對他國的威脅感、增進雙邊共同利益為指標。

首先在降低他國對中國大陸的威脅感部分，以美國民眾對中國大陸的觀感（圖 5.2）、日本民眾對中國大陸的觀感（圖 5.3）、其他國家的觀感（表 5.1）作

為測量。因尚無國是訪問日本紀錄，本文僅就美國民眾與其他國家觀感分析，發現習近平國是訪問對兩者皆無明確的效果。習近平 2015 年國是訪問美國，次年美國民眾正面觀感不變，但負面觀感有上升現象，故無法明確指出國是訪問有產生中國大陸預期的效果。而根據全球大數據調查資料，就整體而言中國大陸的國是訪問也未對受訪國人民觀感有明顯穩定的效果。其次，檢視習近平曾訪問過的國家在 2013 年至 2015 年間的聯合國大會投票行為變化，投票模式有明顯變化的 10 個國家中，習近平國是訪問後 4 國沒有影響、4 國或有影響，另有 2 國因未有 2016 年投票資料無法判斷。由此，國是訪問對投票模式尚無明確作用。習近平在四年內共有 21 次國是出訪紀錄並走訪 50 國，受限於現有公開資料的取得，在現有數據分析下檢視國是訪問策略的成效，其在降低他國對中國大陸形成的威脅感上無顯著效果，在增進雙邊共同利益上亦無明確成效。



第陸章 國是訪問整體成效

在中國大陸官方的宣示與有關的研究中都曾指出，中國大陸的公共外交主要目標包括：降低他國對中國威脅的感受以及促進與他國的雙邊共同利益。上述章節本文分別對後鄧時期三位最高領導人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之國是訪問進行數據資料蒐整，並檢視其特色及內涵觀察國是訪問的成效。有鑑於跨時跨國資料得之不易，以及須以宏觀角度研究國是訪問外交政策，以完整客觀地了解此一外交政策的成效。本章將以經驗證據檢證探討中國大陸的「國是訪問」是否能夠有效地達成中國大陸官方所宣稱的公共外交目標。

誠然，中國大陸領導人不論是常態性的出訪亦或久久一次訪問，每次的國是訪問都有其獨特的目的與意涵，例如對 A 國的訪問可能是長久以來的合作對象，高層間友好熱絡關係甚為重要，對 B 國則著眼於經濟層面的考量，諸如加強雙邊的能源合作、雙邊經貿往來等，對 C 國的出訪可能因地緣政治因素，為了強化雙邊的防衛合作、淡化邊境紛爭等等。有鑑於證實中國大陸出訪該國真正目的有其困難度，甚至無法達成，本文的研究旨趣並不在探究中國大陸對每個受訪國各自的訪問特定成效以及出訪動機，而是以中國大陸實行「公共外交」政策的整體角度，來探討「國是訪問」是否確實在整體趨勢上達成了「公共外交」的效果。

第一節 降低他國威脅感受之程度

本節將透過對下列五個議題的回答來檢證中國大陸「國是訪問」整體政策的使用，是否成功的降低他國對中國大陸威脅的感受。延續前文的測量指標，本文首先以美國民眾與日本民眾對中國大陸的正面態度變化，以及其他國家對中國大陸的好感度檢測。此外，搭配統計模型數據分析，深入探討其他二個有關中國大

陸「國是訪問」政策的使用，是否能成功降低他國對中國大陸威脅的感受的議題。

五個議題羅列如下：第一，美國民眾對中國大陸的態度是否在中國大陸進行「國是訪問」之後有所改善？第二，日本民眾對中國大陸的態度是否在中國大陸進行「國是訪問」之後有所改善？第三，中國大陸「國是訪問」政策的使用是否使其他國家對中國大陸的好感程度增加？第四，中國大陸與其訪問國之間的實質合作次數是否在中國大陸進行「國是訪問」之後有所增加？第五，中國大陸與其訪問國之間軍事化衝突發生的機率是否在中國大陸進行「國是訪問」之後有所減少？除了他國觀感外，選擇上述二項議題作為統計資料檢測與觀察指標的考量是顯而易見的：若中國大陸「國是訪問」的運用確實有助於降低他國對中國大陸的威脅感受，則應該要看到，中國大陸「國是訪問」的訪問國對中國大陸印象的改善、更多的雙邊合作以及更少的雙邊衝突，應會有顯著的數據呈現明顯的正面影響。以下一一檢證之。

一、 美國民眾對中國大陸觀感之變遷

歷年來美國的民意對中國大陸態度的變化，下圖 6.1 本文以紅線表示對中國大陸持正面態度的比率，綠線表示對中國大陸持負面態度的比率，四條垂直的橘線標示中國大陸最高領導人對美國進行國是訪問的時間。觀察美國民意的整體變化，有三特色；第一，這二十幾年以來，美國民眾對於中國大陸的態度基本上可說是相對地穩定，大約有 40% 左右的美國民眾對中國大陸是抱持著較為負面的態度，而有 50% 左右的民眾對中國大陸是抱持著較為正面的態度(圖 6.1)。

廿十多年來這個相對比率的起伏變動並不明顯，尤其與下節中的日本民意變化(圖 6.2)相對照將更能凸顯此特點。第二，在 2006 年以前，中國大陸最高領導人對美國進行「國是訪問」後，成功的改善美國民眾對中國大陸的觀感，及美國民眾對中國大陸的正面態度比例提升。1997 年江澤民的國是出訪和 2006 年胡錦

濤的國是出訪之後，美國民眾對於中國大陸的好感度都有微幅上升的趨勢。第三，自 2011 年後，中國大陸對美國兩次的「國是訪問」皆無助於改善美國民眾對中國大陸的態度甚至帶來負面影響，即負面觀感的比例上升。2011 年胡錦濤第二次的對美國是訪問和 2015 年習近平的國是訪問之後，美國民眾對於中國大陸的好感度皆呈現下降的情形。整體而言，中國大陸的「國是訪問」對於改進美國民眾對於中國大陸的態度效果並不明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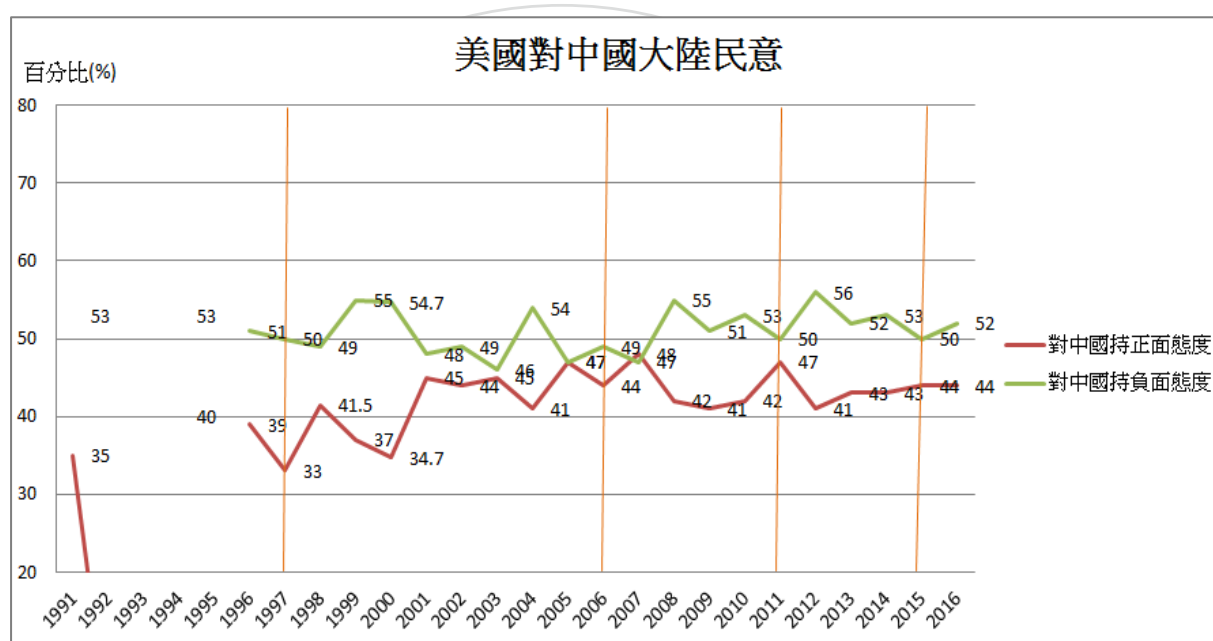


圖 6.1 美國對中國大陸民意，1991-2016

資料來源：“Americans’ Opinions of China,” Gallup survey, November 15, 2017, <<http://www.gallup.com/poll/1627/china.aspx>>.

二、 日本民眾對中國大陸觀感之變化

歷年來日本的民意對中國大陸態度的變化，圖 6.2 中本文以藍線表示對中國大陸持正面態度的比率，紅線表示對中國大陸持負面態度的比率，兩條垂直的橘線標示中國大陸最高領導人對日本進行國是訪問的時間。

日本民意對中國大陸態度的變化中呈現三項特徵：第一，在 2003 年以前，雖然日本的民眾對中國大陸的態度曾經在 1998 年掉到了 45% 的低點，但一般來說，對中國大陸持正面態度的人數與對中國大陸持負面態度的人數是不相上下的五五波。第二，在 2003 年之後到 2008 年之間，日本民眾對中國大陸持正面態度的比率突然一下子減少了大約 10 至 15 個百分點，但在這五年之間，一般來說日本民眾對中國大陸持正面態度的比率仍然可以維持在 35% 左右的比率。第三，在 2008 年之後，日本民眾對中國大陸持正面態度的比率開始急遽下降，到 2012 年時已經跌到了只有 18% 的日本民眾對中國大陸持正面態度，2016 年更降至 12% 的谷底。第四，就「國是訪問」的效果來說，中國大陸最高領導人在 1998 年的出訪，似乎起到了一些穩住日本民眾對中國大陸態度的作用，然而中國大陸最高領導人在 2008 年的出訪不僅未帶來正面的影響，反而使日本的民眾對中國大陸態度急遽惡化(圖 6.2)。

綜上所述，日本民眾對中國大陸觀感並未因中國大陸最高領導人的到訪而有正向的發展，「國是訪問」外交策略並未扭轉中國大陸在日本民眾心中的形象，無法帶來公共外交中期望改善雙方關係的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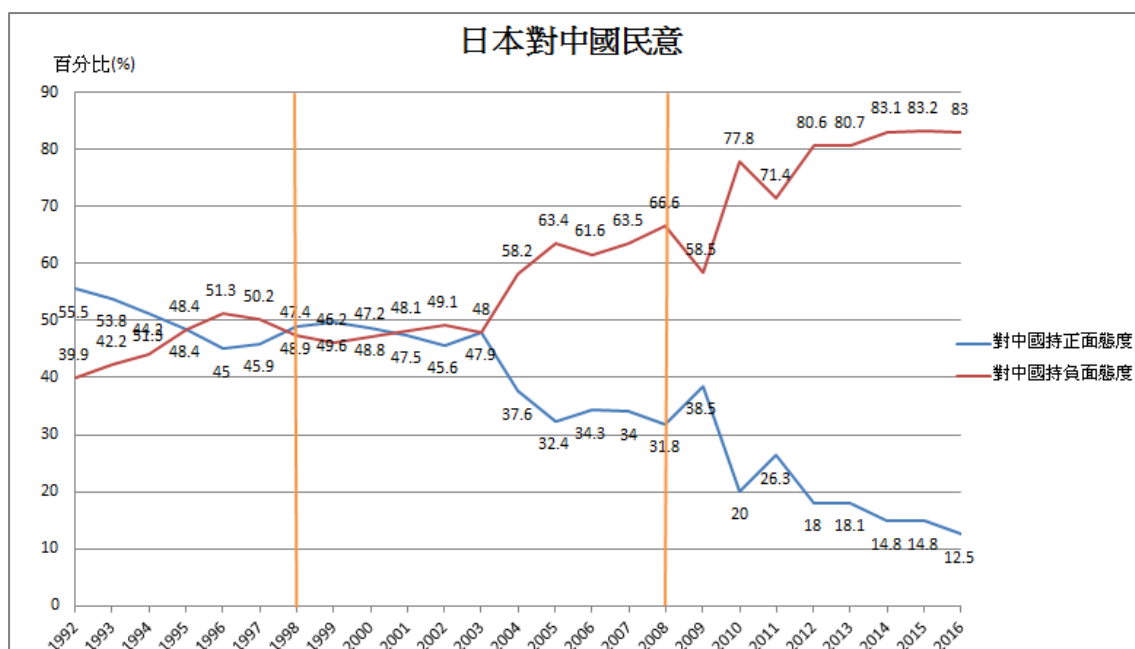


圖 6.2 日本對中國大陸民意，1992-2016

資料來源：Michael Green, “Japan’s Role in Asia: Searching for Certainty,” in David Shambaugh and Michael Yahuda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Asia, 2nd edition* (NY: New York, NY: Rowman & Littlefield, 2014); CSIS Database, “How are Global Views on China Trending?” November 07, 2017, < <https://chinapower.csis.org/global-views/> >.

總結上述，由圖 6.1 與圖 6.2 的資料顯示，不論是美國或是日本民眾對中國大陸的態度都未在中國大陸進行「國是訪問」外交政策之後有所改善，反而是，與中國大陸的預期相反，甚至近年來中國大陸「國是訪問」之後的效果呈現在美國與日本的民眾對於中國大陸的觀感上日趨惡化。中國大陸的「國是訪問」似乎未在美國與日本發揮預期的作用。

三、 其他國家民眾對中國大陸觀感之轉變

接著檢視中國大陸的「國是訪問」是否改善了其他國家對中國大陸態度。關於其他國家對中國大陸的態度變化，目前唯一可得的較具系統性的調查資料即為著名的智庫「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 針對全球國家和地區所做的

「對中國的觀感」(View of China) 調查。該調查統計在各個年度中各國人民對中國大陸擁有好感 (favorable) 與反感 (unfavorable) 的百分比。該調查從 2005 年開始進行，之後每年調查一次，但每年參與調查的國家有所不同。本文將這 12 年 (2005 年至 2016 年) 以來所有參與調查的國家其民意對中國大陸抱持正面態度的百分比列出，其中 2005 年至 2012 年的資料是引用自陳郁芬對 Pew 網頁資料的整理，2013 年至 2016 年的資料，為本文從相同來源 Pew 網頁的更新。由下表 6.1 中觀察各國在中國大陸進行「國是訪問」之後對中國大陸觀感的變化。

中國大陸在 Pew 的調查有涵蓋的「國家一年度」資料中總共進行了 44 次的「國是訪問」(表 6.1 的灰底部分)，其中有 13 次在中國大陸進行「國是訪問」的當年 Pew 並未進行調查(表 6.1 灰底...的部分)、有 3 次在中國大陸進行「國是訪問」的後一年 Pew 未進行調查，所以總共有 28 次在中國大陸進行「國是訪問」的當年以及後一年都有調查記錄的資料，可供本文對中國大陸進行「國是訪問」前後，比較該國人民對中國大陸好感度變化(表 6.1)。在這 28 筆資料當中，有 14 次(50%)在中國大陸進行「國是訪問」後人民對於中國的好感度是提高的，也有 14 次(50%)在中國大陸進行「國是訪問」後人民對於中國的好感度是減少的，雖然一個國家的人民對於中國大陸的態度很顯然地會受到許多不同因素的影響，但從整體而言，從整體趨勢可以看出中國大陸的「國是訪問」對於提升受訪國的民眾對於中國大陸好感度的面向上，並沒有帶來明顯而穩定的效果。

表 6.1 各國民意對中國大陸抱持正面態度的百分比（灰底部分表示中國大陸曾在該年度對該國進行訪問）

國家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主要大國]												
美國	43%	52%	42%	39%	50%	49%	51%	40%	37%	35%	38%	37%
加拿大	58%		52%		53%	...			43%		39%	45%
俄羅斯	60%	63%	60%	60%	58%	60%	63%	62%	62%	64%	79%	
日本		27%	29%	14%	26%	26%	34%	15%	5%	7%	9%	11%
德國	46%	56%	34%	26%	29%	30%	34%	29%	28%	28%	34%	28%
法國	58%	60%	47%	28%	41%	41%	51%	40%	42%	47%	50%	33%
英國	65%	65%	49%	47%	52%	46%	59%	49%	48%	47%	45%	37%
義大利			27%		...		-	30%	28%	26%	40%	32%
[亞太國家]												
印尼	73%	62%	65%	58%	59%	58%	67%		70%	66%	63%	
南韓		52%	48%	41%	38%			46%	56%	61%	
澳洲				52%					58%	...	57%	52%
印度								35%	31%	41%	31%
馬來西亞			83%		...		-		81%	74%	78%	
菲律賓						-		48%	38%	54%	
[中東國家]												
約旦	43%	49%	46%	44%	50%	53%	44%	47%	40%	35%	33%	
黎巴嫩	66%		46%	50%	53%	56%	59%	59%	56%	53%	52%	
巴基斯坦	79%	69%	79%	76%	84%	85%	82%	85%	81%	77%	82%	
土耳其	40%	33%	25%	24%	16%	20%	18%	22%	27%	21%	18%	
以色列			45%		56%		49%		38%	49%	55%	
巴勒斯坦			46%		43%		62%		47%	61%	54%	
埃及		63%	65%	59%	52%	52%	57%	52%	45%	46%		

[非洲國家]												
奈及利亞		59%	75%	79%	85%	76%			76%	70%	70%	
肯亞		81%		73%	86%	71%		78%	74%	70%	
迦納			75%						67%	61%	80%	
南非			...	37%					48%	45%	52%	
坦尚尼亞			70%	71%	77%	74%	
烏干達			45%						59%	61%	65%	
[拉美國家]												
墨西哥		43%	38%	39%	39%	39%	40%	45%	43%	47%	
阿根廷			32%	34%	42%	45%			54%	40%	53%	
巴西						52%	49%	50%	65%	44%	55%	
智利			62%						62%	60%	66%	
[歐洲國家]												
西班牙	57%	45%	39%	31%	40%	47%	55%	49%	48%	39%	41%	28%
波蘭	37%		39%	33%	43%	46%	51%	50%	43%	32%	40%	37%
希臘							56%	59%	49%		57%

資料來源：陳郁芬，〈中國國家形象之建構：以胡錦濤時期為例〉，發表於中國政治學 2016 年會暨「新政局下的內外挑戰與政經治理：區域發展、分配正義、族群政治」國際學術研討會，〈花蓮：東華大學，2015〉；“Opinion of China,” **Pew Reserch Center**, February 14, 2017, <<http://www.pewglobal.org/database/indicator/24/>>

說明：(1) Pew 在調查中所使用的問題是「你對中國的看法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Do you have a favorable or unfavorable view of China?)

本文把回答「非常喜歡」(very favorable)與「有些喜歡」(somewhat favorable)的比率加總為對中國大陸「持正面態度」(favorable)，把回答「有些不喜歡」(somewhat unfavorable)和「非常不喜歡」(very unfavorable)的比率加總為對中國大陸「持負面態度」。表格中僅呈現持正面態度的百分比。

(2) 主要大國是指八大工業國組織 (Group of Eight, G8) 的成員國。

四、 中國大陸與受訪國之實質合作

接著探討中國大陸在進行過「國是訪問」之後，是否有效增加了與受訪國的實質合作次數，下列統計模型中，以是否有國是訪問作為自變數，依變數為合作性事件佔雙邊互動事件的比率。為減少其他因素的干擾影響研究信度，控制變數的考量包括中國大陸的人均 GDP、在訪問該年度是否簽訂任何正式的同盟協定或中立協定等、中國大陸與受訪國邊境是否相鄰而有地緣政治因素干擾等等。

表 6.2 中國大陸的「國是訪問」和中國大陸與各國的雙邊實質合作次數

依變數：中國大陸與各國的雙邊實質合作次數 _{t+1}				
	事件發生率比率	標準誤	t	P > t
[不含控制變數]	模型未收斂			
中國大陸是否進行過國是訪問,				
[包含控制變數]				
中國大陸是否進行過國是訪問,	0.111	(0.094)	1.31	0.190
[不含控制變數]	模型未收斂。			
[包含控制變數]	觀察值數目=2,550；國家數目=144。			

資料來源：Chienwe, Hsueh and Shengya, Lai, “Analyzing China’s State-Visiting Public Diplomacy in the Post-Deng Era,” Workshop on East Asia in Global Politics (Taipei: Center for Asia-Pacific Area Studies (CAPAS), May 23 2016), pp. 19~24.

- 說明：1. 使用廣義估計方程式負二項迴歸模型（generalized estimating equation with negative binomial regression），採用分層穩健標準誤（clustered standard errors），並假設在時間上存在著一階自我相關（first-order autocorrelation），包含依變數推遲一年的取值。
2. 控制變數包含了雙方的人均國民所得、是否有結盟關係、是否接壤、雙方的政體分數、雙方相對實力的比值、各國對中國大陸的貿易依賴程度、中國大陸對各國的貿易依賴程度以及兩國首都之間的距離等等研究國際關係時經常使用到的控制變數。關於各個變數的編碼和資料來源，請參見附表三。
3. *p<0.05, **p<0.01, ***p<0.001。

一般而言，中國大陸出訪後多有宣示性的聲明，強調與受訪國間之友好與經貿緊密的重要性等。然而，許多文件與聲明僅概略的承諾中國大陸將促進雙邊關係，諸如在十年內簽成某經濟協議、強化商務方面的往來、將在某特定領域討論進一步合作等等。所謂實質合作非包括「言語上的合作」，而是要有實際的「物質上合作」，即確切的零關稅協議、購買多少數量商品的訂單、共同開發某領域的商業技術等等。言語上的合作與實質上的合作有明顯的區別，前者多為形式化的內容與不具約束性的口語表述，故計算上須以雙方實質上的行為才能更精準的掌握雙邊關係的變化。本文計算中國大陸與各受訪國之間，實際在「物質上的合作」有所作為的次數作為雙方合作的次數測量，用以判斷是否增加了雙方實質合作。下表 6.2 顯示，國是訪問與雙邊實質合作次數這二個變項無高度相關情形。中國大陸在進行「國是訪問」後並沒有顯著增加與受訪國之間的合作次數。

五、中國大陸與受訪國之軍事衝突減少可能性

上節的統計模型結果顯示了一個非常反直覺的發現，中國大陸的「國是訪問」未能增加雙方實際上的合作，但兩國間的往來互動，除了增進經貿互動、鞏固交誼外，亦有可能是為了消弭爭端、降低衝突，即中國大陸的國是訪問外交政策的考量及作用可能是為了緩解衝突。兩國間的衝突小至日常性的爭端，甚至武力相向的可能，國是訪問可為領導人間直接溝通化解誤會的渠道。為探究此點的可能性下表 6.3 以「軍事化國際衝突」(militarized interstate dispute, MID) 的資料作為依變數，其為國際關係學界經常使用檢測的指標，本文中關於衝突可能性的資料包括「言語上的衝突」與「物質上的衝突」。

由於言語上與物質上的衝突皆會對該國產生負面影響，藉由計算總衝突次數佔中國大陸與該國互動次數的比率，了解國是訪問是否能減少衝突發生的可能性。而軍事化衝突的界定，為該年度中國大陸與該國曾向對方展示武力、威脅使用武

力、實際使用武力等三種行為，若有則視作一次軍事化衝突。根據下表 6.3，在控制變數下中國大陸與受訪國的關係，並未因國是訪問而有所改善，甚至，在不合控制變數下 p 值小於千分之一，此顯著水準表示中國大陸與受訪國之軍事衝突可能性增加。故，國是訪問在降低雙方軍事化衝的議題上，並未有顯著的作用。

表 6.3 中國大陸的「國是訪問」和中國大陸與各國發生軍事化衝突的機率

依變數：是否發生軍事化的衝突 _{t+1}				
	係數	標準誤	t	P > t
[不含控制變數]				
中國大陸是否進行過國是訪問,	1.965***	(0.397)	4.95	0.000
[包含控制變數]				
中國大陸是否進行過國是訪問,	-0.098	(0.678)	-0.14	0.886
[不含控制變數] 觀察值數目=3,413；國家數目=195；Pseudo R-squared=0.185				
[包含控制變數] 觀察值數目=2,567；國家數目=145；Pseudo R-squared=0.437				

資料來源：Chienwe, Hsueh and Shengya, Lai, “Analyzing China’s State-Visiting Public Diplomacy in the Post-Deng Era,” Workshop on East Asia in Global Politics (Taipei: Center for Asia-Pacific Area Studies (CAPAS), May 23 2016), pp. 19~24.

- 說明：1. 使用勝算對數模型(logit regression model)和分層穩健標準誤(clustered standard errors)
2. 控制變數包含了雙方的人均國民所得、是否有結盟關係、是否接壤、雙方的政體分數、雙方相對實力的比值、各國對中國大陸的貿易依賴程度、中國大陸對各國的貿易依賴程度，以及兩國首都之間的距離等等研究國際關係時經常使用到的控制變數。關於各個變數的編碼和資料來源，請參見附表三。
3. *p<0.05, **p<0.01, ***p<0.001。

綜論上述，中國大陸的「國是訪問」對於降低他國對中國大陸威脅的感受效果並不明顯。經驗資料的結果顯示，中國大陸的「國是訪問」對美國和日本對中國大陸印象的改善並未帶來顯著的幫助（圖 6.1、圖 6.2）、對其他國家對中國大陸好感度的改變沒有帶來穩定的效果（表 6.1）、對更多雙邊合作也沒有明顯助益（表 6.2），也對於降低雙方發生軍事化國際衝突的機率沒有影響（表 6.3）。從這

些面向看來，中國大陸的「國是訪問」對於降低他國對於中國大陸威脅的感知的成效應屬有限，同時也暗示著中國大陸在公共外交上的努力，整體效果上無法達成中國大陸官方所宣稱的目標。

第二節 加強雙邊共同利益之交集

中國大陸官方宣稱其欲藉公共外交所達成的另一目標，是促進與其他國家之間的雙邊共同利益，本節以聯合國大會的投票紀錄作為依變數，觀察國際社會中行為者與體系內大國互動方式、認同大國決議的變化趨勢，以了解中國大陸國是訪問的效果。藉由檢測「是否使其他國家與中國大陸在聯合國大會有更相近的投票模式」以及「是否使其他國家與美國在聯合國大會有更不相近的投票模式」兩面向，來看中國大陸的「國是訪問」是否帶來了顯著的影響。

以「世界各國在聯合國大會的投票紀錄」來作為國家與國家之間關係的測量其作法如下。由於聯合國的各會員國家都有資格對進入大會最終表決的各項議案表示意見，藉由投票表達支持或反對。首先，各會員國對每次議案的投票都有三項選擇：投下贊成票、投下反對票、放棄投票。因此，聯合國大會每年包羅萬象的議題，將累積高達數十次甚至數百次不等的投票紀錄。接著觀察兩國間投票模式，其相似程度為測量雙邊關係的參考指標。若甲國和乙國在某一特定議題的投票模式相同，出現每次投票此二國皆：同時投下贊成票、同時投下反對票、同時選擇棄權等情況時，便可推測甲國與乙國在此特定議題上具有類似的利益。投票亦涉及機率，少數的幾次相同或為巧合，但當母體數累積一定程度時便成為一國行為變化的脈絡，顯示該國在特定議題中的立場。

由聯合國大會的投票模式來觀察國家利益異同的方法奠基於國際關係研究之理論，許多文獻中學者們已從各國在聯合國大會中的投票行為，延伸出不同測量國家間利益關係相似程度的指標。諸如學者 Gartzke 就從各國在聯合國大會中

的投票行為計算出各國之間的利益相似程度，Bailey, Strezhnev, and Voeten 等人亦應用矩陣模型，以「美國所領導的自由世界秩序」這個面向為基準，從各國在聯合國大會各個議題的投票模式中，計算出各國對於「美國所領導的自由世界秩序」的理想點距離美國本身理想點有多遠。¹

隨著中國大陸的崛起，國際關係學界討論的重要議題之一，便是中國究竟會否在各種面向上挑戰現行由美國領導的世界秩序，探究各國在中國大陸「國是訪問」前後之年度，於聯合國大會的投票行為是否轉變，遂成為一個關鍵的指標。

一、中國大陸與受訪國投票模式之相似程度

以中國大陸「國是訪問」作為自變數，「是否使其他國家與中國大陸在聯合國大會有更相近的投票模式」為依變數，檢視國是訪問是否使兩國有更相似的投票行為。依據表 6.4 統計結果顯示，受訪國家在中國大陸進行「國是訪問」後，其投票模式與中國大陸相同的比率有顯著的增加，p 值不論是在包含控制變數情況下小於 0.001，或是包含控制變數下小於 0.01，顯著水準可見其高度可信。由此，說明中國大陸的「國是訪問」與拉近其他國家與中國大陸之間的利益相似程度，兩者之間有著顯著的關聯。

¹ Erik Gartzke, “Kant We All Just Get Along? Opportunity, Willingnes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Democratic Peace,”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42, No. 1 (January 1998), pp. 1~28; Bailey, Strezhnev, Anton Strezhnev and Erik Voeten, “Estimating Dynamic State Preferences from United Nations Voting Data,”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61, No. 2 (August 2017), pp. 431~456.

表 6.4 中國大陸的「國是訪問」和其他國家投票模式與中國大陸相同的比率

依變數：其他國家投票模式與中國大陸相同的比率 _{t+1}				
	係數	標準誤	t	P > t
[不含控制變數]				
中國大陸是否進行過國是訪問,	0.020***	(0.004)	5.74	0.000
[包含控制變數]				
中國大陸是否進行過國是訪問,	0.013**	(0.004)	3.13	0.002
[不含控制變數] 觀察值數目=3,643；國家數目=192；R-squared=0.822				
[包含控制變數] 觀察值數目=2,474；國家數目=144；R-squared=0.793				

資料來源：Chienwe, Hsueh and Shengya, Lai, “Analyzing China’s State-Visiting Public Diplomacy in the Post-Deng Era,” Workshop on East Asia in Global Politics (Taipei: Center for Asia-Pacific Area Studies (CAPAS), May 23 2016), pp. 19~24.

- 說明：1. 使用國家固定效果模型（Country fixed-effects model），包含依變數推遲一年的取值。
2. 控制變數包含了雙方的人均國民所得、是否有結盟關係、是否接壤、雙方的政體分數、雙方相對實力的比值、各國對中國大陸的貿易依賴程度、中國大陸對各國的貿易依賴程度，以及兩國首都之間的距離等等研究國際關係時經常使用到的控制變數。關於各個變數的編碼和資料來源，請參見附表三。
3. *p<0.05, **p<0.01, ***p<0.001。

二、美國與受訪國投票模式之相似程度

接著以中國大陸是否進行「國是訪問」作為自變數，「是否使其他國家與美國在聯合國大會有更不相近的投票模式」作為依變數，探究中國大陸國是訪問後其他國家與其的利益集合交集會不會增加，即偏離與美國的相似利益。關於中國大陸崛起是否將對美國所領導的世界秩序構成挑戰，現有一論點指出中國大陸雖然在表面上並未挑戰美國所領導的體系，甚至甘於在既有的國際體系中扮演責任承擔者，支持現有制度並享受搭便車的後發展優勢，但事實上中國大陸已然在許

多議題上，悄然創建一系列「中國特色」的布局以破壞現行的美國體系。² 其中一個有趣的說法是，中國大陸在拉近與其他國家之間的關係的同時，也使其他國家跟美國之間的關係開始疏遠。表 6.5 從對「中國大陸的『國是訪問』是否使其他國家與美國在聯合國大會有更不相近的投票模式」的面向上來探討這個問題。表 6.5 的結果顯示，中國大陸進行過「國是訪問」後的國家，不論是在包含控制變數或是不包含控制變數的情況下，顯著水準都相當高，即中國大陸國是訪問後，受訪國在聯合國大會中的投票模式出現了遠離美國的趨勢。

表 6.5 中國大陸的「國是訪問」和其他國家投票模式與美國不同的比率

依變數：其他國家投票模式與美國不同的比率 _{t+1}				
	係數	標準誤	T	P > t
[不含控制變數]				
中國大陸是否進行過國是訪問，	0.034***	(0.004)	8.87	0.000
[包含控制變數]				
中國大陸是否進行過國是訪問，	0.009*	(0.004)	2.45	0.014
[不含控制變數] 觀察值數目=3,643；國家數目=192；R-squared=0.736				
[包含控制變數] 觀察值數目=2,474；國家數目=144；R-squared=0.487				

資料來源：Chienwe, Hsueh and Shengya, Lai, “Analyzing China’s State-Visiting Public Diplomacy in the Post-Deng Era,” Workshop on East Asia in Global Politics (Taipei: Center for Asia-Pacific Area Studies (CAPAS), May 23 2016), pp. 19~24.

- 說明：1. 使用國家固定效果模型（Country fixed-effects model），包含依變數推遲一年的取值。
2. 控制變數包含了雙方的人均國民所得、是否有結盟關係、是否接壤、雙方的政體分數、雙方相對實力的比值、各國對中國大陸的貿易依賴程度、中國大陸對各國的貿易依賴程度，以及兩國首都之間的距離等等研究國際關係時經常使用到的控制變數。關於各個變數的編碼和資料來源，請參見附表三。
3. *p<0.05, **p<0.01, ***p<0.001。

² Michael Pillsbury, *The Hundred Year Marathon: China’s Secret Strategy to Replace America as the Global Superpower* (NY: Henry Holt and Co., 2015).

第三節 小結

本章從宏觀面分析國是訪問外交政策以檢視其整體成效，發現國是訪問對於降低他國對中國大陸威脅的感受效果並不明顯，與他國「親近中國、疏遠美國」的決定有關連。第一節透過對下列五個議題的回答，檢證中國大陸「國是訪問」政策的使用是否成功的降低他國對中國大陸威脅的感受。第一，美國的民眾對中國大陸的態度是否在中國大陸進行「國是訪問」之後有所改善(圖 6.1)？第二，日本的民眾對中國大陸的態度是否在中國大陸進行「國是訪問」之後有所改善(圖 6.2)？第三，其他國家的民眾對中國大陸的好感度是否在中國大陸進行「國是訪問」之後有所改善(表 6.1)？第四，中國大陸與其訪問國之間的合作數目是否在中國大陸進行「國是訪問」之後有所增加(表 6.2)？最後，中國大陸與其訪問國之間軍事化衝突發生的機率是否在中國大陸進行「國是訪問」之後有所減低(表 6.3)？經驗資料的結果顯示，中國大陸的「國是訪問」對於降低他國對於中國大陸威脅的感受的成效屬有限。此外在一份新出來的經驗研究中，Zhou and Luk 發現，中國大陸在世界各地設立孔子學院的作為，不僅沒有帶來預期中可增加中國大陸的軟實力和文化吸引力的效果，反而是在各國塑造出了一種新的「中國文化威脅論」，變相地提高了各國對於中國大陸的疑慮。³ 第二節探討國是訪問後，中國大陸與受訪國的利益相近發展情形，從「是否使其他國家與中國大陸在聯合國大會有更相近的投票模式」(表 6.4)以及「是否使其他國家與美國在聯合國大會有更不相近的投票模式」(表 6.5)這兩個面向，來看中國大陸的「國是訪問」是否帶來了顯著的影響。經驗資料的結果顯示，中國大陸的「國是訪問」與他國在聯合國大會投票模式上「親近中國、疏遠美國」的決定有所關連。從這個面向看來，中國大陸的「國是訪問」對於拉近中國大陸與他國的雙邊共同關係來說似乎有著重要的影響力。

³ Ying Zhou and Sabrina Luk, "Establishing Confucius Institutes: A Tool for Promoting China's Soft Power?"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25, No. 100 (March 2016), pp. 628~642.

第七章 結論

第一節 比較分析

探討個別領導人主政期間的國是訪問外交策略之變化、效益、特點後，本文進一步比較後鄧時間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三位最高領導人「國是訪問」之出訪對象上的差異，並以各主要大國與地區來區分。從中發現了幾個有趣的現象：第一，對主要大國的出訪方面，江澤民與習近平都僅出訪過俄國一次，而胡錦濤卻頻繁為之；第二，在三位領導人中，只有習近平至今尚未以國家領導人的身分正式訪問日本，這可能與習近平上任近四年以來與日本在東海區域持續的領土衝突有關；第三，三位領導人的「國是訪問」皆對「亞太地區」投注較多的心力，對亞太地區國家的出訪遠遠多於其他的地區；第四，與其他領導人相比，胡錦濤更多地將出訪的注意力轉移至非洲與拉丁美洲國家，這可能是他在其任內推動「領導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大戰略考量的結果（表 7.1）。

參照前述第參至伍章對個別領導人的分析（圖 3.1、圖 4.1、圖 5.1），比較三位領導人每年的國是出訪次數與訪問國家數目，從表 7.1 的統計觀察出幾項值得注意的特點，詳述如下。首先，領導人的出訪次數與訪問國家的數目，似乎會在政權轉移的期間中減少，也就是說，新的領導人初接政權時，其國是出訪的次數明顯減少；而在領導人主政的中期，其國是訪問的出訪次數與國家數會開始增加。其次，後鄧時期的三位領導人在接掌政權後開始進入權力穩定的期間，將會開始對美國進行國是訪問（表 7.1、表 2.1）。再次，中國大陸領導人在第一次對美國進行國是訪問前都有一個饒富興味的特點，也就是他們在訪問美國之前的一、兩年，國是訪問的次數和訪問國家的數目都會有顯著的大幅度成長（表 2.1）。

從這三個模式來看，後鄧時期中國大陸公共外交政策中的「國是訪問」策略應用，似乎是會隨著中國大陸領導人政治繼承後的權力掌握情形而起伏變動，表現在領導人當政的政治周期上，此模式在某種程度上可能暗示著後鄧時期中國大

陸「國是出訪」的外交策略，可能與最高領導人主政期間的權力鞏固程度有所關聯，顯示出中共政治菁英權力繼承與其後的變化脈絡。

表 7.1 後鄧時期中共領導人「國是訪問」之出訪對象與次數之比較
(1993~2016)

「國是訪問」的對象	江澤民 (1993~2002)	胡錦濤 (2003~2012)	習近平 (2013~)
訪問各主要大國			
美國	1 (1997)	2 (2006, 2011)	1 (2015)
加拿大	1 (1997)	2 (2005, 2010)	0
俄國	1 (1997)	5 (2003, 2005, 2007, 2009, 2011)	1 (2013)
日本	1 (1998)	1 (2008)	0
德國	1 (1995)	1 (2005)	1 (2014)
法國	2 (1994, 1999)	2 (2004, 2010)	1 (2014)
英國	1 (1999)	1 (2005)	1 (2015)
義大利	1 (1997)	1 (2009)	0
訪問各地區			
亞太	22	28	19
中東	7	7	0
非洲	3	13	5
拉美	7	10	7
歐洲	16	12	5

資料來源：綜整自新華社、新華網領導人出訪專題、新華網國內外大事紀；鍾之成，**為了世界更美好：江澤民出訪紀實**（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年）。

說明：(1) 表格內的數字為出訪的次數，括號內的數字為出訪該國的年份。

(2) 主要大國是指八大工業國組織（Group of Eight, G8）的成員國。

第二節 研究發現

自 1993 年鄧小平健康狀況惡化、漸失實權的同時，中國大陸亦開始積極投入各項公共外交布局。學界主要認為中國大陸基於以下三點而注重公共外交：對冷戰後新國際結構的反應、對中國威脅論的回應，與領導人政治生存的考量。而在官方的聲明裡，中國大陸政府宣告了至少三項中國欲藉其公共外交政策達成的主要目標：降低他國對中國大陸威脅的感受、增加中國大陸與其他國家的經濟關係，以及促進中國大陸與其他國家的雙邊共同利益。本研究分析中國大陸公共外交政策中之「國是訪問」策略，探討其成因、模式與相關影響，並得到兩點主要發現：第一，中國大陸「國是訪問」的行為，在動機來源上，與領導人的政治生存考量關聯度較高，而與「中國威脅論」的起伏之關聯性較少。第二，中國大陸「國是訪問」的行為，在目標達成上，與「使出訪國的國家利益更趨近中國、更疏離美國」這一個現象具有高度的關聯性，而對「改善他國人民對中國大陸的觀感」並未有顯著的幫助。

從大多數的指標看來，中國大陸「國是訪問」的行為並未帶來顯著的作用，比較清晰可見的影響就是與「被出訪國的利益更接近中國、更遠離美國」這個事實有關連性。本文在未預設國是訪問有無效果的前提下，經過研究分析所發現的結論非常接近一般外界「國是訪問只是耗費資源，為服務現任高層領袖的政治議程」。本文以實際數據說明中國大陸花費資源從事此項外交策略之目的非著重在國是訪問的效果，凸顯菁英政治實為背後主要驅動因素。這個發現暗示著，在內部的驅動原因上，中國大陸「國是訪問」的外交作為與領導人內部的菁英政治較有關聯，就如同鄧小平的名言所說，「外交為內政服務」、「外交是內政的延續」；而在外部的實質影響上，中國大陸「國是訪問」的外交作為似乎逐漸地使其他國家的利益朝著有利於中國大陸的方向轉變的趨勢。這個發現與許多學者認為的中國大陸事實上乃是一欲維持現狀的大國的說法有所不同。

長久以來對於中國大陸外交行為的分析，在文獻中大多只能根據有限的資料進行推論，較少針對各種說法進行較具有可否證性的分析，本研究對於中國大陸「國是訪問」外交的研究，在方法論上彌補了這個文獻中的不足。

第三節 未來研究方向

本文的發現，進一步證實了中國大陸外交政策選擇中的政治生存邏輯，唯受限於許多控制變數與可能的敵對解釋目前仍欠缺適合的資料，以及統計模型之技術層面上的能力不足，故本文並未測量中國大陸官方宣稱藉公共外交達成的增進與他國經濟關係的目標，以及進一步分析其詳細的因果關係。更多有關中國大陸「國是訪問」策略與公共外交政策的經濟目的與影響之問題，例如國是訪問後是否使中國大陸在貿易上更依賴其他國家、是否增加了中國大陸與他國共同參與國際組織的數目？哪一些國家在中國大陸進行「國是訪問」後確實改善了與中國大陸的關係與對中國的觀感？哪一些國家在中國大陸進行「國是訪問」後與中國大陸的關係與對中國大陸的觀感反而變得更糟？其轉變或是未轉變的原因是什麼？而在其中發揮影響力的關鍵變數又是什麼？這些關於中國大陸公共外交政策的重要問題，都需要後續的研究來給予進一步的解答。

參考文獻

中文文獻

一、專書

- 卜正珉，**公眾外交：軟性國力，理論與策略**（台北：允晨文化，2009年）。
- 王緝思、資中筠，「國際關係理論與中國外交研究」，資中筠主編，**國際政治理論探索中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 由冀，「中共十七大：承上啟下的政治繼承」，陳德昇主編，**中共「十七大」政治菁英甄補與地方治理**（台北：印刻出版社，2008），頁190~202。
- 朱新民，**1978-1990 中共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八十年代後中國大陸的政治發展**（台北：永然文化出版社，1990年）。
- 李銘義，「美中台關係與台海安全」，翁明賢、吳建德、江春琦主編，**國際關係**（台北：五南，2006）。
- 邱坤玄、張登及，「大國外交的戰略意涵與作為」，高長、陳德昇主編，**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三十年評價與反思**（台北：財團法人兩岸交流遠景基金會，2008年），頁91~105。
- 秦亞青，「中國特色外交思想和外交理論」，秦亞青主編，**國際體系與中國外交**（北京：世界知識出版，2009年）。
- 寇健文，**中共菁英政治的演變：制度化與權力轉移 1978-2004**，（台北：五南，2005年）。
- 張昆，**國家形象傳播**（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年）。
- 許志嘉，**中共外交決策模式研究：鄧小平時期的檢證分析**（台北：水牛出版社，2000年）。
- 趙可金，**外交學原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1年）。
- 趙啟正，**公共外交與跨文化交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
- 趙啟正，**公共外交戰略**（北京：學習出版社，2014年），頁10~27。
- 蔡東杰，**當代中國外交政策**（三版）（台北：五南，2014年）。
- 鍾之成，**為了世界更美好：江澤民出訪紀實**（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年）。

韓方明，**公共外交概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二、學術性期刊論文

王銘義，「日本颯起『胡錦濤旋風』」，**中國市場**（北京），第 28 期（2008），頁 64~65。

王儉，「試論改革開放以來中央三代領導人關於文化建設發展戰略的思考」，**遼寧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11 卷第 6 期（2009 年），頁 17~19。

包淳亮，「論中共權力接班的制度化—從十五大喬石退休談起」，**東亞季刊**，第 32 卷第 2 期（2001），頁 75~92。

包淳亮，「當代中共權力繼承的制度限制」，**東亞季刊**，第 33 卷第 1 期（2002），頁 25~36。

余金武，「中國公共外交的內外維度：爭論、概念、關係」，**觀察與思考**（浙江），第 12 期（2015 年），頁 8。

李思嫻，「中國威脅論下的『和平崛起』論述」，**人文社會學報**，第 11 期（2015），頁 53~80。

李智琦，「近期中共領導人外交出訪之評析」，**戰略安全研析**，第 98 期（2013），頁 5~12。

李翔宙，「中國推動公共外交政策之探析」，**全球政治評論**，第 35 期（2011 年），頁 53~80。

杜鈴玉，「新形勢下推動公共外交與提升國家軟實力之研究」，**警專學報**，第 5 卷第 2 期（2011 年），頁 266~274。

林正義，「胡錦濤訪美行之研析」，**展望與探索**，第 9 卷第 2 期（2011），頁 1~6。

胡錦濤，「以史為鑒面向未來」，**文苑：經典美文**（呼和浩特），第 20 期（2008），頁 15~16。

胡錦濤，「在日本早稻田大學的演講」，**中國外交**（北京），第 7 期（2008），頁 3~6。

- 唐小松、王義桅，「國外對公共外交的研究」，**國際問題研究**(北京)，第 1 期(2005 年)，頁 60~63。
- 徐進，「新時期拓展中國公共外交的必要性」，**重慶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14 卷第 5 期 14 (2014 年)，頁 111~114。
- 袁鵬，「新時期中國的戰略一對「十八大」報告的戰略解讀」，**現代國際關係**(北京)，第 5 期(2013)，頁 3。
- 寇健文，「中共『幹部年輕化』與政治繼承」，**中國大陸研究**，第 44 卷第 5 期(2001)，頁 1~17。
- 寇健文，「中共與蘇共高層政治的演變：軌跡、動力與影響」，**問題與研究**，第 45 卷第 3 期(2006)，頁 39~75。
- 寇健文，「邁向權力核心之路：一九八七年以後中共文人領袖的政治流動」，**政治科學論叢**，第 45 期(2010)，頁 7~8。
- 張志洲，「文化外交如何贏得軟實力」，**對外傳播**，第 10 期(2012 年)，頁 36~37。
- 趙可金，「人文外交：全球化時代的新外交形態」，**外交評論：外交學院學報**，第 6 期(2011 年)，頁 73~89。
- 張清敏、劉兵，「首腦出訪與中國外交」，**國際政治研究**，第 2 期(2008 年)，頁 1~20。
- 張隆義，「江澤民訪日突顯雙方矛盾」，**中國大陸研究**，第 41 卷第 11 期(1998)，頁 1~3。
- 莊朝榮，「中國提升文化產業軟實力之策略」，**臺灣經濟研究月刊**，第 36 卷第 2 期(2013 年)，頁 76~81。
- 陳德昇、陳陸輝，「中共『十七大』政治菁英甄補與地方治理策略」，**中國大陸研究**，第 50 卷第 4 期(2007)，頁 63~65。
- 黃瓊萩，「關係平衡 vs. 普世改造：中美國際干預風格與大戰略思維之比較」，**中國大陸研究**，第 58 卷第 4 期(2015)，頁 71~92。
- 楊潔篪，「努力開拓中國特色公共外交新局面」，**求是**(北京)，第 4 期(2011)，頁 43~44。
- 熊玠，「中國復興有利於美國與全世界—習近平訪美給世人的信息」，**海峽評論**，第 299 期(2015)，頁 32~36。

趙可金，「習近平訪美『中國夢』對話『美國夢』」，**人民論壇**（北京），第 19 期（2015 年），頁 17~19。

劉常敏、黃建達，「當代中國首腦出訪與周邊外交」，**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南京），第 1 期（2011 年），頁 58~68。

蔡東杰，2007，「關於當前中國「大戰略」討論的辯證問題」，**全球政治評論**，第 17 期（2007 年），頁 1~18。

鄭華，「中國公共外交發展進程中的困惑及其應對」，**國際觀察**（上海），第 2 期（2012 年），頁 66~71。

檀有志，「公共外交中的國家形象建構—以中國國家形象宣傳片為例」，**現代國際關係**（北京），第 3 期（2012 年），頁 54~56。

三、研討會論文

孫本初，「如何寫一篇優質的碩博士論文」，發表於撰寫碩博士論文與投稿期刊學術論壇（台北：台北大學，2005 年）。

陳郁芬，〈中國國家形象之建構：以胡錦濤時期為例〉，發表於中國政治學 2016 年會暨「新政局下的內外挑戰與政經治理：區域發展、分配正義、族群政治」國際學術研討會，（花蓮：東華大學，2015）。

四、翻譯作品

Earl R. Babbie 著，林佳瑩、蔡毓智譯，**研究方法基礎理論與技巧**（台北：雙葉書廊，2013 年）。

五、未出版之學位論文

陳奕廷，「中共改革開放以來權力繼承之研究」，中國文化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碩士班學位論文（2009），頁 54~55。

廖登山，「後冷戰時期中國軟權力之研究」，台北：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學位論文（2007 年）。

戴紹安，「中國文化軟實力政策研究—以國家漢辦下的孔子學院為例」，台北：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碩士班學位論文（2014 年）。

六、網頁資料

「President Hu Jintao arrives in Seattle for U.S. visit」，中華人民共和國駐美利堅合眾國大使館，2006 年 4 月 25 日，檢索時間：2017 年 11 月 14 日，

<<http://www.china-embassy.org/eng/zmgx/t248787.htm>>。

「大陸領導人歷次訪美珍貴畫面」，今日新聞 NOWNews，2015 年 9 月 22 日，檢索時間：2017 年 12 月 17 日，

<<https://www.nownews.com/news/20150922/1820455>>。

「小資料：薄熙來事件回顧」，BBC 中文網，2013 年 8 月 21 日，檢索時間：2017 年 12 月 28 日，

<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3/07/130725_boxilai_timeline>

「平民情懷最動人」，新華網，2015 年 10 月 3 日，檢索時間：2017 年 12 月 23 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10/03/c_1116736727.htm>。

「美媒評習近平訪美『最難忘時刻』」，新華網，2015 年 10 月 2 日，檢索時間：2017 年 12 月 22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10/02/c_1116733419.htm>。

「胡錦濤訪東京 4 天三度晤日皇明仁 十分罕見」，中國評論通訊社，2008 年 5 月 7 日，檢索時間：2017 年 12 月 15 日，

<<http://hk.crntt.com/doc/1006/3/8/3/100638331.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0638331>>。

「胡錦濤會見美副總統切尼和臨時參議長史蒂文斯等」，中央政府門戶，2006 年 4 月 21 日，檢索時間：2017 年 12 月 16 日，

<http://big5.gov.cn/gate/big5/www.gov.cn/ldhd/2006-04/21/content_259806.htm>。
>。

「胡錦濤福田簽署聯合公報 東海、毒餃難題未解」，**蘋果新聞**，2008年5月8日，檢索時間：2017年12月13日，

<<https://hk.news.appledaily.com/international/daily/article/20080508/11081829>>。
>。

「國平：自信中國的亮麗國際表達」，**新華網**，2015年9月30日，檢索時間：2017年12月22日，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09/30/c_1116727734.htm>。

「張德江、王岐山分別會見新加坡總理李顯龍」，**新華網**，檢索時間：2017年9月20日，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7-09/20/c_1121697639.htm>。

「從陳希同到陳良宇：中國肅貪十年變遷」，**瀟湘晨報**，2013年6月6日，檢索時間：2017年12月28日，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3/0612/15/5909776_292368697.shtml>。

「習行跟拍 習主席來到林肯中學」，**新華網**，2015年9月25日，檢索時間：2017年12月23日，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09/25/c_128266287.htm>。

「習近平七次訪美，只有這次是國事訪問」，**新華網**，2015年9月18日，檢索時間：2017年12月16日，

<http://news.xinhuanet.com/2015-09/18/c_1116603429.htm>。

「習近平出席中美企業家座談會」，**新華網**，2015年10月24日，檢索時間：2017年12月24日，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09/24/c_1116662637.htm>。

「習近平訪美第一日」，**新華網**，2015年9月23日，檢索時間：2017年12月22日，

<http://news.xinhuanet.com/video/sjxw/2015-09/23/c_1116658552.htm>。

- 「習近平訪美第二日」，**新華網**，2015年9月24日，檢索時間：2017年12月22日，
<http://news.xinhuanet.com/video/sjxw/2015-09/24/c_1116671119.htm>。
- 「習近平訪美第三日」，**新華網**，2015年9月25日，檢索時間：2017年12月22日，
<http://news.xinhuanet.com/video/sjxw/2015-09/25/c_1116684063.htm>。
- 「陳希同：與薄熙來遭遇何其相似」，**中央社 CAN News**，2012年5月29日，檢索時間：2017年12月28日，
<<http://www.chinese.rfi.fr/%E4%B8%AD%E5%9B%BD/20120529-%E9%99%88%E5%B8%8C%E5%90%8C%E6%84%9F%E5%8F%B9%E4%B8%8E%E8%96%84%E7%86%99%E6%9D%A5%E9%81%AD%E9%81%87%E4%BD%95%E5%85%B6%E7%9B%B8%E4%BC%BC>>。
- 「陳良宇案暴露中國政治體制問題」，**BBC 中文網**，2006年9月29日，檢索時間：2017年12月29日，
<http://news.bbc.co.uk/chinese/trad/hi/newsid_5390000/newsid_5393000/5393044.stm>。
- 「彭麗媛同美國總統奧巴馬夫人米歇爾共同參觀美國國家動物園大熊貓館」，**新華網**，2015年9月26日，檢索時間：2017年12月23日，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09/26/c_1116684601.htm>。
- 「彭麗媛參觀林肯藝術中心和茱莉亞學院」，**新華網**，2015年9月29日，檢索時間：2017年12月22日，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09/29/c_1116703659.htm>。
- 「揭秘陳希同、陳良宇獄中生活」，**多維新聞**，2013年8月22日，檢索時間：2017年12月28日，
<<http://culture.dwnews.com/history/big5/news/2013-08-22/59318830-all.html>>。
- 「溫家寶總理訪問法國、斯洛伐克、捷克、葡萄牙和馬來西亞並出席第九次中國—東盟領導人會議和東盟與中日韓領導人會議以及首屆東亞峰會等會議」，**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檢索時間：2017年11月07日，

<http://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zt_674979/ywzt_675099/2005year_675849/wjbzlfw_675869/>。

「圖輯：牛仔帽、吉他與歷屆中國領導人訪美」，**BBC 中文網**，2015 年 9 月 23 日，檢索時間：2017 年 12 月 17 日，

<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2015/09/150923_gal_china_usa_visit_history>。

「福田選孫中山最愛松本樓宴胡錦濤象徵世代友好」，**蘋果新聞**，2008 年 5 月 7 日，檢索時間：2017 年 12 月 13 日，

<<https://hk.news.appledaily.com/international/daily/article/20080507/11077580>>

「綜述：習近平訪美將深化新型大國關係內涵」，**新華網**，2015 年 9 月 10 日，檢索時間：2017 年 12 月 22 日，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09/10/c_1116525792.htm>。

「歷史問題多談無益？江澤民不同意」，**中時電子報**，1998 年 11 月 28 日，檢索日期：2017 年 11 月 13 日，

<<http://forums.chinatimes.com/report/japan/112805.htm>>。

王梅林，「比較研究」，**國家教育研究院**，2012 年 10 月，檢索時間：2017 年 03 月 19 日，<<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679273/>>。

郭晶，「國際電台台長王庚年：中國國際廣播 60 年」，**人民網**，2009 年 09 月 16 日，檢索時間：2015 年 12 月 18 日，

<<http://media.people.com.cn/BIG5/137684/10067379.html>>。

陳雪飛，「新中國公共外交的歷程與特點」，**閱讀屋**，2017 年 2 月 21 日，檢索時間：2017 年 4 月 21 日，<<http://www.readhouse.net/articles/231826638/>>。

新華網專題報導，「高麗赴俄羅斯舉行中俄能源合作委員會第十三次會議、出席第二屆中俄中小企業實業論壇並訪問阿塞拜疆、格魯吉亞、亞美尼亞」，**新華網**，檢索時間：2017 年 11 月 07 日，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cnleaders/zhanggaoli/zglcf201605/index.htm>

>。

新華網專題報導，「王岐山活動報導集」，**新華網**，檢索時間：2017年11月07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wjb1125/>>。

新華網專題報導，「李克強訪問哈薩克斯坦、塞爾維亞並出席國際會議」，**新華網**，檢索時間：2017年11月07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cnleaders/lkqcf1412/index.htm>>。

新華網專題報導，「溫家寶出席歐亞五國並出席國際會議」，**新華網**，檢索時間：2017年11月07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wjb1125/>>。

新華網專題報導，「圖輯—胡錦濤訪問日本」，**新華網**，檢索時間：2017年11月07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hjt200805/tp.htm>>。

新華網專題報導，「劉雲山出訪朝鮮」，**新華網**，檢索時間：2017年11月7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cnleaders/liuyunshan/lys201510chx/index.htm>>。

新華網專題報導，「劉雲山出訪歐洲四國」，**新華網**，檢索時間：2017年11月07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cnleaders/liuyunshan/lys201406cf/>>。

新華網專題報導，「胡錦濤主席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紀實」，**新華網**，檢索時間：2017年12月16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hjt201001/>>。

新華網專題報導，「胡錦濤出訪美國及亞非四國」，**新華網**，檢索時間：2017年12月17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hjt0604/01.htm>>。

新華網專題報導，「暖春之旅—胡錦濤訪問日本」，**新華網**，檢索時間：2017年12月17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hjt200805/>>。

新華網專題報導，「習近平美國之行」，**新華網**，檢索時間：2017年12月20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cnleaders/xijinpings/xjpcf1509/mgzx.htm>>。

新華網專題報導，「習近平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並出席聯合國成立70週年系列峰會」，**新華網**，檢索時間：2017年12月23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cnleaders/xijinpings/xjpcf1509/index.htm>>。

劉斐青，「江澤民抵日訪問 中共元首第一人」，**華視新聞網**，1998年10月25日，檢閱時間：2017年11月13日，

<http://news.cts.com.tw/cts/international/199811/199811250021946.html#.Wi_f1k1rzIU>。

劉斐青，「江澤民訪日 今與小淵會談」，*中時電子報*，1998年11月26日，檢
索日期：2017年11月13日，

<<http://forums.chinatimes.com/report/japan/112601.htm>>。

英文文獻

一、專書

Bush, Richard C., *The Perils of Proximity: China-Japan Security Relations*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13).

Cull, Nicholas, *The Cold War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American
Propaganda and Public Diplomacy*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Deng, Yong, "Reputation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China Reacts to the China
Threat Theory," in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 Ross, ed.,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Doyle, Michael W., *Ways of War and Peace: Realism, Liberalism, and Socialism* (NY:
WW Norton & Co Inc., 1997).

Gill, Bates, *Rising Star: China's New Security Diplomacy*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7).

Goldstein, Avery and Steinfeld, Edward E., *Playing Our Game: Why China's Rise
Doesn't Threaten the West*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Goldstein, Avery, *Rising to the Challenge: China's Grand Strategy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Green, Michael, "Japan's Role in Asia: Searching for Certainty," in David Shambaugh
and Michael Yahuda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Asia, 2nd edition* (NY: New
York, NY: Rowman & Littlefield, 2014).

Huntington, Samuel P.,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6).

Kang, David C., *China Rising: Peace, Power and Order in East Asi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 Keohane, Robert O.,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 Kurlantzick, Joshua, *Charm offensive: How China's Soft Power Is Transforming the World*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7).
- Lardy, Nicholas R., *Intergrating China into the Global Economy*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2).
- Leonard, Mark, *Public Diplomacy* (London: The Foreign Policy Centre, 2002), pp. 1~21.
- Malone, Gifford D., *Political Advocacy and Cultural Communication: Organizing the Nation's Public Diplomacy* (Lanham: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8).
- Mearsheimer, John J.,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Y: WW Norton & Co Inc., 2001).
- Medeiros, Evan S., *China's International Behavior: Activism, Opportunism, and Diversification* (Santa Monica, Calif.: RAND Corporation, 2009).
- Medeiros, Evan S., *Reluctant Restraint: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Nonproliferation Policies and Practices 1980-2004*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 Mesquita, Bruce Bueno de and Lalman, David, *War and Reaso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Imperative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 Nathan, Andrew J. and Scobell, Andrew, *China's Search for Secur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5).
- Nye, Joseph S.,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4).
- Nye, Joseph S.,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 Oneal, John R. and Russett, Bruce, *Triangulating Peace: Democracy, Interdependence,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NY: WW Norton & Co Inc, 2001).
- Sharp, Paul, "Revolutionary States, Outlaw Regimes and the Techniques of Public Diplomacy," in Jan Melissen, ed., *The New Public Diplomacy: Soft Pow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 Saunders, Philip C., *China's Global Activism: Strategy, Drivers, and Tools*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2006).

Shambaugh, David, "Return to the Middle Kingdom? China and Asia in the Early Twenty-First Century," in David Shambaugh, ed., *Power Shift: China and Asia's New Dynamics*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Wendt, Alexander,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Zhang, Yunling and Tang, Shiping, "China's Regional Strategy," in David Shambaugh, ed., *Power Shift: China and Asia's New Dynamics*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二、學術性期刊論文

Bailey, Michael A., Strezhnev, Anton and Voeten, Erik, "Estimating dynamic state preferences from United Nations voting data,"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61, No. 2 (2017), pp. 430~456.

Bailey, Strezhnev, Strezhnev, Anton and Voeten, Erik, "Estimating Dynamic State Preferences from United Nations Voting Data,"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61, No. 2 (August 2017), pp. 431~456.

Cull, Nicholas J., "Public Diplomacy: Taxonomies and Histories,"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Vol. 616, No. 1 (March 2008), pp. 31~54.

d'Hooghe, Ingrid, "Into High Gear: China's Public Diplomacy," *The Hague journal of diplomacy*, Vol. 3, No. 1 (March 2008), pp. 37~61.

Dittmer, Lowell, "The strategic triangle: An elementary game-theoretical analysis," *World Politics*, Vol. 33, No. 4 (July 1981), pp. 485~515.

Fearon, James D., "Rationalist Explanations for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9, No. 3 (Summer 1995), pp. 379~414.

Friedberg, Aaron, "The future of US-China relations: Is conflict inevitabl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2 (Autumn 2005), pp. 7~45.

Gartzke, Erik, "Kant We All Just Get Along? Opportunity, Willingnes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Democratic Peace,"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42, No. 1 (January 1998), pp. 1~28.

Goldstein, Avery and Steinfeld, Edward E., *Playing Our Game: Why China's Rise Doesn't Threaten the West*; Randall L. Schweller, "After Unipolarity: China's

- visions of international order in an era of US declin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6, No. 1 (Summer 2011), pp. 41~72.
- Haftel, Yoram Z., “Designing for Peace: Regional Integration Arrangements, Institutional Variation, and Militarized Interstate Disput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61, No. 1 (Winter 2007), pp. 217~237.
- Johnston, Alastair Iain, “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7, No. 4 (Spring 2003), pp. 5~56.
- Kastner, Scott L. and Saunders, Philip C., “Is China a Status Quo or Revisionist State? Leadership Travel as an Empirical Indicator of Foreign Policy Prioriti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6, No. 4 (March 2012), pp. 163~177.
- Maoz, Zeev, “The Effects of Strategic and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on International Conflict across Levels of Analysi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53, No. 1 (January 2009), pp. 223~240.
- Nye, Joseph S., “Arms Control after the Cold War,” *Foreign Affairs*, Vol. 6 No. 5 (Winter 1989), pp. 42~64.
- Nye, Joseph S., *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0), pp. 188~195.
- Oye, Kenneth A., “Explaining Cooperation under Anarchy: Hypotheses and Strategies” *World Politics*, Vol. 38, No. 1 (October 1985), pp. 1~24.
- Paradise, James F.,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Harmony: The Role of Confucius Institutes in Bolstering Beijing's Soft Power,” *Asian Survey*, Vol. 49 No. 4 (July/August 2009), pp. 649~669.
- Roy, Denny, “The ‘China Threat’ Issue: Major Arguments,” *Asian Survey*, Vol. 36, No. 8 (August 1996), pp. 758~771.
- Shih, Chih-yu and Huang, Chiung-Chiu, “China’s Quest for Grand Strategy: Power, National Interest, or Relational Security?”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8, No. 1 (October 2014), pp. 1~26.
- Wang, Jian and Chang, Tsan-Kuo, “Strategic Public Diplomacy and Local Press: How A High-Profile Head-of-State Visit was Covered in America’s Heartland,” *Public Relations Review*, Vol. 30 (March 2004), pp. 11~24.
- Wang, Yiwei, “Public Diplomacy and the Rise of Chinese Soft Power,”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 616, No. 1 (March 2008), pp. 257~273.

- Wendt, Alexander,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6, No. 2 (Spring 1992), pp. 391~425.
- Zhang, Juyan and Cameron, Glen T., "China's Agenda Building and Image Polishing in the U.S.: Assessing an International Public Relations Campaign,"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 29, No. 1 (March 2003), pp. 13~28.
- Zheng, Bijian, "China's 'Peaceful Rise' to Great-Power Status," *Foreign Affairs*, Vol. 84, No. 5 (September/October 2005), pp. 18~24.
- Zhou, Ying and Luk, Sabrina, "Establishing Confucius Institutes: A Tool for Promoting China's Soft Power?"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25, No. 100 (March 2016), pp. 628~642.

三、研討會論文

- Hsueh, Chienwe, and Lai, Shengya, "Analyzing China's State-Visiting Public Diplomacy in the Post-Deng Era," Workshop on East Asia in Global Politics (Taipei: Center for Asia-Pacific Area Studies (CAPAS), May 23 2016), pp. 19~24.

四、網頁資料

- "China Threat," **Google Trends**, November 1, 2015,
<<https://www.google.com/trends/>>.
- "Americans' Opinions of China," **Gallup survey**, November 15, 2015,
<<http://www.gallup.com/poll/1627/china.aspx>>.
- "Opinion of China," **Pew Research Center**, February 14, 2017,
<<http://www.pewglobal.org/database/indicator/24/>>.

Austin Ramzy, " Will Obama and Hu Jintao Find Middle Ground," TIME,
2011/6/18.<

<http://content.time.com/time/world/article/0,8599,2042941,00.html>>.

Bader, Jeffrey A., "Chinese State Visits are always Hard: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Brooking, September 17, 2015,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order-from-chaos/2015/09/17/chinese-state-visits-are-always-hard-a-historical-perspective/>>.

CSIS Database, "How are Global Views on China Trending? " November
07, 2017, < <https://chinapower.csis.org/global-views/>>.

Kahn, Joseph, "In Hu's Visit to the U.S., Small Gaffes May Overshadow Small Gains,"
New York Times, April 22, 2006,

<<http://www.nytimes.com/2006/04/22/world/asia/22china.html>>.

Milbank, Dana, "China and Its President Greeted by a Host of Indignities,"
Washington Post, April 20, 2006,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6/04/20/AR2006042001946.html>>.

O'neil, John, "China's President Ends U.S. Visit with Yale Speech," **New York
Times**, April 21, 2006,

<<http://www.nytimes.com/2006/04/21/nyregion/chinas-president-ends-us-visit-with-yale-speech.html>>.

附錄

附表一 後鄧時期中共領導人「國是訪問」之統計 1993-2015

年度	領導人	出訪次數	出訪的國家數目與國家清單	出訪各國的日期	出訪天數
1993	江澤民 192 天	1	1。巴西。共出訪 3 天	• 11/23-25 巴西	3
1994		2	3。法國、新加坡、印尼 共出訪 7 天	• 9/8-12 法國 • 11/8-9 新加坡；11/17-19 印尼	5 2
1995		2	4。芬蘭、匈牙利、德國、韓國 共出訪 18 天	• 7/5-7 芬蘭；7/8-11 匈牙利；7/11-15 德國	7
				• 11/13-16 韓國	11
1996		4	13。克羅埃西亞、埃及、辛巴威、西班牙、挪威、烏茲別克、吉爾吉斯、菲律賓、巴基斯坦、尼泊爾、肯亞、馬利、納米比亞 共出訪 33 天	• 5/8-11 肯亞；5/11-13 克羅埃西亞；5/13-16 埃及；5/17 馬利；5/18-20 納米比亞 5/20-22 辛巴威	15
				• 6/23-26 西班牙；6/27-29 挪威；7/2-3 烏茲別克；7/3-4 吉爾吉斯	10
				• 11/26-28 菲律賓	3
				• 12/1-3 巴基斯坦；12/4-5 尼泊爾	5
1997		3	4。俄國、美國、加拿大、墨西哥 共出訪 19 天	• 4/22-24 俄國	3
				• 10/26-11/3 美國	9
	• 11/26-29 加拿大；11/29-12/2 墨西哥			7	
1998		1	1。日本。共出訪 6 天	• 11/25-30 日本	6
1999	4	13。義大利、瑞士、奧地利、蒙古、泰國、澳大利亞、紐西蘭、英國、法國、葡萄牙、摩洛哥、阿爾及利亞、沙烏地阿拉伯 共出訪 41 天	• 3/20-24 義大利；3/25-27 瑞士；3/27-30 奧地利	11	
			• 7/15-17 蒙古	3	
			• 9/2-6 泰國；9/6-10 澳大利亞；9/13-14 紐西蘭	11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10/18-22 英國；10/22-25 法國； 10/26-27 葡萄牙；10/28-29 摩洛哥； 10/30 阿爾及利亞；10/31-11/2 沙烏地阿拉伯 	16
2000		3	8。土耳其、希臘、南非、塔吉克、土庫曼、寮國、柬埔寨、汶萊 共出訪 19 天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4/19-20 土耳其；4/21-23 希臘； 4/24-27 南非 	9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7/3-4 塔吉克；7/5-6 土庫曼 	4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11/11-13 寮國；11/13-14 柬埔寨； 11/17-18 汶萊 	6
2001		4	11。智利、阿根廷、烏拉圭、古巴、委內瑞拉、俄國、白俄羅斯、摩爾多瓦、烏克蘭、馬爾他、緬甸 共出訪 24 天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4/5-7 智利；4/7-9 阿根廷；4/10 烏拉圭；4/12-15 古巴；4/15-16 委內瑞拉 	12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7/15-18 俄國；7/18-19 白俄羅斯； 7/19-20 摩爾多瓦；7/20-22 烏克蘭； 7/23-24 馬爾他 	10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12/12-13 緬甸 	2
2002		5	9。德國、利比亞、奈及利亞、突尼西亞、伊朗、拉脫維亞、愛沙尼亞、冰島、立陶宛 共出訪 22 天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4/8-13 德國；4/13-14 利比亞； 4/14-15 奈及利亞；4/16-17 突尼西亞；4/18-21 伊朗 	14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6/10-11 拉脫維亞；6/12-13 愛沙尼亞；6/14-15 冰島；6/16-17 立陶宛 	8
2003	胡錦濤 224 天	2	6。俄國、哈薩克、蒙古、泰國、澳大利亞、新加坡 共出訪 13 天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5/26-6/5 俄國、哈薩克、蒙古 	11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10/20-21 泰國、澳大利亞、新加坡 				2	
2004		3	12。法國、埃及、加彭、阿爾及利亞、波蘭、匈牙利、羅馬尼亞、烏茲別克、巴西、阿根廷、智利、古巴 共出訪 34 天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1/26-2/4 法國、埃及、加彭、阿爾及利亞 	10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6/8-18 波蘭、匈牙利、羅馬尼亞、烏茲別克 			11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11/11-23 巴西、阿根廷、智利、古巴 			13	
2005	4	11。汶萊、印尼、菲律賓、俄國、哈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4/20-26 汶萊、印尼；4/26-28 	9	

		薩克、加拿大、墨西哥、英國、德國、 西班牙、韓國 共出訪 35 天	菲律賓 • 6/30-7/3 俄國；7/3-7/7 哈薩克 • 9/8-13 加拿大、墨西哥 • 11/8-19 英國、德國、西班牙、 韓國	8 6 12
2006	2	9。美國、沙烏地阿拉伯、摩洛哥、 奈及利亞、肯亞、越南、柬埔寨、印 度、巴基斯坦 共出訪 24 天	• 4/18-29 美國、沙烏地阿拉伯、 摩洛哥、奈及利亞、肯亞 • 11/15-26 越南、柬埔寨、印度、 巴基斯坦（11/23-26）	12 12
2007	5	13。喀麥隆、利比亞、蘇丹、尚比亞、 納米比亞、南非、莫三比克、塞席爾、 俄國、瑞典、吉爾吉斯、哈薩克、澳 大利亞 共出訪 34 天	• 2/1-12 喀麥隆、利比亞、蘇丹、 尚比亞、納米比亞、南非、莫三 比克、塞席爾 • 3/21-28 俄國 • 6/6-10 瑞典 • 8/9 哈薩克；8/14 吉爾吉斯 • 9/3-9/9 澳大利亞	12 8 5 2 7
2008	4	8。日本、韓國、塔吉克、土庫曼、 哥斯大黎加、古巴、秘魯、希臘 共出訪 25 天	• 5/6-11 日本 • 8/25-27 韓國；8/27-28 塔吉克、 土庫曼 • 11/16-26 哥斯大黎加、古巴、 秘魯 • 11/24-27 希臘	6 4 11 4
2009	4	11。沙烏地阿拉伯、馬利、塞內加爾、 坦尚尼亞、模里西斯、俄國、斯洛伐 克、克羅埃西亞、義大利、馬來西亞、 新加坡 共出訪 15 天	• 2/10-17 沙烏地阿拉伯、馬利、 塞內加爾、坦尚尼亞、模里西斯 • 6/14 俄國；6/18-19 斯洛伐克； 6/20 克羅埃西亞 • 7/5 義大利；7/7（原訂）葡萄 牙 • 11/10-11 馬來西亞、新加坡	8 4 1 2
2010	4	7。巴西、委內瑞拉、烏茲別克、哈 薩克、加拿大、法國、葡萄牙	• 4/12-18 巴西、委內瑞拉 • 6/9-12 烏茲別克、哈薩克	7 4

			共出訪 20 天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6/23-27 加拿大 • 11/4-6 法國；11/6-7 葡萄牙 	5 4
2011		3	5。美國、哈薩克、俄國、烏克蘭、奧地利 共出訪 14 天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1/18-21 美國 • 6/12-20 哈薩克、俄國、烏克蘭 • 11/6 奧地利 	4 9 1
2012		2	2。柬埔寨、丹麥 共出訪 10 天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3/30-4/2 柬埔寨 • 6/14-19 丹麥 	4 6
2013		4	13。俄國、坦尚尼亞、南非、剛果、千里達及托巴哥、哥斯大黎加、墨西哥、土庫曼、哈薩克、烏茲別克、吉爾吉斯、印尼、馬來西亞 共出訪 34 天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3/22-30 俄國、坦尚尼亞、南非、剛果 • 5/31-6-6 千里達及托巴哥、哥斯大黎加、墨西哥 • 9/3-13 土庫曼、哈薩克、烏茲別克、吉爾吉斯 • 10/2-8 印尼、馬來西亞。 	9 7 11 7
2014	習近平 133 天	6	17。荷蘭、法國、德國、比利時、韓國、巴西、阿根廷、委內瑞拉、古巴、蒙古、塔吉克、馬爾地夫、斯里蘭卡、印度、澳大利亞、紐西蘭、斐濟 共出訪 41 天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3/22-4/1 荷蘭、法國、德國、比利時 • 7/3-4 韓國 • 7/15-23 巴西、阿根廷、委內瑞拉、古巴 • 8/21-22 蒙古 • 9/11-19 塔吉克、馬爾地夫、斯里蘭卡、印度 • 11/16-23 澳大利亞、紐西蘭、斐濟 	11 2 9 2 9 8
2015		6	8。巴基斯坦、白俄羅斯、美國、英國、越南、新加坡、南非、辛巴威 共出訪 38 天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4/20-24 巴基斯坦 • 5/7-22 白俄羅斯 • 9/22-25 美國 • 10/19-23 英國 	5 16 5 5

				• 11/6 越南；11/6-7 新加坡	2
				• 12/1 辛巴威；12/2-5 南非	5
2016	5	12。沙烏地阿拉伯、埃及、伊朗、捷克、塞爾維亞、波蘭、烏茲別克、柬埔寨、孟加拉、厄瓜多、祕魯、智利共出訪 20 天	• 1/19-20 沙烏地阿拉伯；1/20-21 埃及；1/22-23 伊朗	5	
			• 3/28-30 捷克	3	
			• 6/17-19 塞爾維亞；6/19-21 波蘭；6/21-22 烏茲別克	6	
			• 10/13 柬埔寨；10/14-15 孟加拉	3	
			• 11/17-18 厄瓜多；11/18-21 祕魯(11/19-20 APEC 領導人非正式會議)；11/22 智利	3	

資料來源：綜整自新華網國內外大事紀、人民日報、世界知識出版社之書籍等。



附表二 中共菁英制度化前最高領導人出訪之統計

年度	領導人	出訪次數	出訪的國家數目與國家清單	出訪各國的日期
1950	毛澤東	1	1。蘇聯	• 1949.12/6-1950.2/27 蘇聯 註：時任國家主席
1957		1	1。蘇聯	• 11/2-11/20 蘇聯 註：時任國家主席
1978	華國鋒	2	4。朝鮮、羅馬尼亞、南斯拉夫、伊朗	• 5/5-5/10 朝鮮 • 8/14-8/21 羅馬尼亞；8/21-8/29 南斯拉夫； 8/29-9/1 伊朗 註：時任國務院總理
1957	鄧小平	1	1。蘇聯	• 11/2-11/20 蘇聯
1960		2	1。蘇聯	• 9/5-9/22 蘇聯 • 11/5-12/2 蘇聯
1961		1	1。朝鮮	• 9/9 朝鮮
1975		1	1。法國	• 5/12-5/18 法國 註：時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
1978		4	7。緬甸、尼泊爾、朝鮮、日本、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	• 1/26-1/31 緬甸；2/3-2/6 尼泊爾 • 9/8-9/13 朝鮮 • 10/22-10/29 日本 • 11/5-12 泰國、馬來西亞；11/12-14 新加坡 註：時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
1979		1	1。美國	• 1/29-2/5 美國 註：時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
1982		1	1。朝鮮	• 4/27 朝鮮

資料來源：綜整自新華網、人民日報。

附表三 本文所使用到的變數之測量/編碼與資料來源

變數	測量/編碼方式	資料來源
[自變數]		
中國大陸是否已進行過國是訪問	0: 中國大陸在該年尚未出訪過該國 1: 中國大陸在該年或之前已出訪過該國	作者自行編碼
[依變數]		
合作性事件占雙邊互動事件的百分比	被媒體報導出來的物質性的合作事件次數 除以所有被媒體報導出來的雙邊互動事件	GDELT 資料庫，經由作者自行編碼
是否與中國大陸發生軍事化的國際衝突	0: 該國在該年並未與中國大陸發生軍事化的國際衝突 1: 該國在該年曾與中國大陸發生軍事化的國際衝突	Ghosn, Palmer, and Bremer (2004)
投票模式與美國不同的百分比	該國在聯合國大會中投票模式與美國不同的次數除以該國在聯合國大會中的總投票次數	Bailey, Strezhnev, and Voeten (2015)
投票模式與中國大陸相同的百分比	該國在聯合國大會中投票模式與中國大陸相同的次數除以該國在聯合國大會中的總投票次數	Bailey, Strezhnev, and Voeten (2015)
[其他控制變數]		
中國大陸的人均 GDP	中國大陸的 GDP 除以人口數	Feenstra, Inklaar, and Timmer (2015)
其他國家的人均 GDP	其他國家的 GDP 除以人口數	Feenstra, Inklaar, and Timmer (2015)
其他國家是否與中國大陸有聯盟關係	0: 如果雙方在該年並未簽定任何正式的共同防禦協定、中立協定或是同盟協定等其中的任何一種。 1: 如果雙方在該年有簽訂任何正式的共同防禦協定、中立協定或是同盟協定等其中的任何一種。	Gibler (2008)
其他國家是否與中國大陸接壤	0: 不接壤。 1: 接壤。	Stinnett, Tir, Schafer, Diehl, and Gochman (2002)
其他國家的政體分數	在 Polity IV 資料庫中的政體分數。	Marshall, Gurr, and

		Jagers (2013)
其他國家與中國大陸的相對權力比值	其他國家的 GDP 除以中國大陸的 GDP	Feenstra, Inklaar, and Timmer (2015)
其他國家的首都與北京之間的距離的對數 (英哩)	其他國家的首都到中國大陸的首都北京市之間的距離 (英哩) 的對數值	The Correlates of War Database. ¹
其他國家在該年是否與中國大陸發生軍事化的國際衝突	0: 無。 1: 有。	Ghosn, Palmer, and Bremer (2004)



^{註1} The Correlates of War Project, 網址：<http://www.correlatesofwar.org/>。